

生在中国二十年

生在中国二十年

从弱冠到而立之年的思想蜕变

李三立 著

著作权仅归作者所有

编撰时间：2019 年 4 月

版权所有 © 李三立 著

本书中所有文章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印刷、摘编书中文章。对非法转载者，作者保留采用法律手段追究的权利。本书的修改权、更新权及最终解释权均归作者所有。

献给我的父母

前言

这本集子是我自大学毕业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的合集，是我这些年来思考世界和人生的记录。这些文章大都乃即兴而作，或是旅行的见闻，或是读书的札记，以及无聊时做白日梦时的所思所想。这里的文章没有经过特别的构思或加工，难免杂乱无章，或文思跳跃。有些文章，现在看来，当年的观点显得颇为幼稚，已不再代表我如今的看法。但我仍愿意保留它们原始的模样，以记录我真实的心路历程。

这几年来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思想变化最快的时期。我从一个“中二”少年蜕变成一个思想独立的青年。我几乎摒弃了少年时老师和家长教给我的所有东西，开始对周遭的世界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世界观方面，我从一个中国式的爱国少年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批判者；人生观上，从一个对传统理想“立功、立德、立言”的追求者，转变为一个淡泊功名、专注内心的理想

主义者。我自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但这种变化难免让自己显得另类；从前熟悉我的父母亲友也许感到不安，因为我已不再是它们熟悉的我。整编这本集子，也算将我这些年来思想与他们沟通，希望这些文章多少能解释我几年来的变化。

在中国想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是困难的。我在国外上学时，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外国教授在课上批评中国，于是有中国的留学上起身反驳。反驳本是正常的事，西方人的传统也尊重不同的观点。但不正常的是，所有的中国学生反驳起来都是相同的论调，都是他们在中学课堂上被灌输的思想。尊重个性化发展的西方人当然无法理解，为何中国人的思想如此高度统一？难怪一群一群的中国人在国外会让人感到害怕。所以，生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你没有，你只是在思考党让你思考的东西；你以为自己有是非观，其实你没有，你认为的对错不过是党让你认为的对错。

古语有云：“善未易察，理未易明”。大家都认为是善的东西，未必真的是善；大家都认为有理的东西，未必真的有理。但想要独立地思考一下什么是善、什么是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跳出历史形成的或统治者划定的思维圈套，需要巨大的怀疑精神以及极强的反思能力，而这又是强调“合群”的中华传统所不允许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脑中从小被灌输的思想作斗争。我不停地思考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成就什么，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这只是我生活的方式。假如说我的不是一无所获的彻底虚无，那么我认为唯一有点价值的就是我这些或许偏激的思想了。可是这些东西，却又难与人诉说。没有人听，又有什么用呢？全然没有

意义。每每想到此处，我都感到莫名的孤独，仿佛人生被抽成了真空。为了使人生不至于堕入彻底的空虚，我把这些思想写下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中的有些观点前后矛盾，这是因为这些文章各自写于不同时期，期间我的想法已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也不回避我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也不想调和这些矛盾（当然有些矛盾是要调和的，有些则不必），我更愿意保留这些矛盾。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矛盾体，并不具有唯一正确的解释。我更愿意展现一个立体的思考，展现我对社会思考的多重脉络。因为这样做更接近于事实本身。

目录

第一编 人间	1
被遗忘的大陆	3
从上海到西雅图	7
隐居海外的中国人	15
李光耀、英国脱欧与特朗普	29
关于自由与民主	35
留学有感	43
第二编 世道	51
“新时代”的城市文明建设	53
中国的大事与小事	55

论中国人的自信与自欺	59
杨女维权记	65
马基雅弗利在中国	69
潘金莲的贞节观	73
人民的名义？	77
领导与中国特色	83
中国特色的文明与正义	89
第三编 天理	99
反对孝文化	101
儒家与宗教的再反思	115
韦伯与中国	119
论法治的意义	127
毛泽东与“大一统”	137
论有限与无限政府	143
读史札记：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151

金钱与资本主义	183
---------	-----

第四编 人生	191
---------------	------------

致父亲信：我的精神危机	193
-------------	-----

自我与记忆	209
-------	-----

幸福、读书与人生的意义	213
-------------	-----

我的精神家园	217
--------	-----

与时间相处的方式	221
----------	-----

人生的境界	225
-------	-----

第一编 人间

被遗忘的大陆

我来到了堪培拉。这个中国人戏称为“堪村”的地方。这个城市几乎无法给人任何“都市”的想象。我坐在出租车上，在崎岖而空旷的公路上奔驰。看不到高大的建筑，四周是大片的绿地和树林。公路像扎入土地的树木根须一般蜿蜒地扎入树林的深处。房屋则像哈巴狗一样匍匐在树荫之下。没有地标，没有方向。车行处，都是相像的树木，类似的房屋。没有特色，有的只是平静。天湛蓝而宽广。松散的云如水彩颜料般被随意地涂抹在苍天的巨幅画布上。苍穹下，半秃的树枝漫不经心地摇摆着。似乎无意欢迎我这个远方的来客。

这座城市冬季时常下雨。而且是那种绵绵如丝的雨。他不像中国的北方城市那么硬朗。他的气质更像是一种散漫的温柔。司机问我：这是我们的首都，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我说差不多吧。我正想来这样的地方。远离任何喧嚣的地方。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对澳洲这片大陆很感兴趣。澳洲，似乎是一片被遗忘的大陆。美洲、欧洲抢占了太多新闻头条。人们几乎很少注意到南半球这片大陆的存在。被遗忘的大陆——我喜欢这样称呼澳洲。这片大陆正适合我，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从公司辞职，我没有犹豫。我还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办公室里。与世无争是一种奢侈，粗茶淡饭是一种罪恶。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高处，看不见低处的芸芸众生。我想远离那种力争上游的生活。远离那个功利的社会。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成就一些东西？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人的竞争观念是残酷的：你必须力争上游，不进则退。有来自周围人的压力，有来自自己的压力。你必须竞争，较量，伪装，倾轧。在这样的观念下，人被残酷的观念和永无止境的竞争所左右，直到丧失自我。我发现这一切是多么得愚蠢，我无法改变，我只想逃避。

当人们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的从来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想象中的自己。人们总是喜欢想象自己的样子，总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人”的阴影下，从来不正视当下的自我。当自己和那个“什么样的人”不一样时，便不停地自悔自责。你为什么不忠于当下的自己？忠于当下的自己，当下的自己的感受，当下的喜怒哀乐，当下喜欢的人，当下喜欢做的事。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发现，未来之路不用规划，它会自然铺开。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忠于自我。人也只能忠于自我，人只能成为自己。

我们的社会就好像浩瀚的大海，我们每个人大海中的一滴水，千万水滴汇聚成汪洋。在这个社会中，有少数头戴光环的人好比

浪花处的水滴。当人们看海的时候，只能看到绚丽的浪花。然而水滴永远无法选择能否站在浪尖上。你只能等待某股涌流，或某阵海风，把你推上浪头。你只能做你自己，是否能被推上浪头，却不在你。所谓命运，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他的确存在，但你无法把握。

时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你的幻觉。时间存在于钟表上，存在于日记上，但在现实中，它是不存在的。我喜欢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未来也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未来，不过都是现在。假如人能活在当下，他就拥有了未来。这种认识，算是这几年来我最大的心得吧。

窗外树影婆娑，几只鸟儿惊慌失措地阵阵鸣叫。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想再考虑什么未来，就让时间缓慢流淌，流向他想去的地方。

从上海到西雅图

没受过欺负的脸

这是我第二次飞往美国，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好奇和兴奋，更多的是长途飞行的不适和疲惫。

一路上，不知怎么的，我脑子中不停地想起陈丹青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在中国，这样的脸难得一见——所谓的社会制度，看似复杂，无非不过两种：一种是相互欺负的等级制度，一种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制度。

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也颇震撼于美国社会的包容和自信。虽然关于美国的种种，在国内都有耳闻，但亲眼所见，还是会感到惊讶。美国文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可以被概括为某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它极大地鼓励并保存文化的多元性，极大地包容和尊重不同种族、不同习俗、不同个性的人。这种多元

文化是难得的：一方面，不同文化习俗之人的价值观会存在巨大差别；而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多元而稳定的社会团体，则意味着要建立一套能被不同文化和民族所普遍接受的制度和价值观。也许，美国多元化的成功，或多或少能说明平等、尊重、自由、人权等价值标准有一定的普适性吧。

在这种极大包容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变得自信。因为，无论他来自何方，何种肤色，是贫是富，他都能平等地被尊重。他不必因为自己的收入、地位或出身而感到矮人一头，也不必对人低声下气。而中国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恰恰在制造这种不平等，皇帝与臣民，长辈与晚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因此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永远处于被欺负的状态，永远要对自己头上的人低声下气，永远不能昂首挺胸的做人。

陈丹青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自信与否是表象，制度才是根源。人是否能自信地做人，归根结底要看他是生活的社会是“互相欺负的等级制度”，还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制度”。

如果让我说美国哪里优于中国的话，我首先会说的便是——对人的尊重。美国文化中，每个人都不会丧失尊严；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不会剥夺别人的尊严。而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是一种建立在人压人、人吃人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区别，优先于物质条件、社会福利、技术水平等其他的一切，因为这是关乎人之生存的最根本问题。

理直气壮欺负人的国度

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懂得尊重别人，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如何为别人好，那么他一定是十足虚伪的。就好比我中学时见过某些老师，借惩罚之名将学生殴打得七窍流血，还说这是为了学生好，这是何等无耻！所谓“打是亲，骂是爱”，简直就是最操蛋的霸王条款。不仅打了人，还把打人合法合理化了，甚至道德化了，实在荒谬之极。

同样的荒谬处处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统治者明明把枪口对着自己的人民，却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明明侵犯的人权，却说是为人民的福祉着想。这样荒诞的逻辑，居然还有人奉为真理，谓之“中国特色”。

著名作家李敖借送儿子上学之机到北大做了一场演讲。让人惊讶的是，全场演讲，他居然几乎没有批判共产党。李敖这个人，见谁都骂，骂国民党，也骂民进党，骂台湾，也骂日本，唯独不骂中国共产党。一向鼓吹自由主义的他，到大陆来居然也搬出“中国不适合民主”之类的论调。

共产党若说真有什么让我佩服的地方，那便是他有这么一种能力：他强奸了你，而且还让你相信，如果不是他强奸你，你就不可能生孩子。中国人民明明被他欺负，他还让你相信，如果没有他“欺负”你，你将无法发展。凭借这种能力，共产党有如此号召力，实在令人称奇。

短视的中国人

即使是在美国，你也会惊奇地发现，到处有中国人开办的补习班、奥赛班、冲刺班。中国人已经把应试教育搬到了美国。

所以中国人搞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绝非因为人口太多；即使到了地广人稀的美国，中国人也还是喜欢搞这一套。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应试教育，即使到了美国也恋恋不舍？

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有考试就存在应试技巧，但唯有中国人将这套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急功近利的心态与小聪明的技巧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人喜欢比较，有等级就有高下，有高下就有比较。中国人不仅喜欢把自己与别人比较，也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较。在这种比较中，中国人的短视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作比较只盯住那最切近的结果。孩子在上学时最切近的结果就是考试成绩，要比成绩就难免要应试教育。哪怕能把比较的目标放长远一些，意识到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不仅涉及考试成绩的比较，还涉及到其他方方面面的比较，也不至于把比较的目标只锁定在考试成绩上。

平民社会与大众消费

都说美国人生活水平高，但是你如果来自中国的大城市中产阶级，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朋友拉着我逛了西雅图地区的两个商场，据说有一个比尔·盖茨带着她女儿也逛过。我的感受就是三个字：平民化。不管多大

的商场，没有那种奢华的贵族气，也没有中产阶级的小资气，而是显得平亲切，虽然琳琅但不浮华。这里有昂贵的奢侈品，也有廉价的大众货，可谓雅俗共享。总之，这是一个平民的市场，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消费、来提高生活品质的自由市场。这里不是上海，所有的商场都带着些许奢华的小资气，本能地排斥没有品味、不懂时尚的低收入阶层。

这让我怀疑，我们的城市发展、购物中心建设，是否服务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财富、自由与经济发展

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赚钱？你为什么想变得富有？

我想金钱本身并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金钱所能带给你的东西。我们追求财富，其实是追求财富所能带来的东西——物质的丰富、名誉地位以及价值感。而对于广大的多数人而言，物质享受也许是财富所带来的最直接的东西。物质的富足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求，比如金钱鲜有带给人精神享受；但物质的匮乏却能相当程度地限制人的自由。

所谓的“财务自由”，就是说人的自由不再受财务所限的状态；当财富足够丰富，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自由。财务自由使人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状态，于是人才能充分地表达和发展自己。这时人才真正“解放”了，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

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一个空洞的数字，而是为了促进每个人的“解放”，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财务自由”。经济发展首

先使人免于为了生存而挣扎，其次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发展自己。

美国人很懒，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很高。经济发展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使一国人民工作更少的同时生活得更好。每当我在超市里看到那些包装精良的宠物食品时，都不禁感叹，发达国家的狗都要比欠发达国家的人过的生活更好。

这几天，我不停地问自己，如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生活富足的国度，如果我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就能满足生活的所有用度，有宽敞的房子和漂亮的花园，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休闲度假，我的人生追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会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吗？还是仍然会有雄心壮志？如果我们生活的国度足够幸福，制度足够完善，我们没有反抗的目标，没有变革的需要，那我们还会有奋斗的目标吗？还是会满足于这个国家提供的安逸的生活？

大家都说中国人勤奋，其实那是因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贫穷之中，如果你不勤奋，就吃不饱肚子。中国人的勤奋与抱负，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中的、千疮百孔的中国。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当然也会有不安分守己的人，也不乏雄心壮志的人，但那似乎纯系个人选择，而鲜有任何社会责任的担当，鲜有任何家国情怀可言。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成功观

中国人所谓的成功和美国人所谓的成功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相同的内涵在于都包括金钱、名誉等东西。不同的内涵在于，中国式成功还包含着一种优越感，有一种优于别

人、高别人一等的意味。

再回到之前提过的一句话：所谓的社会制度，无非两种，一种是相互欺负的等级制度，一种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制度。在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里，成功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等级”，必然意味着可以更多地“欺负别人”。而在平等的社会里，无论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里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他在人格尊严上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

我从小生活环境里，所谓成功，或多或少地包含这样一种等级观念，即认为成功是一个单一维度且可比计较的等级划分，人与人之间的“成功程度”是可以排序的。假如把所有人列成一个名单，是可以按成功程度排个序的。直到近几年我才慢慢扭转了这种观念。所谓“成功”其实是个相当泛泛不实的形容词，“成功程度”更不可能排个序出来。

这是一个平铺开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存在。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样地平庸。诚然，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天赋、努力、野心、运气等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成就，但仅此而已。成功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了超过常人的成就和认知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此而变得高人一等，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特权，不会因此而凌驾于别人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也都是平凡的。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值得万人景仰，没有人理应领导其他人，没有人该被历史铭记。没有伟人，所有的人都是平凡的存在。一个人不应该被他人铭记，人也不应该以被他人铭记来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

隐居海外的中国人

隐居海外的中国人

全世界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共识了。在墨尔本，下了飞机，你就会看到中文写的大招牌“欢迎来到墨尔本”。在美国，即使你走到再偏僻的小村落，也会看见中餐馆（据说美国遍地散落的中餐馆数量比麦当劳的门店还要多）。即便是在中国的世仇国家日本，中国人也是成群成群的聚居。

中国人遍布全世界，中国人到哪里都习惯建立自己的圈子。中国人喜欢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不是融入到当地社会。所以你会看到哪里都有唐人街，即便没有唐人街，中国人也习惯混迹自己人的圈子。凡是华人聚居之地，他们都会建立起相互的人际网络，他们管圈外的当地人叫“鬼佬”。

我们是有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不会像其他移民一样，不会像阿拉伯人或印度人那样融入当地的社会。你

从未见过有什么印度街或阿拉伯街，但一定会有唐人街。中国人喜欢聚在一块儿，但却不见聚在一块儿的中国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唐人街总会有，但唐人街总是默然地存在，仿佛西方世界中的一块孤岛。你从不会听说某地的唐人街是当地的经济、文化、金融中心，你也不会听说某地的唐人街聚集了当地重要的公司、领袖或人才。相反，唐人街里的店铺坑中国游客倒是时有发生，中国人坑中国人，并不稀奇。唐人街的存在不是为了向外人展示我们“唐人”的风貌，也不是为了向外人传播我们的优良传统；唐人街倒更像是一座“避难所”，中国人在外国无法习惯异国生活而来投奔的避难所。

中国人到哪儿都是中国人，然而中国人却并不愿意呆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宁愿蜷缩在异国他乡狭小的唐人街里，或者宁愿在异国他乡过默默无闻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另一片国土，有的人是为了闯荡，他们也许看到另一片土地上有更多的机会。但更多的中国人似乎更像是逃难，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呆在中国，而选择到另一片土地上做一个“隐士”。中国游客也许素质不高，但中国来的移民却不是这样。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当地的“模范公民”，他们遵守法律，从不闹事；即使被侵犯，也通常不会大动干戈。中国人讲“和”，从来不愿招惹是非；但是中国人也不会毕露锋芒，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所感受到的海外中国移民，大抵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所以我称他们为“隐居在海外的隐士”。

迷失的中国人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曾经是很拘谨的异类，但那是“曾经”；现在的中国人在国外，早已不再谨小慎微，中国人开放的很，他们什么都尝试，他们无所顾忌，即使有语言障碍，他们也绝对游刃有余。现在你在国外看到谨小慎微的黄种人，那八成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近代以来，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代表着先进，从科学技术到文化习俗。中国人觉得西方人更友好、礼貌，这是一种先进；西方城市更整洁，环境更优美，这也是一种先进。而且中国人普遍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我们的经济发达了，我们也会过上和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只要我们富裕了，我们中国人也会更有素质。

可是中国人过去又何尝不是彬彬有礼？中国人注重礼节，以致过于委婉，中国人曾经不是这样的吗？不知什么时候友好、礼貌、素质这些词成了发达国家的特权。去过非洲的人告诉我，即使在非洲一穷二白的村落，村民也是很友好的。去过俄国的人告诉我，即便苏联解体后，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人们也没有乱了秩序。孟子说人性本善，除非环境所破，否则谁愿意与人为敌？我不相信中国人的祖先是野蛮人，也不相信中国人天生没素质，只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某些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故有的礼节和习俗。只有在一个社会中，人必须要靠斗争而非和谐才能生存，人必须要靠竞争抢而非礼让才能生存；只有在一个社会中，善良的人无法独善其身，而恶行不会得到惩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会变恶。

如今的中国人，正是因为过去在那样的社会中成长，所以才

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礼仪，反而去羡慕西方人的礼节。如今在中国，向人打招呼的标准方式是什么？这也许都成个问题：“喂”太过粗俗，“你好”过于正式，叫“同志”似乎过时，叫“先生/小姐”也不合适。任何文明国度都有自己的一套礼节用词，中国人的礼节如今退化到这种程度，恐怕不能怪西方文明入侵之故吧。

如今在外国，你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表现出最明显的特质就是那种既自我封闭，又无所敬畏的气质。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精神面貌，他们身上带着自己民族历史的沉淀，带有来自自己文化的拘束感。但是在中国人身你看不到这种拘束感，这就是丧失了历史积淀的一代中国人给人的印象。他们是中国人，的确，他们总是成群聚在一起；但他们没有根基，他们没有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文化气质。站在西方的国土上，他们是迷失的一群人；他们显然不属于眼前这片土地，这片文化；但他们的崇洋情结和传统熏陶的缺失，使他们也不认同来自他们本国的文化。这就是今天这代中国人的处境，在传统礼教被摧毁、西方文明入侵和愚民党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迷失的一代中国人。

文化衰弱的根源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咒骂西方价值观侵蚀自己的传统，一方面他们又对西方的一切充满莫名奇妙的崇拜感。

电影《百鸟朝凤》讲的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唢呐文化在社会变革中逐渐被边缘化，直至消失的故事。看完颇让人扼腕叹息，在中

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淘汰”的传统文化又何止唢呐一件？影片中着力突出了西洋音乐的入侵，西洋管弦乐、电子乐，取代了中国民间的音乐形式，成为人们欣赏的主流。但是西洋音乐抢占了中国民乐的饭碗，恐怕不是中国民乐没落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载体，中国古代农村男耕女织、单纯粗粝的生活形态孕育了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如今我们过去持续上千年缓慢从容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在这样的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岂能独善其身；与现代浮躁而快节奏的生活相适应的电子乐流行乐成为主流，也就不稀奇了。中国传统文艺的衰落，要怪的话，恐怕不是西洋乐的入侵，而是打破了中国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那群人。

我们抱怨中国在文化上弱势，不如西方文化强势，有人将之归咎于中国国力衰落之故，以为倘有一日中国像美国一样强大，那么全世界都会对中国文化趋之若鹜。这种论点实是颠倒了因果。就以音乐为例，且不说中国乐曲在世界上影响力几何，即便是在国内，又有多少中国人在欣赏？中国大城市里的文艺生活设施相对完善，如果有人喜好，可以去听音乐会，去看演剧，都有机会；但到了中小城市以及县城，你几乎看不到市民有什么文艺生活，没有音乐厅，剧院可能已被废弃，没有街头艺术，在街头吹拉弹唱的人一般都是乞讨者。文艺生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本来就小的可怜，普通中国公民接触文艺的主要渠道恐怕只有电视了。但是在文化事业发达的国家你会发现，街头艺人随处可见，他们不是乞讨者，他们的演奏成为街头独特的风景；餐厅里、商场里，随处都可听见乐队演奏音乐；甚至像墨尔本这样的城市，街上墙上到处都画满了涂鸦。于是他们的音乐和艺术从民间走上舞台，

从国内走向国外，从而形成自底而上、由内而外的繁荣。可是中国呢？文艺在民间就是衰弱的，你又如何能指望它走向世界？在古代，能听曲子的地方恐怕一个是宫廷里，一个是妓院里；玩弄曲乐是“玩物丧志”的东西，我们从未像西方国家一样把它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来看待。如此这般，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文艺能席卷全世界？文化的其它领域也差不多；如果你没有好东西，别人自然无意接受。假如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了，中国文化自然在世界上话语权就大了，这是可能的吗？中国如何能强大？那需要中国在文化、军事、科技、教育、艺术各个领域都强大起来，中国整体才能强大，这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而非反之。若想要中国强大，就要使得各个领域都发展起来，而后才有全中国的伟大复兴。而现实中我们却恰恰在反向操作，顶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以维稳和统战为指导思想，压抑和阉割各个领域的创新（特别是文化领域，自然科学稍差），导致中国在文艺思想领域长期侏儒化。指望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复兴”了，于是中国文化就走向世界了，这是本末倒置。

中国文化衰弱的根源就在于，文学、艺术、音乐等种种文化形式一直以来被统治者当作宣传的工具，以至于长期以官方意识形态压制民间文化成长的空间，最终导致文化领域的全面侏儒化。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再怎么强调“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徒劳。至于传统文化，我认为并无需过度担忧，精华的东西自然会留下，糟粕自然会被淘汰。

文化如何传承

中国人总觉得，假如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便失掉了自己的价值观；假如学习了西方文化，便失掉了自己的文化，于是便国将不国了。

其实两者并非水火不融，看看人家台湾？人家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可人家也没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人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还不比我们差。

所谓的儒家文化，或者说儒家价值观，也可以粗略的说是东亚文化，东亚价值观。重视家庭伦理、讲究君子之风，这些儒家倡导的东西，不只在中国适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也都实践了这些价值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确表示要保留东亚价值观，可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却也并未妨碍这些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也许我们过度地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却较少关注二者的共通之处。在我看来，我们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西方价值观所强调的尊重和人权并无二致。我不希望被欺辱，于是我也不欺辱别人，其实就是所谓的“尊重”；我不希望被迫害，于是我也不去迫害别人，把这种逻辑推广到全人类身上，就是所谓的“人权”观念。我们所讲的儒家理想，“民贵君轻”，其实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上是相通的，只不过后者还包含了制度上的意义。

所以所谓“普世价值”，我认为是存在的，这并不只是什么西方的价值观。大凡是人，都有相似的追求和欲望，比如安全、尊重、自我发展、真善美；在这种理想上，中西方乃至世界，并无二致。区别只是在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上，你是找个皇帝治理全

国更能保障人权，还是大家投票选个总统？很多时候，我们把政治理想和政治手段混为一谈。

假如我们引进民主制度，那么可能会颠覆共产党的专政，但那不见得会摧毁中国文化。试想两种制度下的中国：一种是像台湾一样民主制下的中国；一种是像现如今大陆中共一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两种制度，哪种更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恐怕还得画个大问号。中国人很奇怪，一方面拼命想保护自己的文化，一方面又拼命摧毁自己的文化。过去，我们为了破四旧，把观音庙砸了；后来，为了发展经济，修水库把千年古镇给淹了；再后来，发现国人倒向西方了，于是又在天安门前修了个孔子像，把传统经典夹杂着党化教育思想写进课本。这些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不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后朝推翻前朝，都会把前朝的宫殿烧了，把前朝的文人杀了，然后再自己建一套。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时中国人就是这么肤浅。如今我们在大声疾呼，防止西方文化入侵，那倒底是为了保护中国文化还是为了维护某些人的统治？

文化在于传承而非宣传，只要传承还在，中国人就算移民美国也还是中国人；可传承断了，再拿大喇叭喊“复兴传统文化”也是没有用的。假如儒家观念不在人们心中，你在天安门前放一千个孔子像又有什么用？而文化的传承有赖于包容的政治环境，你不能因为它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或政治错误的，就把它推翻、摧毁。而自由、民主的政治无疑比一党独大、统一思想作风的政治更具包容性。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比我们传统文化气息更浓郁的原因，也许他们不会在中正广场上竖孔子像，他们也不会电视上天天宣传传统价值观；但他们也不会粗暴地破坏历史文物，也

不会因为政治错误去迫害思想守旧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抵制西方文化是无能的表现；摧毁传统文化的，并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我们自己。

对错并不重要，回看历史，最让我们受伤的，恰恰是我们曾经认为是“对”的东西。真正重要的不是对错，而是当大多数人认为“对”的时候，是否也能给那些“错”的人生存的空间。假如我说鸦片战争是中国人自找的，恐怕马上就会被吐沫淹死。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不是对错，而是对异议的包容和尊重。

私德与公德

中国人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的民族。在国外你从来不会看见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思想品德课，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中国，你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你也随处可见向榜样学习的好召，在高速公路上，老远就能看见巨大红色的条幅——

向郭明义同志学习！

尽管如此大力宣传，仍然无法阻止所谓的“道德滑坡”，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如果你在中西方都生活过，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和统治者永远处于对立的两端。这种对立不会明目张胆，我们不能像自由国家的人民一样出去游行，但这种对立在背地里永远存在。

98 年抗洪时，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大家众志成城地抗洪，解放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而实际发生的是：“基层干部动员群众去抗洪，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反而更希望洪水能淹过他们自己的农田和家园。因为不管淹了多少国家都会有补贴，家被冲了更好，房子老旧早该换了，如果国家不给他们合理安置他们就会闹，更有甚者谎报家中财物要求更多的补贴。”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再比如拆迁安置，中国没有土地私有的规定，政府也无意照顾百姓的感受。政府想用地，你就得搬，不搬就强拆；而老百姓也不会为公家考虑，既然有拆迁补偿，就要借此机会敲他一大笔。政府怕乱，于是不遗余力地控制言论，镇压群众运动。老百姓也明白，自己被政府压迫，所以不遗余力地空挖政府墙角。中国的百姓和政府就是这样一直处在明不争但暗里斗的对立状态。

长此以往，中国老百姓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国人讲私德，而不重公德；他们知道公家的不是自己的，他们只想从公家挖墙角，哪里会重视什么公德。

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讨论税收的文章，外国人讨论政府该收多少税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在中国，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讨论中国和美国什么时候开战，而从未讨论过自己该交多少税。税向来是政府盘剥老百姓的重要手段，自古如此，从“折色火耗”

到“淋尖踢斛”，想方设法从老百姓口袋里多挖走一点。老百姓只有接受的份儿，在税收上，老百姓向来没有任何话语权。所以中国人不会像外国人一样“斤斤计较”自己交了多少税，对我们而言，政府是对抗的对象，是挖墙角的对象，是站在我的个人利益对面的一方；而对人家而言，政府是公共生活的保障，是可以进言献策，可以使其改变、使其更好地为民服务的共同体。当人们可以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当政府不在处于和人民对立的一面，当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份子，当每个人都把这个共同体当作自己的家的时候，公德自然就形成了。

公民社会的意义

在缺乏参与感的社会里，即使官方再宣传“文明”、“和谐”也注定是收效甚微。因为人民知道，那只是宣传，那与己无关。这就是民主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当人们讨论民主的时候，人们只注重政治上的含意，而没有关注到民主对社会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民主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不在于选举，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会创造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属于人民的国家。民主不是治疗中国任何问题的万能药，但中国的诸多问题，其根源实在于公民社会的缺失，以上关于公德的讨论就是一例。

中国人爱国吗？也许中国人很爱国，但这个中国不过是个空架子；它是教科书中宣传的，是统治阶级灌输的，是畸形的历史观下形成的自大与傲慢的载体；而不是由万万血肉之躯组成的。这种爱国观并非源于人们理智上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而是源自长期爱国教育所形成的偏执。所以你看当中国人说抵制日货时，那种

情绪活像一个发脾气的小孩儿，而非一个审时度势的大人。所以在中国有这样的奇怪现象：左派骂右派卖国，右派骂左派愚昧。

中国政府怕乱，因此不遗余力地镇压各种言论、各种群众运动，以为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可实际效果却是倒行逆施。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有表达意愿的正常渠道，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暗地里和政府斗争。倘若你压制了这种渠道，那么这种斗争就会转为暗地里，形成前文提到的无休止的挖政府墙角。当人们去游行，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去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这种共同的表达中，人们会发现自己与这个群体的关联，人们会发现自己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有共同的诉求，人们于是会形成团体，这才是真正的团结。倘若没有这种共同利益的表达，人与人永远是被割裂的，再宣传“团结”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人认为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如果不宣传爱国，国家就会分崩离析。有人认为像美国这样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一旦国力不济，就会一盘散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人民才能与国家同甘共苦共患难。但事实恰恰相反。托克维尔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这样说道：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看似统一，实则脆弱，一旦发生危机，没有人来援救它，人人只求自保。因而大革命一爆发，便兵败如山倒。同样的道理也适合中国，这个国家看似统一，实则一盘散沙。

在国民长期缺乏社会参与，人民长期与政府对立的情况下，一旦中共政权发生危机，没有人愿意援救他，大家更情愿看着它倒台；就像苏共倒台时一样，几万党员没有吭一声，就这么默认它倒台了。国人习惯将苏共垮台归咎为美国的阴谋，并以此为前车之鉴，可是为什么苏共倒台时苏联人没有任何人声援他，就这么

看着他倒台？是全苏联人都受了美国的操控，还是苏共自己的问题？与其说是美国的阴谋，我倒认为这就是一个长期压迫人民与人民处于对立面的政权的必然结局。

关于社会公德的问题，我想再多说几句。人们似乎认为完美的道德是一种理想状态，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有不断宣传灌输才能使国民不断接近这种状态。

可是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爱国、不敬业、不诚信、不友善，难道是因为宣传灌输的不够吗？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当然不爱国，就算爱，也是因为受了蛊惑。在长期缺乏社会参与的状态下，个体的人与社会形成一种暗中对立的关系，而个人又无法反抗，于是只能消极怠工，于是形成一种“混”的心态，这种心态带到工作中，就是不敬业的表现。同样，因为没有社会共同体，没有公民社会的存在，人与人都是独立的，因此形成了国人冷漠而相互倾轧的习惯，所以中国人不诚信，不友善。树立道德模范有用吗？大家都知道，那只是给别人看的。

假如人们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形成社会共同体，既然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为它贡献力量，也从中受益，那么大家自然想把这个共同体维持好下去，这样所有人都会受益。当一群人决定共同生活，并自愿为了共同生活而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比如不能随意侵犯别人），道德便自然形成了。

所以，有人说民主不重要吗？

李光耀、英国脱欧与特朗普

对民主的质疑，最广为接受的观点莫过于“国民素质论”，即低素质的国民不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反而不如没有民主。

连李光耀都说了，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中，除了韩国和台湾，其他国家的民主都不成功。李光耀虽然是伟大的政治家，然而他对民主的理解并不全面，而且很有误导性。

李光耀说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并不成功，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比如拿印尼为例：的确，如果和台湾比较，同样都是民主制度，但经济发达水平上差一大截。可是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这种比较既不能证明民主制度适合印尼，也不能证伪。如果真如李光耀所说，印尼的民主并不成功，那么意味着，如果印尼实行非民主制，它会更成功，可事实真的会如此么？

李光耀说：“美国社会之所以能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繁荣，并不是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

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个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

民主制度本身从来不能保障经济的成功。但那经济成败来否定民主，则是偷换概念。拿美国来说，如果给定它的地理、资源、人口、资本、技术等等，要想否定它的民主，其实等同于说，同样条件下，非民主的美国会比民主的美国更繁荣，这可能么？恰恰相反，美国之所以能吸引移民、资本和技术，难道与它的民主制度没有关系么？

这种偷换概念的思维方式，会给人一种错觉：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经济高速发展，全系中国特色制度的功劳；如果走民主制道路，就会和东南亚国家一样。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工业之积累、人才之水准，跟东南亚国家本无任何可比性。中国经济发展是由于“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无非就是把人民自由做生意的权利还给人民。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系千千万万企业家、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功劳。换言之，是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成就了中国经济，而不是什么“伟大的党”；是人民成就了中国的看似“制度优势”，而非反之。

在市场经济里，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持一个有序、法制、公正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企业的竞争和发展，而企业是创造产品、服务和价值的主体。如果说所谓的中国特色制度比民主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利的话，无非是说前者比后者为企业和劳动人民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可事实是这样的么？

认为“低素质人民运行不好民主”的人，的逻辑无非是：低素质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不如少数精英的个体智慧。这又是一种

偷换概念。要知道，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掌握权力、实施政治的人，都是少数“精英”。你不能说美国的政治、经贸、外交、国防等等决策是人民的决策。即使在美国，这些决策也全是少数政治人物谋划的，和中国并无二致（当然这里先不考虑制度细节，美国需要议会通过，中国需要人大表决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民主解决的不过是权力来源的问题。民主和非民主的区别不过在于，政治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还是世袭或内定或其他；这两者之间，谁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利益。

否定民主的人总是纠结于民主决策结果的“对错”，认为低素质的人民会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请问，什么是“对错”？有普遍接受的、绝对的对错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价值、偏好、品位，你如何界定绝对的“对错”？民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在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前提下，做出了最直白、恐怕也是最好的妥协，即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根据阶级或者地位来界定话语权的大小。

民主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了每个人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而非民主制度下，这种机会是被统治阶层垄断的。因此原则上讲，该不该有民主，不取决于民主决策结果的“对”或“错”，而完全取决于我们该不该给每个人（即使他是“低素质”）一个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否定这种机会，认为社会底层的人民不配享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这几乎等于否定了全部人类美好的道德理想——对平等的追求，对弱者的同情，对人权的尊重！

英国脱欧以后，遍地都是对民主的质疑——看吧，无知的英

国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种事情就不该交给人民去决定。我怀疑这些人到底真的理解民主是什么么？你觉得脱欧是“错误”的选择，那么它就真的是错误的选择么？英国脱不脱欧，本来就是有利有弊的事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假如说脱欧一定是对的或者错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不会有什么公投了。民主的意义不恰恰就在于它给了所有公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吗？假如没有民主，这种事情就完全由统治阶层决定，然而统治阶层代表的只是统治阶层的利益，谁能保证他们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有些人认为，统治阶层的“精英”比底层人民更懂得怎样做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然而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在国民自身的利益无法表达的情况下，我不知道那个国家“整体”的利益指的是什么。看看卡梅隆在公投脱欧后的演讲致辞中说了什么：“我们应该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相信人民是重大的决策者。”“我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在欧盟内将会更加强大、安全和繁荣。”“英国人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他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英国不愧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他们懂什么是民主，也懂自己在干什么。国内那些舆论家还是歇了吧。

美国特朗普胜选后，又是遍地质疑之声。特朗普之所以争议颇大，因为他某些夸张的政治主张（贸易保护、驱逐移民等等）背离了美国一直以来倡导的价值观（自由、开放、包容）。于是大家又说美国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然而我认为特朗普的胜选是美国民主最伟大的胜利。一个出色的商人，和一个在官场里浸润多年的政客，我至始至终都站在

前者一边。然而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商人，居然能一步登天当上总统，这在非民主制度下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却成为了现实。这难道不是民主的伟大胜利吗？

特朗普当选后，特朗普挑选的内阁也全部来自商界，一改之前的政治家和学者风格。通过大选实现的这种政治换血更新的能力，在非民主的官僚体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也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如此强的生命力。美国自成立以来，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发生或惨烈的内战，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它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恰恰是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可是如果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话，它“引以为傲”的体制还能延续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那个时候，没有人民会声援它。因为在人民群众无法发声的国家，“国家”和人民本就是割裂的。

最后说一句，假如中国实行民主的话，我认为会是最成功的民主，会比英美还要成功；而不会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因为中国人民“素质低”，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君不见，公园里，屋檐下，茶余饭后的老人都在探讨中美关系。没有哪国人民比中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家国情怀”。因此假如中国有民主，一定会是最伟大的民主。不过，这也许只能是梦幻了。

关于自由与民主

一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个体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及行动。自由主义即是说个人有充分发展自己之自由，个人不是任何组织，集体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真正的自由主义必先是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主义，即是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一切建构和活动的原始起点，个人处于比其他一切组织或集体更根本、更重要的位置。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任何社会秩序或公共权力，旨在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而非凌驾于个人之上，反过来将人当作集体的工具。

个人主义的基本特色是尊重个人，把人当人。只有在承认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即每个人都被尊重，每个人的人权都得到保障，每个人才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空间，个人才有充分的自由。另一方

面，对自由的追求也必然导致个人主义。追求个人之自由最大化，必会将一切压迫个人之石搬走。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个人至上，即成为个人主义。

二

从个人的层面上讲，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的权利去实现他自己的选择。他能选择他喜欢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不能被任何人剥夺或干涉。假如我爱上一个女孩，想和她厮守终身，那么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我就可以实现这种选择。倘若因为皇上相中了我的女孩，强行纳她为妾，这就干涉了我的选择，我也就失去了自由。再比如，我有一栋老房子，我就想在这老房子里安度晚年，那么我应该可以按我的选择生活。但如果政府为了开发土地，未经我同意强行拆掉了我的房子，强行让我动迁到别处，便是对我自由的干涉。

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任何人无权将其选择强加于别人，个人的选择与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便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和法治是同义词。有法治就有自由，有自由就有法治。在一个强权政治下，统治者可以随意牺牲别人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野心，那么便没有自由可言。

诚然，无论在何种社会，人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文明社会中的个体总要受到法律和规则的约束。但问题在于，执公权者，可在何种程度上干涉个人之自由？哪些方面可以干涉，哪些方面不可干涉？这就是国家层面的自由。其君所守之权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严复将《自由论》译为《君已权界论》可谓十分精当了。

三

若问今日中国之问题根源何在，当首推过大的公权，而社会之自由和法治无法得到保障。公权不受限，而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这两方面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一国之制度设计，务必使各阶级及各团体之间能产生有效的制衡，在对立阶级的两端，没有一方处于绝对优势，才不至于产生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的悲剧。比如，若工人阶级能对资本家阶级产生制衡（比如通过工会），资本家就不能过度剥削工人；若平民百姓（被统治阶级）能对政府（统治阶级）产生制衡，政府便不可能肆意鱼肉百姓。相反，如果作为统治阶级之政府占有绝对优势，则民权得不到保障，官僚作风横行，腐败在所难免。

政府掌握一切资源和权力，当这个权力越界时，没有人能阻止他，这是一切政治堕落的根源。信访制度根本就是虚伪的。体制内监督难逃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的结局。要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靠严抓严打根本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根本还是要靠能对权力阶级产生制衡的体制。

四

民主是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但民主，并不等于选举。民主有实质的民主，也有形式上的民主。选票、议会是民主的形式，而每个人心中的公民意识才是民主的实质。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国民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拥有政治参与之权利，认识到自己并非国家机器的工具，更非官员脚下的羔羊。

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实质，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制衡机制的。因为选举很容易被操控，人民可以轻易地被利用。比如俄罗斯，虽有民主之形式，并无民主之实质，实际上仍是普京大帝一手遮天。但若有民主之实质，形式反倒没那么重要。当公民意识十分强烈，即使没有民主的形式，公民也会自发保护自己的权利，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制衡。比如香港，虽然没有大选，但公民社会十分成熟，公共权力受到严格监督，所以虽然没有民主的形式，却有民主的实质。至于中国大陆，依我看，即使开始大选，两党轮值，也未必会产生民主。反倒很有可能，两党联手一起剥削人民。

所以发展民主制重在公民意识的觉醒。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停地接受思想启蒙，从鲁迅胡适到柏杨李敖。但直到今日，觉醒的依然只是少数。这其中固然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原因。制度很神奇，一方面制度是国民性的外化；但另一方面，制度又在引导国民性的形成。倘若一种制度重视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品质便会逐渐融入到国民性中，便会促公民意识的形成；倘若一种制度强调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那么公民社会形成的步伐就会慢很多。

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公民意识之觉醒。只有如此，中国之大问题才算解决。所以，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权利，就是为国家效力。那些鼓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稳主义之人，反而害了中国！要想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首先要确保自己不是奴隶。

五

我认同“民主不是普世价值，而是维护自由和人权的工具”这种说法。但是，虽然民主不算普世价值，我仍然认为民主是必须的。民主并不只是一种选举制度。所谓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意味着这个国家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党，国家领导为谁负责，法律为谁制定，军队听谁指挥。换言之，民主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严复所说：“两千年来中国所说的国家，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一家之兴；亡，一家之亡。”非人民民主主权的“国家”，焉能称为“国家”？只是某一家之国，或某一党之国罢了。我想仅这一点已足以论证“民主是必须的”这个命题了。当然，如果有人民说，我就不愿意当家做主，我就愿意寄人篱下。我倒是建议他多唱两遍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六

那些反对民主的人，理由无不是说民主有若干缺陷，民主效率低，等等。民主当然有缺陷，世界上哪种政治制度没有缺陷？问题是，如果不民主，如果独裁，我们是否能得到一个“缺陷更少”的制度？恐怕没有。就算有，也只存在于乌托邦之中。就像丘吉尔所说：“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东西。”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梦，即“青天大老爷梦”。总是盼着能有一个政治强人，即“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政治，于是就能伟大复兴，国泰民安。盼来盼去，落的个“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的结局。所以，我劝还在做这种梦的人，快醒醒吧。

总有些人认为，民主容易陷入什么民粹，倒是独裁能产生更优秀的领导者。他们说什么乌合之众，说什么大众的智慧不如精英的智慧。这种论调，听起来头头是道，可惜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不符。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出了多少明君，多少昏君？美国民选的总统也许未必都是优秀的领导者，但人家的民主运行了三百余年，至今仍未见衰退吧。非民主能发挥“精英智慧”？苏联的赫鲁晓夫？朝鲜的金三胖？

七

假如我们把一切非民主的制度称之为“独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独裁的罪恶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人民丧失了主权，无法发挥群众智慧。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会深层次的影响一国之文化与国民性。比如，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官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封建独裁的衍生品。

“中国历来只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论述，计划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一旦实行计划，它会深层次地影响社会结构，结果必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经济制度尚且如此，如果我们放弃民主，那真是更直接地“通往奴役之路”了。

你以为靠着政治强人的伟大领导国家就能走向康庄大道？强

人政治，以及围绕着政治强人建立起来的集权统治，必然会将整个社会扭曲成一个权力社会。唯上唯权的官僚作风盛行：对上，谄媚逢迎；对下，仗势欺人。想想反右和文革中的悲剧：人的一切人格和尊严都在权力下被扭曲和粉碎，直到最后所有人的脊梁骨都被抽掉了，全国上下都成为匍匐在权力脚下的奴隶。这到底是通往共产主义者之路，还是通往奴役之路？

八

有人说，你看，西方有民主，是有古希腊的基因在哪儿，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没有民主的基因，因此民主也不适合中国。那么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科学的基因，我们是不是也不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又有人说，中国近代也尝试过民主制度，但都失败了，所以民主不适合中国，“鞋子合不合脚要穿了才知道”。这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高考落榜了，于是你就说他不适合上学，只适合回家种白菜？

的确，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基因；正因为没有基因，所以尝试不那么容易成功（其实我甚至不认为中国曾经认真尝试过）。但如果一件事是有意义的，我们能因为没有天赋、尝试失败就回头去否定它本身吗？我从不觉得民主可以一蹴而就，民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适应的时间。一蹴而就反而是不好的，君不见，俄国的民主制度，表面上民选了，实际上“梅普二人转”。

所以中国适不适合民主？我想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再提这个问题了，那么中国的民主也就指日可待了。

留学有感

一

时隔多年再回到课堂，第一次向教授提问，有种莫名的不适应。印象中自高二以来我就再没有问过老师问题。中学的老师只愿意回答优等生的问题，非优等生的提问他们或者挖苦一番，或者应付性回答一下；而且你还要十分小心不能问重复的问题，不能问太简单的问题，不能问不着边际的问题，否则就会被批评。既然问个问题如此“危险”，我早早就已把这个习惯“戒了”。而时间一长，“不问”似乎成了我秉性中的一部分，于是再难开口了。遇到问题想问时，总有一个“我”跳出来把这种念头压下去；而我永远也打败不了这个“我”，一次一次被他战胜，正所谓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而现在我觉得似乎可以改变一下了，因为之前我的那些顾虑已不存在了。教授总说任何问题都是好问题，欢迎大家提任何问题；他也确实认真回答所有的问题，即使很“恼人”

的问题，或者重复的问题。所以当我举手提问时不必担心我问的问题太愚蠢，或者耽误别人的时间。

所以当普遍被尊重的时候，人们自然愿意分享；当没有人嘲笑你时，人们自然愿意表达；当我们对犯错宽容时，人们自然愿意尝试。都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善于表现自己，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对错”，而西方人讲“尊重”。大到国事，小到家事，中国人都喜欢讲究“对错”；在这种氛围下，人人都需谨慎小慎危，以免犯“错”。政治上“错误”会被打倒，生活中小的“错误”会被众人以不合群为由所排斥，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谨小慎危的个性。在中国只有少数“正确”的人可以发声，而其他人都“沉默的大多数”。争论什么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价值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不同人、不同意见的尊重，特别是对反对意见的包容，中国这个国家最缺的是这点东西。只有当任何观点、任何流派、任何个体都得到平等的尊重，人们才敢于表达，人们的潜力才能最大化发挥；而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发展之上的，我根本上不认为靠阉割人的思想，钳制社会舆论来维系国家稳定的政策能带来社会的发展。

二

上周日晚上我肚子痛得厉害，寝食难安，难以忍受，只好让室友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医院人不少，即便是晚间急诊，也有不少人等在等候、挂号。那人简单问了我一下症状，然后递给我两片扑热息痛和一小杯水，让我先吃了然后等候看医生。我迷迷糊糊在一旁的长椅上躺下，我痛得直不起腰，都是朋友在一旁交费、

预约，我问他多少钱，他告诉我看医生四百九十八。我心里暗暗叫苦，好贵，而且不知道我的保险包不包括；但没办法，我必须得看医生。国外医疗成本高果然名不虚传，我在长椅上痛得死去活来地等了约莫一个半钟头后，终于听见有人叫我名字让我进去，是个年轻的女医生，约三十多岁，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她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随即开始询问我的病情，问得很细，我每回答一问，她便记录一下，从症状的细节到我学习的专业都被她问了一遍。她让我在一旁的病床上躺下，取来仪器给我量血压、体温，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后背，按压身上不同部位问我是否疼痛，这番“原始”的检查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医院。现在去中国的医院，医生已很少“亲自动手”了，和病人交谈不过两分钟，然后就会开个单子让你去做化验和拍片。做完常规检查，她又在小本上写了一阵，然后给我一个瓶子让我去取尿样，取罢她把尿样拿走，让我稍等，她戴上手套拿着尿样转身出去，估计是去分析尿样了。回来后她说还需要验一下血，于是她又在我手臂上扎了一针，抽了三管血；取罢，她用特制的胶带把我手臂上的针固定了一下，但并未取出，让我稍等，于是她拿着血样又出去了。和中国的医院不同，我无需跑到化验区去化验，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医生完成了，我也无需为各项化验单独交费。等了良久，她把我叫到后面的一个病床床位，让我换好衣服在床上休息一下（医院专门给病人卧床准备的衣服）。稍许她回来跟我说，我的疼痛是因为肾结石所致，肾结石有时会导致肾绞痛，和我的症状完全一致。她要给我输液，主要是止痛药，但我不想让朋友等太久，况且之前吃的扑热息痛已发挥药力，我已不感觉疼痛难忍了。于是我提议不输液，直接回去，她还是建议我输液，说这些费用都

包含在就医费中了，无需再交任何费用。但我坚持要走，于是她给我拿来几粒药要我当场服下，然后又给我一盒药让我回家服用，我一看是一盒扑热息痛。

这就是我第一次境外就医的经历，那位医生全程负责问诊、化验、治疗，没有来来回回奔走收费台交费，没有跑来跑去化验，没有多余的药费，不用担心过度治疗。虽然挂号费很贵，但想想在国内若是血常规、尿常规、胸透做下来，再加上输液的费用，也未必比这儿少了。况且我不解的是，类似的病在国内也有发生，而且我也去过医院，但以前都被诊断为吃坏了食物所致，我如果这次不来医院可能仍不知道真正的病因。想想国内的医疗收费乱象，医患纠纷，不禁黯然。

三

中国的问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缺少信任，缺乏安全感。比如我去看医生，但我却不敢相信医生，我怕他给我乱开药；我去修车，我也不敢相信他，我怕他会乱收我钱；坐出租车，我也不相信司机，怕他绕路。在中国生活，你要么自己是内行，要么认识内行的人，否则便有可能吃亏。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缺乏信任，缺乏道德感。在国外则没有这种担忧，我去医院，我不担心医生会给我乱开药；去买东西，也不必担心商家会坑外国人；我去修车，假如零件没坏，师傅会建议我不要换，所以我也不担心他会为了赚钱而欺骗我。问题是这种乱象的原因何在？

很多人将此归咎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形成的一切“向钱看”的心态；而解决的方式无外加强道德宣传、竖立道德模范。

这些人往往怀念毛主席时代，认为那个时代人才有“道德感”。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过于肤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社会主义转变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诚然人们都“向钱看”，然而“向前看”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全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试看北韩和南韩，北朝鲜固然没有资本主义，然而也不见得道德水平更高。中国今天的问题，人与人缺乏信任，人人互相坑害的事实，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发生；这些问题历史上都有，并非什么由改革开放引起的弊病；人人相敬如宾这等礼仪之邦只存在于正史中。如果翻翻野史，当官的坑百姓，经商的坑顾客，庸医坑病人，这些人互相坑害、互相倾轧的故事，古已有之。

古代的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基督教最盛行的中世纪，恰恰是欧洲最黑暗的时期。西方人道最败坏，最肮脏最黑暗的时期，就是人人都顶着上帝的名义、满嘴仁义道德的时期。所以越是宣传灌输道德，社会越是不道德，这是全世界的通例。然而又总有缅怀过去、厚古薄今之人，这也是全世界的通例。

四

通过宣传和教化真的能让国民更道德吗？这种方式不但无助于改善，相反，我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缺少道德，恰恰因为我们这种愚蠢的道德观。

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长期以道德治国代替法律治国，以致缺乏有效的法治管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倘若要维持公平与正义，都需要有主持公正的制度，这种制度鼓励善良，正义的行为，惩罚罪恶、不公的行为。而在中国，在官僚体制下，社会的公正

长期得不到有效的主持；换言之，中国的官场意识形态窒息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依照圣人教诲治国，以名义上的道德掩盖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利益冲突，而缺乏通过法律途径明晰地规范每个人的权责和利益的制度，因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双重性格，一面满口仁义道德，一面又以权谋私。

在官僚体制下，决定社会运行的是人情、面子、关系、权力；官员遵守的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而非法律规定的权力与义务。因此无论是古代的衙门，还是现代的官僚机构都难以起到维持社会公正的目的。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官员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员管理能力更强，因为他们是从基层干起的，他们有经验。这种观点十分片面，完全忽视了官僚体系的弊端。须知中国古代的官员升迁制度下，官员也都有丰富的经验，可最后为何仍会亡国？在官僚体制下，假如官员升迁靠的是喝酒、送礼、搞关系，这种“升迁”体制下筛选出的官员，再有“经验”也是枉然。

儒家的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于是家庭和睦；君惠臣忠，于是天下太平。这种理想看似合理，但仅靠宣传君臣父子之伦理以期实现天下太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如前所述，道德治国，最终导致官僚化的系统，而这个官僚体制根本无助于推进社会道德；长期依靠道德宣传不但不利于推进社会道德，这反而是不道德的病根。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我们再怎么宣扬道德，人们心里都明白，那玩意只是用来宣传的罢了。

第二点原因是中国长期缺乏公众社会参与，官民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导致人人自危，社会无法凝聚成一个整体，因此人人都孤立地存在，人人都不相信别人。中国的官-民长期处于对立状

态，中国的不同阶层也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中国人没有那种感觉——这个社会是我们共同所有的。这个国家是党的，我要做的是不被他坑，或者挖他的墙角。正是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社会各阶层都是彼此割裂的，人们之间只有相互倾轧而没有信任。

社会道德感的形成有赖于每个人的善行，而人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善会给他善报，而他不必担心因此被伤害。在彼此割裂，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下，又怎么能指望人们自发地为善呢？人们只能自扫门前雪了。

第二编 世道

“新时代”的城市文明建设

欣闻北京大举清理“低端人口”，即外来的低端劳动人口、农民工、低端服务人员、低端小商贩等等。“低端人口”常驻北京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并造成城市拥挤、资源紧张，严重影响“高端人口”的高品质生活。因此，清理“低端人口”迈出了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步伐，是北京市城市规划中里程碑式的进步。

此次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动再次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执政高效，雷厉风行。相关部门对低端人口聚居区进行了果断的地毯式清理，要求低端人口即日搬走，绝不拖沓。对于拒不执行者，坚决砸烂拆除；坚决不因找房困难、无家可归等理由拖延执法；坚决不让天寒地冻等客观环境阻碍执行；坚决不让低端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阻碍首都北京的高端城市建设步伐；坚决不姑息舆论的压力和群众的意见。

在此次行动中，由中国人民警察组成的执法队伍，再次展示

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风采，再次让中华儿女为之骄傲。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头戴国徽，身穿制服，将抗拒搬迁的低端人口家中用具一律砸烂，将低端商贩的店面一律砸烂。他们铁面无私的执法精神，再次体现了国家的尊严和法律的公正。他们执法严明，雷厉风行，不愧为社会公正的捍卫者！

此次行动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北京物价贵、房价高、城市拥挤，困难群众在北京生活困难，时时被总书记牵挂在我心中。此次行动让低端人口免于在北京生活的高昂成本，让他们回到大自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怀抱。此次行动又为困难群众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人民的政党，中国人民政府不愧为人民的好政府！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选择的政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次清理行动会极大改善北京的市容市貌，为党的领导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低端人口是落后生产力的象征，将他们从首都清除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低端人口。从而实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后记：都说外国人排华，可再排华也没排斥到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走，也没排斥到将华人低端劳动者集体清除。可中国人自己“排华”起来却是毫不含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印证了在海外华人圈流传的一句话：在外国受到的所有歧视加起来也不如在国内受到的委屈多。

中国的大事与小事

有个北大教授叫沈阳（沈阳是人名，不是地名），二十年前性侵了一女学生，当致当事女生自杀，二十年后该教授仍未被依法处理。而如今有一同学叫邓周学，为了督促北大校方依法处理此事，发了篇文章公开此事，结果当夜就被校领导约谈。正所谓“处理一个性侵学生的沈阳需要二十年，但处理一个积极推动沈阳事件解决的学生却只要几小时”。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真是匪夷所思。

中国有全球最密集的监控网络，但从来没听说，老百姓出门被偷了或家里被盗了能立马侦破；倒是有人在微信上发个敏感词立刻就会被抓捕。都说中国行政效率高，原来是这么个高法儿。

领导约谈邓同学，要求删除文章，无非是老生常谈的理由：避免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影响学校形象。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是很奇怪的，死了人是小事，二十年都不解决；但“影响形象”是大事，两小时就要解决。所以个人的

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可是死了人都压着不解决的集体又是什么样的集体？这样的集体为谁而存在？说白了，所谓的“集体”不过是领导的脸面。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中国传统，什么集体主义；说穿了就是，领导人的脸面比普通人的性命更重要——一副权力本位主义的嘴脸，不需要用“集体主义”来伪装。

这事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在网上开了一个以学校名字命名的贴吧。有些学生上面发了一些说学校不好的话，刚开始没人理睬，后来关注的人多了，我已经上大学了，高中领导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删除相关内容。中国人的逻辑是：集体有问题是不能说的，集体内部再腐败，对外也要摆出光鲜的形象。这话翻译一下就是：集体领导待你再差，你也得憋在肚里，出去还得给领导面子，不能自报家丑，否则就是不明事理。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某些道德观、是非观是最虚伪的。明明是官本位思想，他叫“集体主义”；明明侵犯人权，他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让你为“善”，不过是为了容忍统治者的“恶”；他让你作良民，不过是为了容忍统治者的暴虐。

这套虚伪的价值观上至国家，下至百姓家庭。所谓中国价值观，儒家道德观，说白了就是“长幼尊卑”的一套东西；说白了就是让一些“地位高”的人合理地享又比“地位低”的人更多的尊严和权利；说白了就是让一部分能合理合法地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

就像主人剥削了一群奴隶，还要告诉奴隶：甘心做奴隶，做好奴隶，就是最大的道德。

知道为什么外国的孔子学院无论怎么宣传也没人去吗？除了中国人，还有谁会相信这套东西？一旦相信这套“中国特色价值

观”，世上再无公平与正义。中国存在的意义就是实现一小群人对一大群人的统治，除此之外，再无美德。

论中国人的自信与自欺

徐晓冬与中国武术

徐晓冬是业余格斗爱好者，在北京经营一武馆。徐晓冬出名是因为去年四月，他扬言中国传统功夫只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并豪言要挑战各大掌门。太极掌门雷公应战，结果 7 秒被徐晓冬打倒。雷公的惨败让人们大跌眼镜，中华武术传承千年，一派掌门，不该如此脆弱吧？徐晓冬说他“约架”是为了打假：“我现在挑战的是欺骗，我正在挑战的是一百年来某些中国传统武术的欺骗，一百年来没有人挑战，我需要来挑战，就是这样，我打的传统武术中的假。”

徐晓冬成功了，因为被央视封为“十大民间武林高手”的雷公确实是假的。雷公的绝技“雀不飞”和“砸西瓜”都是和央视联合演出的假戏：所谓的“雀不飞”居然只是事先鸟腿绑在了胳膊上；所谓的用内办砸西瓜更是几个工作人员操作了半天的成果。

不仅雷公是假，中国功夫的高手马保国、陈小旺、王占军、闫芳，全都是假的。他们所展示出的绝招，与其说是武林绝学，不如说是电视特技。

但是打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徐晓冬挑战了中国人对传统武术的自豪感，挑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怀，于是很快被指责为污蔑传统文化，甚至被骂成卖国。他只有声泪俱下地解释自己不是卖国。

可是没有用，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容否认的，否则就是卖国，否则就影响稳定和团结，否则扰可能是被美国策反的。所以徐晓冬的微博被封了，武馆也被关了，徐晓冬本人也出来认错。雷公也否认了之前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实，称“徐晓冬一拳都没有打到我，因鞋底滑摔倒”。于是中国传统武术之神话得以继续传承。

一个民族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真是世所罕见。中央电视台和雷公联手演戏，无人问责；徐晓冬打假，反而要出来道歉。所以只要是说传统文化好的，错的也是对的；只要说传统文化差的，对的也是错的。

这个国家的人们不需要知道对错，不需要知道真相，他们只要假相，只要欺骗，只要盲目相信中国传统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中国武术就是世界第一，中国中医能拯救世界。谁来否定这种信仰，谁就要被打倒，谁就是卖国。

论如何保持自信力

一、首先要坚信自己永远是最好的。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决不承认自己哪里输于别人，决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即便

别人家用马桶，自己家蹲茅厕，也要自信：茅厕是最适合自己生活习惯的，马桶会毁坏自家的生活传统。

二、永远发掘别人的缺点，自己的优点。千方百计挖掘别人的缺点，永远只看自己的优点。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充沛的自信。

三、坚持怨天尤人的原则。自己做事情，如果成功了，则归功于自己；如果失败了，坚决怪别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永远是互相竞争的，别人永远不会帮助自己，只会不停使绊，然后看你笑话。所以成功只能靠自己，不成功只能怪别人。坚持怨天尤人的原则，则会不断看到自己的成就，而将失败归咎于别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自信。

自信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成功人士都有冲天的自信，相反，不自信的人是很难成功的。一个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自信心；可以无赖，但不能无自信；可以缺德，但也不能无自信。有时候，保持自信，和有知、有德是矛盾的，那么就要暂时牺牲后者。太过检点、太过自省的人不容易有自信，而没有自信的人是很难成功的。人首先要成功，然后才有一切，只有成功的人才掌握真理和美德。所以有些时候，有必要暂时蒙蔽自己的良知和思辨，来获得自信。有了自信才能成功，谁成功谁就有话语权，谁有话语权，谁就是真理。

综上所述，应践行上述三条原则，以保持自信。千万不能让自省之心和谦逊之德占据上风，千万不能相信自我批评，以及取长补短之类有伤自信的教诲。特别是在乱世之中，越自信的人越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越谦卑的人越让人瞧不起。自信就是最大的美德，终级的真理。

长治久安的秘密

中国人从来不愿承认别人的好和自己的差，凡是能戴上“中华传统”这顶帽子的东西都是神一般地存在。比如中国武术，比如中医，都是不能玷污的。即便是谎言，也不能拆穿，拆穿就是污蔑传统文化。中国人宁愿选择自欺欺人，也不愿接受事实真相。

为了保持民族自信，中国的宣传机构向来不吝惜笔墨诋毁他国。美国枪击了，欧洲动乱了，澳洲失业了，都值得大书特书。但中国旱灾了，村口砍人了，民工失业了等影响形象的向来被有意忽略，否则就容易乱；不想乱，就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

为了保持民族自信，绝对不能显得中国人输人一等。即便受了别人帮助，也必须闭口不谈；但受了别人欺负，一定要大书特书。媒体大肆吹捧中国高铁世界第一，却绝口不提中国买了日本和德国的高铁然后逆向研发，只说自己站的比别人高，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还要再添油加醋，说外国人要价太高，逼中国人自己造。你会发现，中国所有引以为傲的工程，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叙述——外国佬看不起中国人，要价太高，中国人自力更生，终于反超。这些故事，虽然杜撰手法单一，情节类似，但读起来仍不免会激发民族自豪感，还能激发同仇敌忾之心。

为什么中国人宁可罔顾事实，甚至自欺欺人，来维持民族自信和脸面？

对个人而言，人自信就不会否定自己；而对一个集体而言，相信集体就不会背叛他；对国家而言，如果国民对国家有信心，就不会反叛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国民自信，就不会谋反，这就是

中国式民族自信的根本原因。

谋反是最要不得的事。再中国的传统里，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谋反。古代有“十恶八虐”，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孝、大不敬、不义……基本上全是反叛或忤逆之罪。中国的道德观里，最大的恶不是残暴，而是“犯上”。不忠、不孝、不敬，都是“犯上”。“犯上”事最不能容忍的，要是再“作乱”，那就得死了。

所以，什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其实没那么复杂，核心就一个词：驯服。不管他讲多少大道理，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就是让你服！不思考，不反对，不忤逆，服服帖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说白了就是让人乖乖地做奴隶。对家长的驯服谓之“孝”，对君主的驯服谓之“忠”，忠和孝都是为了在道德上遏制谋反的念头。而对国家的“自信”，则在思想上断绝了谋反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宣传机构不择手段地让你相信国家，这就是中国式长治久安的秘密！

这种价值取向是好是坏，就不在此评价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价值取向之形成的体制背景，无疑是封建专制。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这样被统治。中国的政治中是没有公民这一阶层的，也没有民意或共识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处于对立两端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不是协商或民主，而是权力和军队组成的暴力机器，辅之以道德上的教化和思想上的灌输。道德和思想灌输的核心，自然是不要“犯上作乱”，也就是“忠孝之道”。

中国人的每种价值观，每种作风习惯，一言一行，几乎都可以追述倒专制的影响。

华中师大附中学生李红豪写了篇《草见人命》的作文，在网上

流传很广：“千年历史中无论朝代怎样兴衰更替，专制主义都在封建皇权的呵护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后来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入侵，专制主义更是如日中天，直至今天这样名亡实存。”

呵呵，中学生都有这般认识了，这套把戏还能骗几代人？

杨女维权记

D 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某在校期间被同班同学赵某用开水烫伤，赵某将饮水机内的热水灌进水壶，顺着杨某脖子倒进上身，导致杨某后背及前胸大面积二度和深二度烫伤。

杨某与赵某并无既往纠葛，事发当日，赵某仅因一点琐事对杨某怀恨在心。杨某问赵某：“为什么要往我身上倒热水？”赵某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就是要报复，报复就要报复个狠的。”赵某仗着自己是学校副校长的女儿，向来在学校横行霸道。

事发之后，杨某父母极其气愤，除了将女儿立刻送往医院治疗，便迫切地找赵某家长讨还公道。不料身为副校长的赵某母亲，不但不承认自己教育失职，也无诚意赔偿杨某的医疗开支。更令杨某家长气愤的是，D 小学校长竟对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公然包庇副校长赵某母亲。作为校长，从未积极处理事件，看望受害学生；对于杨某家长的控诉，只是采取拖拉、

扯皮、观望的态度应付了事。杨某家长提出换班要求，学校竟以“无此先例”为由拒绝。

杨某父母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把赵某告上当地法院。本以为法律能还他们公道，没想到官官相护。一方是当地最大小学的校长，另一方是介介无名的普通百姓，法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以“证据不足”为由无限期拖延司法审判。

杨某父母除了焦虑等待，别无他法。他们把女儿烫伤的照片以及事件原委转发到网上，希望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没过两天，就被有关部门以“响社会和谐稳定”为名义删除。

绝望中的杨某父母不甘心，他们为女儿的遭遇感到不平，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老两口商量了一下，决定进京上访。可是他们刚坐上出城的汽车就被当地信访办抓了回来，关进小黑屋被打得遍体鳞伤，直到他们保证再不上访为止。

被释放的杨某父母对国家彻底绝望，决定砸锅卖铁也要离开这个国家。次年，杨某一家三口办理了旅游签证去了美国。他们依照亲友的指导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想长久地留在美国，可美方以“并无政治迫害”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杨家人正踌躇期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杨家人闻此消息，心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是千载难逢的告御状的机会！终于有了雪耻翻身的机会！于是他们问好了习近平车队的路线，在半路上跪在车队面前请求见习主席一面。可是访美大事当然不容这等小民耽搁，习主席的车只略停了一下，他们便被保安抬走了。习主席问知停车原因，龙颜大怒，“我天朝岂容如此丢人现眼的臣民？”于是下令“依法处置”杨家所有人等。

三个月后，杨家人的旅游签证到期，只能返回中国。他们一过海关便被警察“依法”逮捕。同时杨家夫妇得知，他们双方的老人及家属全已下落不明。杨家夫妇在狱中，仰天嚎啕，大叫“天理何在？”遂以头抢地自杀身亡。

注：本故事后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真实的故事原型是，当杨某父母将该事件发到朋友圈后，引起了广泛转发，并被报社关注，并进行了报道。由于此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教育局有关领导对此事高度关注，决定给予校长党内警告处分，免去赵某母亲副校长职务，并调离本校。

马基雅弗利在中国

网传国防大学 X 教授的一段演讲，他讲美国是纸老虎，如果钓鱼岛发生争端，美国一定不敢出兵。为什么？他说如果中美开战，美国有能力把中国的沿海城市全部打烂，但中国无所谓，我们可以退居西部再发展；但中国会把美国派来的所有航母都打得片甲不留，美国将丧失主导全球的海上军事力量。所以中国敢打，美国不敢打；中国输得起，美国输不起。

X 教授的霸气演讲引发大批网友点赞。我不懂军事，但思来想去，实在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强悍的思维方式。按他的说法，这种战争的结果中国不知要死掉多少性命，沿海城市多年的经济成就就毁于一旦，但这些中国都是承受得起的。反观美国，就算损失了全部海军，美洲的国土也许毫发未损，美国反而承受不起了。我琢磨来琢磨去，这种论点要想成立，只有一种可能：美国人怕牺牲，中国人不怕；美国人是肉长的，中国人是土捏的。

这让我想到以前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不怕打核战争，大不了死掉三亿人。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气魄，中国人死多少都无所谓，只要能保住这个“国家”——中国人的“国家主义”情结真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了。美国人常讲为美国人的自由而战，为美国人的安全而战。但我们中国人不看重这个，我们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二字，而不是为了“中国人”。

中国人死多少都无所谓，那只是一个数字，只要能保住“中国”这么个国家品牌不倒，就是战争的胜利。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讲什么人权、人道；人命是不值钱的，个人是要随时准备为国家而牺牲的。但为国捐躯又是为了什么？为了换来中国人后代的幸福生活吗？不，中国人的后代还得继续为国捐躯，后代的后代还得为国捐躯。因为种种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对个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从来没有进入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处于主流价值观中心的，永远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宗教般存在着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代表他的人民，这个国家也不代表中华民族，这个国家究竟代表什么，没人能说清楚，它像宗教一般地根植于中国人的信仰之中。

中国人相信，没了国家，个人也就没有了，就好像人少了“中国人”这个标签就不能活了似的。可正是为这么个标签，中国人离所有真、善、美的人类理想越来越远；正是为了这么个标签，害得中国人永远地野蛮下去。

可以说，人类一切美好的社会理想都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善意。这里不存在什么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论语》中有言：“攀迟问仁，子曰：爱人。”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并不排斥普世价值。但国家主义之下，人本主义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都被否定了，这个民族因此沦为最残忍、最野蛮的民族。别看中国人口口声声道德礼仪，中国人其实是不相信道德的，他们是没有底线的。每个中国人都明白，道德只是用来宣传的，必要的时候，人不需要有任何底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根本价值被否定了，人权、人道都被否定了，其他的道德只能沦为沙丘上的幻影，或者只是一块遮羞布。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一位新西兰华人富翁在新西兰引起了公愤，这位华人靠炒房赚了大笔钱，还在新西兰开办学校教别人炒房之道。他之所以引发公愤，是因为他所传授的炒房之道，被曝出都是些为人不齿的手段。他专挑弱势群体下手，比如家中有亲人去世的，夫妻离异的，或是老人、残疾人以及智障人士；这些人更容易受到欺骗，因而更容易从他们身上赚钱。更令人气愤的是，在被曝光后，他竟还发表了强势的回应，不但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反而嘲笑新西兰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只会工作、不会投资，新西兰人应该向他学习如何“投资”。可怜的新西兰人简直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舆论群起而攻之，新西兰开始喊“中国人滚出去”。

虽然这种事情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还是为中国人感到羞耻。这位华人“炒家”，不过是众多中国“成功人士”的缩影——他们相信“有钱不赚王八蛋”，无论用的是什么手段；他们相信有钱就是成功，有成功就有一切；他们不相信道德，只相信金钱和权力。当他被舆论指责时，还理直气壮的为自己辩护，他显然以为有成功就有话语权，谁成功谁就“正确”。在几千年的愚昧专制以及国家主义熏陶下，他们眼里没有道德，他们只看重权力和地位——

全民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会以这种眼光审视别人，他们以为全世界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他们一样，拿道德当面具，拿权力当武器。这样的民族真是既可怕、又可悲。

再回头说一两句 X 教授这个人。中国 H7N9 禽流感时，他在微博上说死不了几个人；中国非典时，他说这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生物攻击。可中国偏偏有那么多人支持他，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人有怎样的国民性？他们眼中全无人性，他们不相信任何基本的人权观、基本的正义感。这个国家存在不是为了推进“真善美”的理想，而是一个天天想着称霸全球的野心机器！假如中国真有一天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有其他国家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我倒宁愿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潘金莲的贞节观

北京举行了一个全球人权论坛。现在的中国强大了，不能只活在西方话语权的世界里，要重塑中国的话语权。于是搞个人权论坛，把对人权的解释权从西方夺回中国，于是就不会再有人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也许还会向中国学习“先进的人权观”。

潘金莲和武大郎劈腿，找了有钱的西门庆。于是潘金莲开了一个“新时代贞洁论坛”。潘金莲说：别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现在有钱了，有钱才是硬道理。我有钱，就有话语权。我告诉你们别听那老一套的贞洁观，要向我学习，不要固守你们过去的思维。你是听她的，还是不听呢？

中国人观念里确实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权力大小而言的。谁官大，谁就有话语权；官小就只有唯唯诺诺的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平等可言，中国核心价值观里，

强调的就是等级秩序。所以要么我高你一等，要么你高我一等。我要是高你一等，我就有权威，你就得听我的；我要是低你一等，就反过来，我就唯马首是瞻。所以人活着，就得不断往上爬，不断争取“高别人一等”的地位，让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下跪，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成功。

中国人显然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了国与国之间，于是搞了个人权论坛，以为他现在强大了，有钱了，就没人敢笑话他了。他以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和他一样，要么对别人颐指气使，要么对别人低三下四。

我想到另一个故事，清末，英国人想来中国通商，见了乾隆皇帝。中国人让他下跪，英国人不跪。英国人说我是来通商的，我赚钱，但你们也会获利，这是平等的交易，我为什么要给你下跪。但中国人不这样看，坚持让他下跪。在中国人看来，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一样，要么我给你下跪，要么你给我跪，哪有“平等的交易”？你既然来了，就是来我天朝上国朝拜的，怎能不跪？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英国人单膝给皇帝下跪。

不过英国人最终没能实现通商的愿望，可是撒克逊人的命根子就是要做生意，正常渠道赚不了钱，就是能卖鸦片，当然这是赚坑人的钱。于是后来有了虎门销烟，于是有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终于通过战争的手段撬开了中国的市场，开了通商口岸，英国人也把损失的鸦片钱都赚回来了。其他西方国人看的眼红，凭什么英国人能赚钱，我们不能？于是他们组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来中国考察，看能不能像英国一样和中国做生意。可中国人不这么想，贸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反正来者不善，来我天朝者，不下跪，就是找茬儿；找茬儿就得让你见识见识天威，正好之前输

了鸦片，这回捞回来。于是中国人制定了缜密的计划，把外国使团诱到一个地方集体歼灭。事成之后，朝野上下弹冠相庆，终于打了个漂亮翻身仗。

此事引起西方使团各国震怒，于是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仗打多了，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于是只能向人家下跪。可以也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早晚让他们跪回来。

现在身在外国的中国人，觉得祖国强大了，自己的腰杆也直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不过是中国人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如果你自身没素质，没人会因为你的祖国强大了就高看你一眼。中国人的等级观念真是根深蒂固，你有权有势，我就高看你、恭敬你、逢迎你；你没权没势，就没人把你当人看，这是中国千年专制史的余孽。

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没人会觉得总统就高人一等。总统知名度高，正如歌星知名度高一样，但绝不意味着他就高人一等。你可以指着总统的鼻子骂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这样的社会里，谁会因为你背后的祖国是谁，就高看或低看你一眼？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不知这种戴着权势的眼镜看人的习惯是自己的问题，反而以为全世界人都跟他一样。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要么是你给我下跪，要么是我给你下跪。过去中国人一直以为全世界都得给自己下跪，自己是天朝上国，后来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给白人下跪。中国的女留学生，喜欢被白人追求；如果是黑人追求他，甚至会恶语相加，中国人就是这般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中国人这副嘴脸，外国人都看在眼里，怎么能让人尊重？然而不被人尊重，中国人还会觉得是因为祖国不

够强大；如果中国强大了，全世界人都会给他下跪。

所以说“专制践踏人类一切真、善、美”这话是不错的。专制之下不可能有平等、尊重、善良。然而中国人仍然觉得这是“中国特色”抓着不放，真是可怜又可悲。

现在中国人似乎觉得中国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了，该有人给自己下跪了。听说中国“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有当地人反对，中国直接以强硬姿态表示不得反对。呵呵，没有谁比中国人更信仰强权，而且他以为谁都和他一样！难怪中国没有朋友。

人民的名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总说自己是“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人民的选择”。这种说法其实自古有之，已经被玩弄了几千年，并不是中共的发明创造。中国人从来没有民主，民众从来不会发声，谈何“人民的选择”？没有民主的政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呢？千百年来，中国人玩弄的把戏无外乎两种：一是说自己是人民的选择；二是神话领导人。人民的选择说明其“顺应民意”，神话领导人说明其“顺乎天意”。

这种传统上至周天子就存在了。周武王灭商，从而周朝取代了商朝。但周天子不说自己能征善战，而是发明了一套远为圆滑的理论：他说周之所以能取代商是因为商太残暴，而周仁德，所以

大家拥护周。于是商纣王就成了臭名昭著的暴君。再比如唐取代隋，李唐王朝为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也用了相似的说辞，于是隋炀帝也成了著名的暴君。但事实上，商纣王和隋炀帝真的那么残暴吗？恐怕未必，现在不是就有很多人给隋炀帝翻案吗？

不过，说周比商更仁德，唐比隋更爱民，估计也并非完全杜撰。但如何解释历史显然比历史本身更重要。外国人看中国历史有时候一针见血，因为他们很容易看出中外历史叙述的区别：“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不同，某诸侯得胜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英雄，而是因为他道德上正确，合乎天意”；“孔子的特别贡献就在于删改古籍，给原先的英雄崇拜和武功炫耀加上道德色彩，把军事上的胜负道德化、精神化……”（韦伯）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胜利者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还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谁赢了谁就“顺乎天意”，于是把“成王败寇”道德化了。这套玩法直到今天还在用，共产党赢了内战，于是便成了“人民的选择”，国民党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残暴、腐朽、卖国的政权。

宣传政权合法性的另一手段就是神化领导人。古代的最高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通过神化自己来表明“奉天承运”。比如刘邦据说是刘母和龙交合所生，而且这种故事还被一本一眼地载入正史。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其实天子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对天子的效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似的信仰。世界上很多文明是政教分离，而中国是政教合一。这是一种极其实用主义的宗教，在中国的统治者眼里，儒家不过是驯服老百姓的工具而已。康有为说中国的皇帝不能废，废了中华文化就断了，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一切价值观的根源。任何民族都需要宗教信

仰，不一定是信某个神祇，但需要信仰某种东西，那是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基础和根源。在西方文明里，显然是上帝充当了这个角色；在中国则是祖宗和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祖宗崇拜”（从家国一体的角度，这二者是合一的）。中国人伦理道德的根基不是对上帝的忏悔，而是对祖宗和皇帝的顺从，即孝和忠，所以“愧对列祖列宗”是最大的罪恶。没了皇帝，等于整个中华伦理大厦没了基石。

在近代，毛氏太祖革命成功以后，再自称是“天子”显然行不通了，于是取而代之搞了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但本质上仍然是领导人神化。毛太祖几乎被宣传成了女娲似的始祖，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造”了出来。他不仅是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他成了一代中国人心中唯一的伟人和一切真理的源泉。古代的“奉天承运”变成了“高举 XXX 伟大思想的旗帜”，“忠君报国”变成了对党的拥护和国家主义——这就是现代中国的伦理基础。所以现在想在中国恢复儒家伦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基础已经没了，另一方面文化已经断层了。在强调党性的文化下，孝都是没有根基的（想想文革中的红卫兵）。所以，“国家主义”就毫不意外地成了新时代中国人的信仰基石。想想今年流行的一系列宣传片（《厉害了，我的国》《大国重器》《辉煌中国》等），是不是类似古时候对皇帝的歌功颂德？

所以什么是“人民的选择”？这种说法本来就是欺世盗名。中国的人民几千年来什么时候有过“选择”的权利？满清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哪个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凭什么打着“人民”的名义？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不过是利用人民

群众的手段罢了。共产党之区别于国民党就在于，国民党是个飘在顶层的统治集团，国民党的高层不是留洋精英就是巨商富贾。而共产党是从中国草根成长起来的，他们更了解中国底层农民的心态，他们更懂得利用底层社会中的矛盾。就像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者一样，他们拿土地和农民交换，换取农民的支持，然后造反成功当了皇帝，又重新回到盘剥农民的状态。

共产党玩弄的不过是同一套把戏，他趁国民党人不敷出、横征暴敛的时候，打土豪分土地，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并承诺土地私有，获取广大农民的支持。等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很快就收土地为国有，统购统销。大跃进以后按虚报的数目征粮，反瞒产运动施用各种酷刑，打死逼死不计其数。这和历朝历代血腥的统治有什么区别？如果这样的政权也是“人民的选择”，那么什么不是“人民的选择”？中国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有过选择权？他们天真地被革命者的大同理想所诱惑，但无论他们“选择”谁，都会落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结局，区别只是从“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到“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

中国的统治者最虚伪、最卑鄙、最无耻的一面就是总把“人民”二字挂在嘴边，更不要脸的就是“时时刻刻把人民记挂在心上”。当“低端人口”被强制驱逐出北京的时候，人民在哪儿了？当钉子户抗议强拆引火烧身的时候，人民在哪儿了？当为工人维权罢工被警察镇压的时候，人民在哪儿了？当为工人维权的律师也被大规模抓捕的时候，人民在哪儿了？当他上位登基的时候，他说人民选择了；当人民在广场上聚集要求他下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人民镇压了。每逢过年，他都会到老百姓家中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但他转过身来，就可能把枪口指向人民。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统治者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是假公济私。他们也有理想，他们也想让这个国家强盛。但是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这个国家不属于他的人民。人民不过是用来实现他们理想和野心的工具，人民被当作旗帜高高挂起，但从不曾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且看太祖的一席话：“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使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中国历史上，往往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越是深重，秦皇汉武概不例外。然而中国人往往又渴望这样的领导人，这可谓中国历史的最大悖论。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领导与中国特色

一

中国人什么都要搞个中国特色。比如你说“人权”，中国人说那是西方人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能照搬。但中国价值观是什么呢？不能完全不讲“人权”，所以就发明了“中国特色人权”。与此类似，还有中国特色民主，中国特色法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等等。

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和“西方特色”又有什么区别？恐怕没有几个人讲的清楚，这似乎是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四个字——党的领导。中国特色民主就是党领导下的民主，中国特色法治就是党领导下的法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就是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

这么定义中国特色也是符合儒家价值观，就是一切以领导为

核心。比如中国特色人权就是，领导承认的人权才是人权，领导不承认的人权就不是人权。比如领导要拆你房子，你不让拆，说侵犯人权——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领导不承认的人权就不算人权。

中国特色公平就是蛋糕先分给领导，剩下的再平均分给大家。比如高考，好学校先给领导的孩子留了位置，剩下的名额再让老百姓的孩子“公平”竞争。好的小学和中学也一样，先留给领导的孩子，剩下的再按所谓的学区分配。

中国特色法治就是居民必须守法，但领导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句话说的好：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给穷人制定的。在中国，只有没能力没地位的人才只好按规则办事。一个人有能力恰恰就体现在他能绕过规则去办事，能力越大，地位越高，他能绕过的规则就越多——此乃中国特色法治。

中国什么时候能把“中国特色”四个字抛掉，什么时候就进步了。正如王小波所言：总强调中国特色，本身就是在隐藏着什么。

想象一下，什么时候习近平坐的车超速了，他也一样得交罚款，中国就进入文明社会了。但是这可能吗？如果可能，中国就不是中国了。

二

权力本位社会是最卑劣的社会体制。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权力就有一切；权力越大，特权越多。这样的社会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有权力就是人上人，没权力就永远被剥削。这样的社会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谁有权力，谁就是真理。然而可悲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个权力本位社会。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而领导有病，立刻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病房，恨不得把全社会的力量都用上！老百姓的孩子要想考个好大学得十年寒窗；令计划打一个电话，就能让儿子上北大。给老百姓盖的房子偷工减料，还卖成天价；某市领导给自己盖的房子，用料不计成本，还是特供房源。普通人想做生意得承担风险、如履薄冰；而所有国家高层领导的家族都控制着国家重要产业，靠着垄断优势赚的盆满钵满！

讲平等，首先是生命的平等，人格尊严的平等，其次才是财富的平等。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是普通人，而领导是上等人。他们的命更值钱，他们的手脚更金贵，他们的脸面甚至比普通人的性命更重要！在古代，奴才给主人梳头，梳掉了头发，可能就要赔上性命。奴才的命贱到还比不上主人的一根头发！然而在现代社会，类似的故事竟然仍然在这个国家上演！

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公平可言？谁是当官的，谁有权力，谁就是最大的公平，平民百姓连放屁的资格都没有。古代的老百姓天天“官老爷”“官老爷”地叫；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同样一副德行！

三

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价值倾向，比如美国重商，所以商人地位高。日本重知识，所以把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最大的钞票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不是儒家传统价值观，也不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说白了就是“领导人价值观”：当领导的地位就高，当领导就是有出息，当领导的人就是比不当领导的人更重要；顺从领导的意思就是最大的善，反抗领导的命令就是最大的恶；为领

导端茶倒水叫有眼神儿，和领导平起平坐就叫不懂事儿。权力的大小比知识、技术、金钱、人格、尊严、美德、荣誉都重要！

你若问问各个国家的人，历史上哪些人对本国的影响最大？日本人可能会说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家），或者伊藤博文（宪政之父）。法国人可能会说伏尔泰（思想家），或者卢梭（思想家）。但是在中国，永远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就是孙中山，要么就是邓小平，也可能是习近平。总之一定是领导人！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是梁启超或是蔡元培什么的人。中国人永远把领导人看成最重要的，领导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人都是陪衬。好像只要领导人英明，地球都可以反着转似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中国人不接受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说那是西方的东西。中国的“特色”就是不民主、不平等、不自由，就是领导人高高在上，就是小民连个屁也不敢放！而这种“特色”还要想方设法保留，并发扬光大！

四

中国人说民主制效率低，还容易陷人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的专制主义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可是，这种权力本位的专制主义，连最基本的社会公平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是为了谁？连国民的基本人权都保证不了，还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说“把权力关进笼子”。结果是把别人的权力关进了笼子，把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谁有异议，就把谁整死（比如刘晓波、

余文生)。这是什么“依法治国”？他自己就是最大的“法”！法治和专制是根本矛盾的，专制无论如何要依靠人治，要依靠特权，领导人没有特权怎么能办成事？而有特权的存在，法治就是空谈。

中国最阴暗、最卑鄙、最具劣根性的就是，他围绕这权力本位体系建立了一整套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价值观里，最大的美德就是驯服，就是对权力的臣服；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人民乖乖地屁也不放，国家稳如泰山。你要是起来闹事，他就镇压；而且在道义上，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因为谋反就是最大的罪恶，稳定就是最大的正确！领导要你的土地，让你搬家；你不给，你反抗，就是“抗法”，就是“妨碍公务”；谁有权力，谁就是“法”，谁就是“公”！这是地球上最虚伪的道德观，因为它否定了一切人的尊严与价值！

五

听说新疆又闹事了。如果我是领导，我就把新疆所有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全部抓进集中营，统统杀掉，把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再把汉人移民过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分裂的问题。虽然可能会招致人道主义的批评，但这是舍小利而成大义。因为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是最大的道义！虽然短期内我会遭受非议，但长远来看，必将成为万世景仰的伟大领导人！

中国特色的文明与正义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在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龙应台《相信与不相信》

回国后有这种感觉，文明和野蛮、正义和不正义、道德和不道德，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而且可能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但各自有理的文明、正义和道德。

我一直认为，自由是文明，奴役是野蛮；法治是文明，专制是野蛮。但在没有自由和法治的中国，人们有他们自己对文明和野蛮的定义。比如，开明的专制是文明，腐朽的专制是野蛮。我认为人人平等是一种公正，特权和不平等是一种不公。但中国人偏偏喜欢等级社会，喜欢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并能在这个等级游戏中自得其乐。

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法治是一种建立在理性主义和宗教伦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对于中国这样，并非构建在理性主义之上，而是以长幼尊卑为秩序基础的儒家价值体系，“普世价值”也许真的不适用。

所以文明的进步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平等和等级、法治和专制，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以在同一个文明层面上共生。可这又听上去怪怪的，那么你如何判定文明的优劣？或者说你有什么依据证明文明的高下？

若从个人的角度体会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像约翰·密尔所说，这个判定标准就在于看在两个文明中都生活过的人更喜欢哪个文明。但从社会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却并不那么容易。一个文明可以如此庞杂而具有向心力，任何生活在其中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它旋转。柏杨称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犹如一潭不能流动的死水。中国文化、儒家价值观是如此地自成一体，并

不与外界格格不入。任何身在这个酱缸之中，向其发出挑战的人都是蚍蜉撼树。任何身在其中的人都必须沿着它的轨迹运行——对等级社会的迷恋，对开明专制的期盼，对统一和稳定的信仰，就像任何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地球引力。

诸如文明、自由、平等这样的字眼，每个人都明白，但不同人理解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不同的价值体系下，可能会有极不同的含义。当人们对现实不满时，会将一切问题归于“体制”，仿佛只要一“民主”了就什么都解决了。也有人拿出失败的民主的例子，证明“民主”其实也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增强道路自信。我认为这两者都是错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承载的远不止一种制度、选票或某种主义；“专制”和等级也并非一定是桎梏和奴役的近义词。这些词背后承载的是整个文明体系、历史、传统、信仰和价值观。之所以有失败的民主，就是因为真正的民主并非表层的制度，只抄袭表层的制度就如同换汤不换药。我认同这种观点：民主和自由是普世价值，但它是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并不是靠“普选”“多党制”这些简单的变革就可以达成的。假如中国现在实行多党制，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你怎能保障执政党和在野党不会沆瀣一气共同盘剥百姓？

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类似，什么是“好人”可能是模糊的。我认为必须尊重别人的选择和看法，即使是不赞成的；但也有人认为必须要为他人着想，要用你的价值观判断去指导他，才是负责任的行为。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是普世的，即使他是

长辈，是你领导；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目无尊长，是伤风败俗。

上升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层面，这种冲突也随处可见。西方社会认为公正是“规则的公正”：只要你是按规则行事，无论出于何种居心，后果如何，都是合理合法的。但中国人似乎更看中动机和结果，如果你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是破坏规则，也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即使你是按规则行事，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也是要制止的。

三

最近听说一个词：“中国式成功”。在一个法治社会，成功靠的是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做到极致。在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成功只能来自于出色的职业技能。中国式成功意味着你必须按照等级的阶梯往上爬，即使你不想往上爬，也要和体制内的人搞好关系，要接受别人为你制定的规划。

这是一种韦小宝似得成功：“韦小宝，一个基本不太会武功的小流氓，就穿梭于天地会、清朝宫廷、俄罗斯宫廷、神龙教这无数地方之间，处处左右逢源”。中国式成功需要的不是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更不是独立人格和独到见解，需要的是里通外合、八面玲珑的为人处世技巧。你不能质疑社会，只能适应它；你不能洁身自好，必须接受它的种种潜规则。局外人可以批判这样的社会风气，但你要在这个社会混出头，就必须接受它的规则，包括潜规则。

你也不能武断地说，这一切都是错的，都需要改变。因为君不见，身在其中的人自得其乐，而且忙得不亦乐乎。

四

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于明年 6 月 30 日竣工验收，9 月 30 日投入运营。为了建立新机场，拆迁 20 余村，如果你不幸住在领导要建机场的地方，那么对不起，你只能搬走。你没有选择，你不想搬？对不起，你的喜好不起一毛钱作用。你会被安置到一个新的地方，并且领导不会让你吃亏，会给你合理的补偿。但你觉得不舒坦，怀念老屋，或者不满意安置房？对不起，你没有一丝一毫发言权，领导帮你定好了，而且他们这种安排不仅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全北京人好。

在一个民主社会，没有人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剥夺他人发言的权利，即使你再高明，别人再愚昧。所以西方社会很讲究 consent 这个概念，你必须得到他人的 consent，否则你绝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不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中国人习惯把权力交给领导，并寄希望于领导会做出英明的决定。他们愿意为领导的决定付出牺牲，因为他们相信领导的决定会造福更多的人。北京的领导决定新修一个机场，当然不是拍脑子拍出来的决定，那必定是对北京的长远经济发展有利的，因此才要求那 20 个村的人牺牲；况且他们还能被妥善安置，也未必是牺牲。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暴政，因为你没有得到被拆迁人的 consent。但它真的是“暴政”吗？也许中国人更愿意接受开明专制。

但领导的决定也未必总那么“靠谱”，且不谈驱逐“低端人口”这么伤天害理的运动。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高层住宅将一文不值》：“高层超高层住宅以后的问题很大，将在未来二三十年成为

城市中的贫民窟——电梯老化，设备老化，维修保养成本高，拆迁成本高，基本上没有开发商愿意拆。”二战后欧洲人为人口高峰而建的高楼住宅，现在老化后全成了贫民窟。因为容积率高，重新开发没有利润可赚，政府和开发商也无计可施。现在买高层住宅的，二三十年后还完贷款后，会发现房子一文不值。

《圣经》中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光。中国人说：领导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领导规划一切的后果就是，如果领导犯了错误或者领导也不知道对错的时候，那么后果是全局的灾难。领导说旧房拆了建高楼有利于推动城市化，于是全国的旧房推到了建高楼，而高楼老龄化以后呢？就像领导曾经认为“人多力量大”，于是让全国人民使劲儿生孩子；后来又认为人多了导致贫穷，于是搞计划生育；后来又发现生太少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于是又鼓励多生……“计划生育”让很多人做出了牺牲，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牺牲了之后，发现领导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当然，中国人不会怀疑这是体质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原谅他们的领导；领导也是人，是人就能犯错误。但是对于一些领导拿不准的事，是不是尊重一下集体中其他成员的意见和权利会更好？为什么总让人做出无谓的牺牲？

五

胡温主政时期，全国不少地方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撤村并居”的初衷本是好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到城里去务工，农村渐渐出现空心化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2001年前

后，苏南一些富裕村镇的基层政府开始尝试撤掉人口稀少的村庄，将村民集中到人口大村或建设公寓型农民小区。“撤村并居”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改善了农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但当这种做法得到国家支持推广到全国后，却演变成了一场场饱受诟病的强拆事件。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农民宅基地，大规模运动式整村拆迁，好房子也拆，烂房子也拆，甚至不惜制造一场场“拆迁血案”。

地方政府之所以坚决“赶农民上楼”，是由于土地财政的巨大利益驱使，政府用农民地价格补偿给拆迁户，将宅基地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转手就能用数倍的价格将土地出让给企业或开发商，政府从中获得巨额“剪刀差”。

经济的发展使土地价值倍增，政府、地产商以及购买了商品房的城市居民都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然而被拆迁的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人，却没有成为受益者，他们成了“被剥削者”——政府通过“剪刀差”剥削了他们手中土地的商业价值，然而政府却打着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旗号！——正是龙应台所说的：“某些人在某一特定时机时热烈主张某一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不可测的不正义。”

六

有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以为资本家为了利益会剥削工人，以为只有国有才能使经济生产的果实惠及全民。事实上，私营经济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进步，正如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样，是是全人类受益的（当然企业家会享有更多

的果实)。而国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是改变切蛋糕的方式，往往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又往往称自己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

“撤村并居”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不能说城市化会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全民都会受益；被强拆的农民就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在没有剥削、没有剪刀差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带来土地升值，会让他们受益。但在现实中，他们被挡在了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名单之外。

“公有制”真的就是“公有”吗？且不说当一个不受限的政府掌握了所有生产资料后，他是否会出于良心道德而为人民服务。也不说那些有政府背景的红顶商人：陶朱公、吕不韦、沈万山、胡雪岩，哪个不是剥削人民。就算我们的领导真的都是道德模范，你相信他们会做出对“全民”最有利的决策吗？你相信国有企业依靠垄断攫取的巨大利润会分给全民吗？这些利润倒也没有被几个人私吞（不考虑腐败）；作为国家资产，国家会拿这些钱再去投资，支持大国建设，但大国建设的成果却也不见得施惠于大多数人。国家把钱投到北京，北京人全受惠；投到上海，上海人也会受惠；但大多数人，不是北京人也不是上海人，可能非但不受惠反而受害。

总体规划式的投资建设，不平衡的区域发展，再加上阻碍人口迁移的户籍制度，完美地实现了牺牲大多数人、富了少数人、提升总体国家形象之目的。取得的成就是看得见的，但牺牲却是看不见的。作为被牺牲了的芸芸众生，只能从国家形象的提升中获得集体荣誉感的慰藉。

七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是很有智慧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人能设计出一个最佳的“发展模式”，因而将发展完全交给市场。政府的重点不在于做“正确”的事，而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所谓的“正确”不是政府能规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欲望和利益诉求会形成平衡，在这种平衡下，每个人的诉求都能恰好得到满足。人们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在这种完全放任的市场里，当然也会有不平等，也会有剥削，但你无法指责这是体制的错，因为所有人自愿交易。就好比，如果开发商能直接和农民做交易，也许农民依然会低估他手中的土地价值，依然会被剥削，但你不会指责政府，而会指责黑心的开发商。可是政府统一调配土地使用，统一实施“剪刀差”，那么就让人怀疑这种制度的正当性了。

八

听说有专家提议要成立“生育基金”。为鼓励大家生孩子，为了防止坠入日本式的老龄化社会，你不生孩子，就得多交钱。过去的“计划生育”是谁生孩子，罚谁款；以后是谁不生，罚谁款。

论“整人”的能力，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出中国其右，特别是我们人口多，一整就能整一大批。中国的举国体制，最擅长的就是把他的人民当工具。为了达成某个国家“整体”目的，把人民搞来搞去。你听话，就升你的官；不听话，就整你，一直整到你听话。至于这个“整体”目的，到底是个啥只能是个迷；正当与否，也不是小民能过问的。它既不是以民意为基础，也不是社会

的共识，全系领导的个人判断。“国家”可以用来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可以用来实现君王的个人野心，也可以用来为国人充门面，还可以用来培养集体荣誉感。

封建中国最擅长的就是把人民当工具来实现君王的个人野心。只有中国能牺牲 80 万人来为君王修建一座陵寝，所谓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就是这么建出来的。后人在参观这座旷世皇陵，赞叹“古人的智慧”的时候，是否想到那 80 万工匠的辛酸和牺牲？

在中国的传统中，从来只有集体和国家，国家的形象，集体的荣耀，而没有个体的价值。个体只能从国家的丰功伟绩上汲取个人的自尊和荣耀。

皇陵建完了，为建皇陵牺牲了的苦力的子孙指着它说：看！我们国家真伟大！

第三编 天理

反对孝文化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依靠道德的教化来实现天下大治，也就是说只有人人讲忠孝、讲仁义，便可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但本文要论证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以德治国，非但不能天下大治，反而是国家治理败坏的根源；非但不能匡正人心，反而使人变得伪善，因为它破坏了社会公正的土壤。

孝的话题很大，它是中华特色价值观的根基。要讨论这个话题，上可关乎江山社稷，世界人类；下可关乎道理礼仪，行为规范。这个价值观在中华文明里扎根了三千年，被追捧过，也被批判过。如今社会之价值观已和千年前有了极大不同，维护这个传统价值观对当今社会有何意义，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值得辨析。

说实话，从全社会的角度，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我无法理解如今的当政者在推崇孝文化的时候在推崇什么。孝这种价值观是中

国人奴性的根源，是与现代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这种价值观不但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且造就了大批伪善者。

孝的起源

孝的起源可追溯到周王朝（以下历史内容纯凭个人记忆，未经考据）。周天子很聪明，发明了“家天下”的概念。什么是“家天下”呢？周天子从商那里接过王权，他认识到君主靠暴政是统治不下去的，毕竟商就是这样灭亡的。所以周天子认定，统治不能过于残暴，但不依靠暴力，如何维系统治呢？于是周天子把各诸侯全部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这样天下就都被把持在了一家之人手中，如此君就是父，父就是君。但仅仅这样显然还不够，因为即便是亲戚，为了争夺权力，手足相残，也是很常见的事。所以周天子宣布“忠孝是为人之本”。这种做法十分聪明，因为这既符合常理，也符合自己的利益。父母将孩儿养大，故对孩子有恩，子女应怀感恩之心，孝顺父母，于情于理，言之凿凿。那么既然君就是父，父就是君，孝于父，忠于君，也是顺理成章。将这种道德观普及开来，教之以言，固之以礼。于是谁要敢跟周天子争王权，便是不忠不孝，不足以为人，为天下唾弃。给他背上这么一个大黑锅，估计再也不会有人敢以下犯上，觊觎他的王位。于是江山稳固，千秋万世。这便是周以德治国的方针：首先把天下变成家天下，然后绳之以忠孝之法，律之以悌节之道，于是天下太平。这种统治手法极其高妙，倘若依靠严刑峻法，只能迫使人民不敢犯上作乱；但若绳之以德，便给了人们内心上加了把锁，不

但不敢，而且内心会受到谴责。然后通过礼仪把这种道德加以固化，比如守丧几年，将忠孝的道德观深深印入每个周王朝的子民心中。

周天子以德治国的方法实在高妙，因此维持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周是中国寿命最长的王朝。后来周当然灭亡了，但周以德治国，家天下，礼乐之邦的记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追思。比如孔子，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孔子所倡导的，其实就是像周一样的道德和礼乐体系。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用刀兵说话，没人理孔子。等天下再度太平，比如到了汉朝，统治者马上就发现儒家这套东西是个宝，道理上讲的通，又对稳定统治大大有帮助，毕竟周朝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于是独尊儒术之风大兴，不仅沿用了周朝和孔子那套东西，又添油加醋，三纲五常全来了。

价值观这东西就像酒精一样，少量吸收会让人感到愉悦，大量吸收则让人迷醉，倘若再大量一点，恐怕人就要抽疯（耍酒疯）。我国历史上就一度把忠孝的价值观演绎到抽疯的地步，比如二十四孝中就有什么卧冰求鲤、郭解埋儿等让人读来全身都起鸡皮疙瘩的故事。郭解家境贫困，生一儿子，因害怕影响抚养母亲，于是将儿子活埋。想想这个故事，不禁毛骨悚然，我们的老祖宗究竟在宣传一种怎样的道德观？为了成全一种善，宁可实践一种更大的恶？

历史说到这里不难看出，孝这种道德观，始于家天下的理想，兴于封建统治的需要，盛于人性的愚昧和疯癫。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如今，这种道德观势必衰弱，不是因为时过境迁，而是因为这种道德观经不起理性的检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为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服务的马托邦式的价值观，实际上它并不会

促进社会和睦，反而会导致社会公正的丧失。

道德的理由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一优秀的传统，即身体的勤劳；然而自古以来也有一顽固的劣根性，便是思想的懒惰。这个民族习惯性地乐于接受统治者宣传的思想，以及上古圣人的言论，并奉为圭臬，而不加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的圣人书，《论语》也好，《弟子规》也罢，无不是现成的行为规范，你照着做就好（因为大家都照着做），它从不解释为何，也从不容别人质疑。《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只能提问，而孔子给出的就是最终答案，从不见质疑和讨论。

你如果看过古希腊的经典，看过柏拉图的对话集，就会发现，他们对待真理的方式竟与我们如此不同。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讨论问题，苏格拉底从不提供答案，而是在辩论中，不断接近一个答案。而这些辩论，通常是对人们常规认识的质疑。对孔子的学生而言，学问是一个知道和感悟的过程；而对苏格拉底的学生而言，学问是一个质疑和反思的过程。从中不难窥见，中西方文明，从源头上便存在巨大差异。

周天子发明的是一套依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孔子则把这套东西进一步理论化了。到了宋明理学，“忠孝”则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臣要忠、子要孝就像天要下雨一样，都是不容置疑的“天理”。可是如果要质问一下，“孝”作为一种美德的“道理”何在？或者说，“孝”何以成为美德？又何以为天理？

如果说这“道理”就是血缘关系，但是人的血缘关系是他自己

选择的吗？一个人无可选择地生在某个家庭，就注定了他的血缘，他的父母就“碰巧”成了他的父母。一个人对一件他无可选择、碰巧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什么义务呢？如果我主动打碎了邻居家的花瓶，那么我当然要赔偿，因为这是我自主行为的结果，我必须对此负责。假如楼上邻居阳台上的花盆碰巧掉到我脑袋上了，花盆打碎了，难道我还要给他赔钱吗？我要为一件碰巧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负任何责任吗？如果哪有这样的规定，那不但不是道德，反而是最大的不道德，简直就是霸王条款。如果哪种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规定，那就是这种传统中糟粕中的糟粕。

凭什么一个孩子无可选择地生在了某个家庭，就一定要“孝敬”他的父母？孝是有条件的，孝是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父母没有养育之恩，或者根本没好好养育子女，那么子女也没有义务尽孝，这才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凭什么一个人无可选择地生在哪个国家，他就要爱国？爱国也是有条件的，国对你好，你爱他；对你不好，你不爱他。一个人如果孝顺、爱国，那么他知恩图报；他不孝顺、不爱国，如果有正当理由，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一个人不孝顺、不爱国就是不道德，这不仅是霸王条款，简直就是要流氓！

伪善的面具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

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它过于依赖道德的约束力，而忽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或者说道德的教化在中国就是制度本身。这个观点说简单也简单，然而说深刻也很深刻。忠孝本是反人性的东西（因为人的骨子里都是自私自利的），却代替了法治而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于是造就了中国特有的似道德又非道德，似人情又非人情的伪善文化——即以人情、面子、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国特色，在此我不想讨论它的好与坏。我称它是伪善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文化掩盖的是利益。与其戴着礼让的面具委婉地斗利益，是不是开诚布公的斗，更符合道德一些？

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便存在这样一种幼稚的社会理想：只要人人都孝，于是便能家庭和睦；只要人人都忠，于是便能社会稳固，万世永昌。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然而永远只能是理想而已，因为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的利益冲突，认为只以道德为约束，便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独尊儒术”是从汉代开始的，但儒家体制实行的结果怎样呢？东汉之后就开始衰败，到了晋朝，以后后来的南朝，儒家体制已荡然无存。君臣纲、父子纲，早被忘在脑后，现实变成了露骨的权力游戏。“南朝二十四帝（宋、齐、梁、陈全算），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儒家主张君臣、父子的秩序，然而施行到后来，却落得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虚伪奸诈的结局，其原因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理想社会如何实现？

杨振宁质问道：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的民族。在北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的德育，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杨振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质问的人。清朝末年，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号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来到英国后惊呆了，他读了一辈子的儒家经典，竟然发现儒家的理想社会在英国实现了：英国人温文儒雅，彬彬有礼，社会秩序井然。中国人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什么离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究其原因，儒家体制有其根本的虚伪性。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汲黯就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自己也知道，他的仁义是虚伪的，只不过为了统治需要，必须要举儒家伦理的牌子。

然而美好的政治理想，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地容易实现。主张仁义礼智，未必就能实现。就像弘扬实事求是，未必就能真的实事求是。无能的统治者，解决现实与理想差距的办法就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但我们更应该反思这背后的原因，才能治本除根。一种价值观要想得以维系，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合的制度。如果大家讲仁义，那就必须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仁义之人要得到奖赏，不仁不义之人要受惩罚。想让大家做好人，就必须要有个让“好人有好报”的制度。如果好人总是有恶报，大家都不傻，谁还愿意当好人？就算要当好人，也只能是装装样子。

儒家制度的问题就在这里，讲“忠孝”，但真正忠孝之人往往

都不得好报。比如忠诚的韩信，韩信攻下齐的时候，就有谋士建议他自立为王，让刘邦和项羽两虎相斗，然后坐收渔利。如果韩信帮刘邦，刘邦自然会打败项羽，那么韩信则是功高盖主，不会有好结果。但韩信不听，他认定刘邦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他忠于刘邦。结果刘邦称帝后，韩信果然不得好死。

春秋时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是个忠孝老实之人，却只能被骊姬害死。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机关算尽。骊姬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之后还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献公打猎回来，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这是赤裸裸的冤案，当然有明白人，有人劝申生去找献公申辩。可大孝子申生却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君父老了，没有骊姬照顾怎么行？于是申生上吊自杀，这就是孝子的下场。

历史的教训都在那里，后人怎能不吸取？忠孝仁义，呵呵，只能骗鬼了。先汉时期还好，因为战国遗风尚存，再加上新制度刚刚建立，大家还不明所以。可时间一久，谁都看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忠孝仁义那东西有什么用？想要利益，还得靠阴谋诡计。

当然，“好人不得好报”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假如皇上英明，懂得重用忠义之臣，惩罚不义之人，那么这种“忠孝仁义”也许尚能为继。但君上仁不仁义，英不英明，又完全没有制度保障，只能碰运气。

“君要仁，父要慈，要像君和父的样子，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也没法进行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像不像样，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天然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

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孝，他得死；尽忠，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摘自《易中天中华史》）

历史上明君难得，可昏君却能代代相传。越是昏君，越会豢养道德败坏的臣子，而高尚之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又难以出头。于是恶政就像一面筛子，淘汰清官，留住贪官，而且越筛，清官越少，最后留下满朝小人。到最后，就算皇帝想励精图治，身边没有一个可用之人，怎能不亡国？

要想弘扬忠孝仁义，就必须有一套与其配合的制度。要想让大家做好人，就必须在制度上尽量保障“好人有好报”。也就是说，要建立一套维系“公平正义”的制度。但儒家制度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它人为地制造阶级不平等，而且还把这种不平等当成整个制度的基石，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土壤。

这恰恰是中华文化的薄弱之处，中国人是不讲“公平正义”的。于丹说：“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不公平，而且自己处于不公平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于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以至于温家宝在任后期，也说中国要弘扬“公平正义”之风。

但“公平正义”之风气是很难弘扬的，因为不公平不正义种在了中国民族的基因里。这个国家整个价值观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儒家提倡的不公平的关系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有公平可言，人就只能想坐到不公平关系中有利的位置上；于是“犯

上作乱”不可避免。中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之上；中国人不讲互相尊重，而只讲自下而上的服从。这样的制度没有公平的基因，也不可能有正义的土壤，只能有无止尽的争权和夺利。

有人说，法治是一种下等制度，德治才是上层之选，因为只有大家都不讲德，才需要靠法制来规范人的行为。但问题是，就像前面说过的，德治的理想是好的，但道德需要公平正义的土壤才能生长。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所依赖的德治的基础恰恰破坏了公平正义的土壤，所以这种制度有根本的虚伪性，也终究要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满嘴仁义道德，却无法建立起真正有道德的国家。

教化，还是愚民？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依靠道德的教化和灌输达到“人人尽孝，人人尽忠”的目的。于是要大力树立榜样，大力宣传，从小学课本到地铁广告，从感动中国到劳动模范。我们执政者以为，确立一种“正确”的思想，然后通过宣传，灌输到每一个国民脑中，于是大家便能一起“正确”，于是国家就可以走上富强之路。这种政治理想及手法，在我国流行了千年之久，至今不衰。

我国的统治者们，从古至今，都认为他们有教化人民群众的义务，所以必须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灌输给他的子民们。然而这种“责任心”只能让我感到反胃：其一，他假设了我是愚昧

的，而他是聪明的，因此我才需要他来教化；其二，他假设了，他是我主子，而我是他的“子民”，我俩从来就不平等。然而我并不愿意承认我比他愚昧，我们只是职业不同；我更不愿意承认他是我主子，相反，他应该是我的公仆（官员理应是人民公仆）。

宣传灌输这种手段，无论他宣传的是什么，都已经侵犯了我的思想自由，也侵犯了我作为国家公民的尊严。而当其宣传的主题出错时（历史告诉我们，通常错的越离谱，宣传就越猛烈），甚至可能造成全国的灾难。我们认为可保万世永昌的政治手法，其实非常擅长把国家领导人的错误放大成全国的灾难（毛在文革中的错误并不重要，因为是人就会犯错，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种错误是借何种力量，以致于成为全国的灾难？我们永远无法保证执政者总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当下个领导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卷入另一场惨烈的灾难？）。此外，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一定“正确”的吗？（我们认为宣传孝是一定正确的，本文旨在证明这种认识是错的）。

与宣传相辅相成的便是愚民政策，所有的宣传都多多少少带有愚民的成份。即便是商业广告，从那些夸张的广告词中，我们也能看出愚民的味道。愚民政策不仅是剥夺了人民知晓真相的权利，更大的罪恶在于，它会导致民众智力的钝化。在一个鼓励接受而非批判，鼓励灌输而非思考的环境下，自然不容易启发民智。而一个民智弱化的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强盛起来。

一个国家的强盛，决非取决于它有一个多么英明的领导人（当然领导人也很重要），而是取决于他的人民有多少智慧和力量。国家的命运最终是他的人民决定的，而开启民智首先体现在对人民思想的尊重。因此，之前提到的那个幼稚的政治理想是根本不可

能实现的，所以我称之为乌托邦式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宣传和愚民成为强国，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即便金正恩是不世出的奇才，也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宣传真的使国民变善良了，还是变得更笨了？

我国的统治者，从古自今，就认为百姓越愚钝就越好管理；越好管理，国家才能越团结，越团结才能越强大。这种逻辑其实就是说，国民要先变得愚钝，而后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想想，这是可能的吗？这当然不可能，可是我们愚蠢的统治者偏偏信的就是这套理论，而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从来不会理解平等、尊重、多元对一个社会的意义。

奴性的根源

中国总在弘扬传统价值观，弘扬儒家价值观，好像这套东西在今天还能拯救中国似的。然而儒家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不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所有文明都追求的品质，不是儒家的发明。就好像你不能说“真善美”是谁的发明或主张一样，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文明会追求虚伪、邪恶、愚昧。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差异，则在于怎样实现这些美好的品质。有的国家选择了宗教信仰，有的国家选择了法治，而中国选择了“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又以“三纲”为重，所谓纲举目张。三纲则是君臣纲、父子纲、夫妻纲。儒家制度的主张其实是，只要抓住君臣父子，就抓住了根本，于是就能天下大治。

具体点说，“孝”并不简单指善待父母。善待父母西方人也知

道，父母和子女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亲情总是有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中国所主张的“孝”，重点则在于强调一种等级关系，即子对父的服从。父母相对于子女不是平等的，而是高高在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无条件尊重和服从。所以父母骂你，你得听着；打你，你得受着。中国特色的孝，恰恰就体现在这种霸王条款般的等级关系中。

可以这套等级秩序，在强调臣子对君父的绝对尊重和顺从的同时，却给了处于道德优越地位的人——父与君——以无恶不作的口实。其结果就是臣下抛头颅洒热血，君王还能歌舞生平；父母日不识丁，子儿还得唯命是从。

这种价值观在强调一种道德的同时，却纵容了更大的不道德；在强调一种义务的同时，却纵容不承担义务的特权。这种价值观完全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的可能，这种价值观让子女成为父母的佣人，让臣子成为君王的奴隶。中国人就是这样千百年被奴役着，而且他还把奴役的价值观当道德，而“孝”就是这奴役价值观的根源。况且这种价值观真的能使国泰民安吗？中国上千年历史的实践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事实上，“三纲”不但不会促进“五常”，反而可能是所有美好道德的掘墓人。像“忠”“孝”这种主张，因为它不讲平等，不讲尊重，这种价值观摧毁了一切道德赖以生长的公平正义的环境，这种价值观只能沦为虚伪的面具和统治的工具。这恰恰是中华文明需要反思的地方，也恰恰是西方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尊重的可贵之处。

今天还在提倡传统价值观，是在提倡什么呢？用等级代替平等？用服从代替自由？用奴性代替尊严？用野蛮代替文明？

中国要想进步，只能接受现代自由、平等、尊重的价值观，没有别的出路。我并非主张把儒家理论斩草除根，但是如果认为忠孝仁义那一套比普适价值更重要，那是开历史倒车，那是重回愚昧之路。认为依靠“三纲五常”就能天下大治，无异于痴人说梦。

儒家与宗教的再反思

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这要看怎么定义宗教，假如说必须要信仰一个神，或者上帝什么的，那中国确实没有宗教。不过这么定义宗教就太狭隘了，宗教存在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的心灵找一个归宿，为人类的生命找一个意义，为人类群体提供核心价值观。对个人而言，人要想不醉生梦死地活着，活着就必须有个奔头，宗教则为人体的生命提供了一种意义，它让人相信存在超越个体生命，超越现实生计之外更大的东西。就民族而言，一个民族要想长久延续，必须依靠某种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从而民族认同才能代代相传。核心价值观要比国家政权重要的多，有核心价值观但没有国土的民族可以延续千年，比如犹太民族。而没有核心价值观，即使有强大的国家，最终也会消失殆尽，比如古埃及。而宗教则提供了核心价值观，因此从古延续至今的文明都会与某个宗教联系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中

国是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教没有宗教。

但中国其实有宗教，就是儒教，只不过它不是信仰某种外在上帝的宗教。按照上面两个定义，基督教让人相信人活着有超越自身的更大的意义，即“荣耀上帝”，“为上帝而活”。儒教则教人崇拜祖宗，儒教徒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认祖归宗”，“光宗耀祖”。儒教没有外在的神或上帝，而是靠定义人身依附关系，来为信徒提供核心价值观。所以儒教中最重要的品德，忠孝悌节，都是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道德品质。

因为家国一体，最大的祖宗就是祖国，所以“光宗耀祖”后来演变成了“报效祖国”。基督教中上帝的代言人是耶稣；在儒教中，则是现世的皇帝。皇帝并不只是政治首领，他也是宗教首领；他是国家主权的代表，也是祖宗崇拜和国家崇拜的寄托。所以皇帝有半神性，从末代皇帝溥仪身上就可以认证这点，他早就没实权了，但不管在宫内或宫外，有人见了溥仪还是会跪拜。因为皇天在上，其实承载了中国人的信仰；皇帝即使没实权，也是不容冒犯的。这点在日本天皇则更明显。

宗教笼络人心、宣传教义通常以这样的形式：宗教的神，比如上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上帝不容亵渎，必须无条件尊重，如果容许置疑或辩论，那就不是宗教，教义则是上帝的旨义。让人们遵守教义是困难的，如比让人们平白无故地去行善，却做好人而不图回报是十分困难的，必须给人一个理由，上帝和来世就是这样的理由。反观儒教，忠孝仁义就是教义；为了支持这样的教义，父和君就相当于上帝。儒家提倡的忠孝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的非对等性，父和君在儒家道德里有不容置疑、无条件尊敬的意味，因为他们是儒教道德观念的现实载体，这就和上帝和耶稣

的作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崇拜神的宗教，必须寄望于来世，才能为相信上帝和遵守教义找到依据；而对于儒教，忠君和孝顺则有部分人性基础，因此儒教是完全现实化的，而不需要寄托来世。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而延续，儒教自然功不可没，因为它给中国人提供了核心价值观。而它的宗教属性也决定了它和其他宗教的传人是冲突的，比如佛教在中国传播时就曾引起统治者的恐慌。“[佛教] 宣扬和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人人平等，至尊天子也与庶民平等，因此，帝国的统治者难免怀疑佛教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易中天《禅宗兴起》）

如果把儒教看成是宗教，那么中国就是政教之一，皇帝既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儒教的神；父既是家庭的统治者，也是儒教的神。但这样的人设无疑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儒教给予父和君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的权威，当这权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给滥用权力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样了制度本质上摧毁了平等、正义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而且与思想层面上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不兼容的。

崇拜幻想中的上帝的宗教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提供核心价值观，掌握最真理的是上帝，而非政治领袖，人们只须忠于上帝而非帝王。平民和帝王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就为平等、自由、限制皇权埋下了伏笔。

对于信仰一神教的子民而言，对神的信仰比对国王的效忠更重要，对神的认同也比对国家的认同更重要。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国家”二字，甚至可以为国家做出任何牺牲？因为“国家”

本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这跟信仰上帝的人愿意为了上帝做出任何牺牲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因上帝而争论不休。比如耶稣究竟是人还是神，就是基督教的大争论。既然都是虚构的，又何必较真呢？其实不然，因为宗教关乎核心价值观，关乎终极的对错，因此这种问题必须较真。同样，外国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对毛泽东的评价呢？历史人物都有功过是非，哪能做一个唯一的定论？其实也不然，皇帝就是中国的上帝，这关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臧否历史则是伦理治国的基础，所以中国人必须在意对帝王的评判。

韦伯与中国

我一直认为中国之所以腐败，中国人之所以不讲规矩，搞裙带关系，是因为中国长久长处集权专制之下，而阻碍了法治之发展的结果——所谓制度决定人性。读了韦伯的观点，我发现了从宗教文化角度的另一种解释。

马克思·韦伯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职业精神”，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特质：一、工作作为目的本身而被珍视，个人对他的职业活动具有一种责任感；二、致富不仅是个人职业成功的证明，而且是个人德行的证明；三、为了未来的成功而克制眼前的享乐。

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对的是韦伯称之为“传统主义”。“传统主义”表现为：一、闲散的工作习惯，得过且过的态度，无职业

精神；二、经济活动中“内外有别”，对没有亲属关系和密切关系的“外人”不讲任何道德规范、不惜一切手段，对圈子内的人则不计原则地容忍。

显然“资本主义精神”是更适合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价值观。但为什么西方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不能？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是因为先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后才产生了与之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韦伯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比如“在十八世纪的宾夕法尼亚，资本主义很落后，然而人们的‘资本主义精神’却非常突出；而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佛罗伦萨，反资本主义的理论态度却占主导地位”。与唯物史观不同，韦伯的看法突出了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毕竟是人，经济发展则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人是受他的思想、信仰、文化、宗教支配的。我们能看到无数为了保持其宗教信仰而牺牲经济发展的例子，比如在印度或在中东，但却少见到为了经济发展而改变其民族信仰的例子。

韦伯进而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了一起，新教包含三个信条：一、人生而劳作，既顺应自然，也合乎道德，上帝会嘉许努力劳作的人；二、来自勤勉的财富是善的，而为了懒惰或奢侈而追逐利润则是恶；三、倡导严肃、寡欲，始终有计划性有目的生活方式。

仅对比一下新教的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便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为了解释新教和儒教伦理的差异，韦伯对比了西方宗教发源地（中东）和中国历史环境的差异。在古代中东，人格化的天父

(上帝)的观念与频繁战争有关。中东地区民族众多，战争频繁，犹太人只组成了一个“小国”，置于诸列强中间。频繁的战争加之不得不时常屈服于强权，给犹太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摆脱苦难的夙愿使他们诉诸于超现实的上帝，于是耶和华就以超现世的命运主宰和带领人们摆脱苦难的形象出现了。现实的苦难让人们憧憬来世，于是形成了基督教天堂和地狱的概念，这种宗教将现实的苦难归因为人与生俱来的罪恶（sin）；因而告诫人们要想来世摆脱苦难就要遵从耶和华的告示，即遵从人与上帝之间缔结的伦理契约——这便成了西方伦理道德的基础。

这样形成的道德会有几种特性：一、它的出发点是人性本恶，强调人的原罪，而遵从伦理道德是对原罪的救赎；二、它天然具有普适性，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耶和华的旨意和教诲对所有人都一样。

承认人的恶是西方伦理和中国伦理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如果说西方人比中国人直率，可能根本就在这里，西方人不忌讳谈自己的私心和欲望。而中国文化里，私欲是难以启齿的，必须用表面上的客套加以包装。承认人的恶，所以西方的制度总是试图在承认个人私心的前提下在各方利益的冲突中取得平衡，试图为人与人之间的私心寻找妥协的平台。他们不要求人人有公心，而是努力在制度设计上将人的私心与公众利益相绑定。而中国文化中，虽然个人私心客观存在，但中国文化却耻于将之公开化，缺少一个公开的能让人与人利益冲突相互妥协的机制；人与人交往只能把私心装在肚子里，而表面上维持所谓的君子风度。这便是中国人虚伪的根源。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垫定了西方文明里平等的观念；而对上帝所制定道德律的普遍遵从，便造就了西方文明中遵从普适性规则的传统（法治的传统）。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先天地就是以人与人之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的道德观——长幼尊卑——全系为了维持一种等级秩序，这是中国社会得维持稳定的基础。而西方社会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那么社会的公共事务决定便只能是一个自下而上形成某种共识的过程。当然，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伦理道德是有原因的。韦伯再次从历史环境的角度予以解释：在中国，由于很早就形成了和平统一的帝国，所以中国人无需借助超现世的神来摆脱苦难，因而儒教中没有神，也没有来世的概念。一切都是现世的、现实的，一切伦理或规则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现世的秩序和安宁。于是儒教把忠和孝作为伦理的基础，其目的就在于巩固君主和户主的地位，从而维持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儒教特别强调“得体”的观点，所谓“得体”就是合乎社会普遍的秩序，所以“出风头”或不守规矩的人是被这种文化排斥的。儒教缺乏超越世俗事务的伦理要求，这意味着它对“普遍性伦理”观念上的拒绝。

这种伦理中是不可能平等的，也不可能是普适的，没有所有人共同遵从的原则性。出于对维持秩序的考量，统治者所遵循的“道德”和被统治者所遵循的“道德”势必是不同的。比如父亲打孩子是可以的，而孩子打父亲就是决不允许的；中国人观念中没有“打人就是错的”这种适用所有人的观念。再比如君王杀人是可以的，但人要弑君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弥天大罪；可见中国人的道德中也没有“杀人就是错的”这种绝对道德。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权、人道主义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没有立足之地。人本主

义、人道主义能在西方发扬光大，根源还在于基督教人人平等的观念。因为在上帝面前，没有谁比谁更有优越感（当然有人会借上帝之名攫取特权）。在中国人的道德谱系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按照某个固定规定，而是看什么有利于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最大的美德就是“听话”：妻子听丈夫的话，孩子听父母的话，下属听领导的话，而所有人都要听皇帝的话；而最大的不道德就是“叛逆”和“犯上”。

这种基于秩序的伦理道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下级对上级的忠或孝是绝对的。而上级仁不仁义，守不守礼，是不是好人，则全靠自觉。所以你看中国的怪象：当官的要求平民勤俭节约，但官老爷可以胡吃海喝；家长可以把孩子打得七窍流血，而孩子却不能反抗。这些现象在中国的语境下竟然都是合理的。说穿了，中国的老祖宗们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压迫和剥削的制度，并用一套伦理道德把这种制度合理化了。当然，如果是赤裸裸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制度也难以存在这么多年，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在于他还要求剥削者多少也要为被剥削者着想。比如对于处在伦理道德高点的君父，儒家的观念要求他们对臣子仁慈宽厚，对于剥削人民的统治者也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但君主仁不仁慈，统治者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没有规定也没有制度保证的，底线是必须让底下的人能过得去，不要逼着人家造反，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以忠孝为道德基石的儒教体系中，只强调一种责任——对家庭（孝）或对国家（忠）的责任，而不像西方宗教一样强调对上帝而非某个现实的人或集体的责任。因而在儒教的体系中，人身关系（家庭关系）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这决定了儒教对家庭的

过度重视，而不像清教的伦理强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对亲属朋友的爱也要有节度。正是这种教义打碎了亲属关系群的羁绊，突破了血缘共同体，建立了基于共同信念的更高共同体，社会化的大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得以形成。

基督教把遵从伦理道德当成一种对原罪的救赎，清教则把尽职工作当成一种救赎方式，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这在儒教的语境下都是不可能的。在儒教里，一切道德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维系秩序，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秩序是以领导人物为核心的（君或者父）。这种伦理道德的结果就是：一切看领导脸色——这是一种以人身关系为目的而非以任何物质为目的的道德观。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是否尽职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领导”尽职工作，重要的是和领导搞好关系。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凡事不认真，只会糊弄领导的风气。这种风气之所以根深蒂固，无法改变，是因为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里（儒教伦理）。

在儒家的体系中，“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以人为本的任何价值观也都是没有地位的，个人的目的就是服从集体。而集体的目的不是靠集体成员商议而定，而全靠领导的意志。比如一个家庭的面目是由他的户主框定的，他可以惩罚没有按他意志行事的家庭成员。一个国家的目的就是执行领导人的意志，为了实现领导人的意志，国民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应该的。

可见儒教的伦理道德观和西方的基督教伦理观是根本矛盾的。西方的道德观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演化成近代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这些在儒教的价值体系里都是没有根基的。所以不难理解，在西方人看来，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是邪恶的，他们不讲原则，什么都可以干。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不需要讲原则，

他们最大的道德就是维系一个体系的稳定，当然还有从这稳定中生发出来的民族自豪感。

论法治的意义

以法而治 (Rule by Law)，又称为以法管治、以法制民，为区别与法治，而简称**法制**。是一种对法律存在目的的认识和信念，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制定法律以管束人民。

法治 (Rule of Law)，是与人治相反之概念。与法制不同，法治指以民意授权为前提和基础立法，以严格依法管治国家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的内涵，不单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以及独立的司法。法治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与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人治相对立。(摘自《维基百科》)

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并不是只要有几本法律手册就叫法治，并不是有本宪法就叫宪政。中国的古代社会时也有法律，明朝有大明律法，清朝有大清律法，但这都属“法制”，而非“法治”。这些律法不过是作为皇帝统治的一种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人治。有人说中国早就有法治思想，战国时就有“法家”。这便是张冠李戴，法家的“法”和现代法治的“法”没有任何关系；就其目的而言，甚至是完全向左的。法家所讲的法，是权术之法，是王霸之法。现代法治观念强调的是对公权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护，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还不止。

所谓“法治”，之所以称之为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法治的要旨在于，它用一系列法律条文规定了社会的运行规则；这种规则一旦被制定，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规则之上。法律界定了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所有人只能在规则之下扮演自己的一份角色。在法治社会的框架下，公民行为的正当性无关乎道德良心，而全系由是否被规则所允许而定。与之相对，人治的社会里是没有死规则的，规则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随时改变的。统治者采用什么手段、什么规则治理社会，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判断。他或者能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依据自己的道德考量或价值判断行事，亦或者完全听凭自己一时兴起而做决定。

正因为如此，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风尚，平等、自由与尊重只有在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在法治社会里，规则的约束力是最高的。恰恰因为所有人都在遵守同一套规则，没有人有超越规则的权力，所以平等才能实现。而规则界定了每个

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任何人不能逾越规则去干涉别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由范围是确定的，自由因此才可能得到保障。

而在人治的社会里，平等和自由都是不可能的。人治本身就要求某些人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某些人可以“合法”干涉（或者说管理）别人的事务。这样的社会强调的不是平等，而是等级；不是自由，而是服从。这样的社会，整个社会的习俗和风气都会向领导人倾斜（因为领导人希望把社会改造成他理想中的样子）。因此，这样的社会崇尚的是军队式的上行下效，而非开放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只有在法治的社会里，社会分工、合作、互相尊重才有可能。在法治的框架下，没有哪个人、哪种职业高人一等。人们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职业和工作，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尊卑贵贱被平等和彼此尊重所取代。而这种不同职业的平等化分工，对社会的均衡和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

但是在人治的社会里，则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人治的社会不可避免地等级化，因为没有共同的规则，人与人的权力天生地不平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想往上爬，不断地追求特权。享有特权的人便可运用自己的权利来盘剥他人，而特权之下的平民百姓永远都处于弱势的地位。不同的职位和工作必然被划分为高下贵贱，越是接近特权的职位越高贵，越是远离特权的职位越卑贱。这样的社会，进步，靠少数精英的领导；落后，则由于领导决策的失误。这样的社会，会像军队一样向某个被领导制定的方向前进，但不可能存在均衡、多元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尊卑贵贱的社会里，道德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

种社会本质上不鼓励“利他思想”的存在，人人挤破头涌向特权阶层，这样的制度鼓励的是竞争上位、互相倾轧和谄媚逢迎。倘若谁抱着利他主义的善意，必然会惨遭淘汰，最后沦为被剥削的下等公民。这种社会里如果存在道德，那么只能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或者是人与人之间露骨的利益斗争的虚伪的掩饰。这样的社会，只会宣传忠诚、爱国、服从之类的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互助从来不会是这种社会道德主旋律。

只有在法治社会，以利于他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意识才可能形成。人性本恶，人必须在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在明确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的前提下，才会去帮助别人，才有行善之举。法治消除了阶级倾轧，保障了人的权利，公正的司法会惩罚做恶的行为。正所谓，管住了人的恶，善才会自然生发。在法治良好的社会，人们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于是人才有闲心去为善。久而久之，友善之风才会形成。

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终极标准。即便是政府、是总统，也只能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完成法律规定的职责。在法治社会，政府只是整个社会有机组成的一份子，它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可以随意干涉其他组织行为的权力。这种传统起源于英国大宪章运动，贵族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不受国王侵犯，与国王签订宪章，限制了王权可管辖的范围。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认为政府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第一，保护国家安全；第二，执行法律，保障社会公正；第三，建设和维护一些能提升全民福祉、但私营企业不愿参与的公共事业”。恰恰因为受限的政府，为无限的市场打开了空间。这样的社会才能调动各个领域的全民智慧，所以它的成就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个政府或领袖所能

设计和规划出的蓝图。

人们往往误以为专制的行政效率比较高，在专制的体制下，令出即行，上行下效。在这样的社会里，表面上政府什么都在管，但实际上什么没人管。社会乱象横生无人管理，正义得不到伸张，恶霸无人惩治。所以，专制主义往往等于无政府主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人治的社会，社会规则的运行根本不会催生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意识。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往上看”，看上级的脸色行事，而不会“往下看”，为平民百姓办实事。这样的社会只会不断鼓励“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不会产生真正卓有效率的公共管理和服。

社会是众多个人和组织各式各样参与者的结合体。任何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协调众多参与者的问题。法律的意义在于让所有人都按照统一公开的一套规则行事。但假如这套规则不存在，社会成员则会自发地形成一套“潜规则”。比如人情、面子、关系等等。因此越是法治缺失的社会，潜规则越是横行；潜规则越是横行，腐败就越是无法避免。假如一个社会人人遵守规则，一切事务都按照规则办事，自然不会有“吃拿卡要”，贪污腐败也自然没有了市场。但如果一个社会依赖人情、关系等潜规则在运转，权力寻租就无法避免。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的社会，通过制定社会成员之间彼此互认的规则，减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否则社会成员之间只能自行协调），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不必花费大量经济协调人际关系。所以在法治的社会里，企业家可以完全不关心政治，科学家可以完全不关心商业，人人各司其职。由此社会才得以最广泛、最细致地分工，而专业的分工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久而久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

的价值观会向专业性倾斜。这样的社会赞誉在各个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同领域之间的人会彼此尊重。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孕育真、善、美的价值观。人类的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任何专业领域的进步都会把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对专业性的追求会促进对真善美的追求；欣赏专业性的价值观自然会导向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

但是在人治的社会里，真善美不可能得到伸张，这样的社会只会导向一种“权力美学”的价值观。在人治的社会里，社会等级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高下尊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此社会广泛平等地分工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所孕育的价值观，不是对专业性的崇拜，不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是一种“权利美学”，是一种对“高等级”、对特权的倾慕。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权力跪拜，人们会欣赏并屈服于特权者运用权力豕狗般驱赶下人的姿态。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大的审美品位莫过于看到千万人臣服于自己脚下。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真正的道德、同情、悲悯之心都会被讥笑为妇人之仁；而君子之仁指的是冷血无情、挥马扬鞭，千万人头颅落地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雄才大略”。这样的社会里，道德只会沦为虚伪的面具，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道德。这样的社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暴戾。这样的社会，简直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托克维尔有一段话，深得共鸣：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

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的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从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他们更占据了统治地位。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互相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

如果说只有自由才能使社会免于暴戾和孤立，那么只有法治才能保障自由的实现，只有法治才能促成一个公正、利他、向善的社会。

休谟认为，区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评价政体良莠的标准是有无法治。无论是一人之治的君主之国，还是众之治的共和国，只要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国家的权力在法的统治下相互制约、均衡运行，就是一个良好的政治。

可以说，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准就在于看它是否法治。

法治与民主

现代法治的另一个特征是法治和民主的紧密联系。一个法治的社会，既然规则是这个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那么自然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规则应该由谁来制定；换言之，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假如规则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制定的，那么就难免这种规则会成为少数人统治的工具，会成为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因此为保障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求立法的过程必须经由民主程序。社会的不同参与者，不同的利益集团，必然都希望能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一套规则如何被利益互相冲突的社会成员一致认可和遵守？民主程序，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即是解决不同成员之间相冲突的利益诉求最简单、最直接的妥协方法。

当然这里的民主并非指普选。这种民主妥协的程序可以包括全民在内，也可以只包括少数利益集团。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本来是只包括少数人的民主，这种民主只是为少数精英提供一种利益冲突时相互妥协的平台。之后扩大到全民范围，则是给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以最高的尊重。因为这种全民民主，给了社会最底层群众和社会上层精英一样的政治权利。

但不管是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民主，都是法治社会所必须的条件。只有民主的存在，只有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级层

都有话语权的情况下所制定的规则，才能保证法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某一阶级的权力才会被法治所限制，法治才能得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种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级民主协调下所制定的法律（社会一致规则），必须与某一层阶级（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用于方便统治的规则区别开来。后者只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好比公司的章程，这种“法律”并不具备限制公权的功能，并不具备制衡各阶级、各利益集团的功能，因此完全无法起到上述法治社会的效果，这种统治本质上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法治社会里的法律规则，一旦被制定，就不会轻易更改；若要更改，也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法治的优势恰恰就在于，人们可以按照一套不变的规则行事，人们因此事先就知道，自己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自己的哪些权力会被保护，别人的哪些权利不可侵犯。正是因为这种规则相对稳固，每个人的自由空间才得以被保护，法治也才可能起到它应有的效果。而人治之下所制定的法律，通常是经常变更的，随着统治者的意愿朝令夕改。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到底哪些是被保护的，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是一定合法的或一定非合法的，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根本无自由可言。

法治下的规则是死板的，但规则下的个人是自由的。因此看似死板的规则，反而更有利于人们的创造力发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创新是必然被保护的（而不像在我国，像网约车这样的平台，正发展到红火之时，被政策腰斩了；有了前车之鉴，企业家在创新时势必畏首畏尾）。

中国是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的国家。中国人治的传统太

久，以至于极少有人理解法治的力量。中国人觉得总要有人来管事，不管怎么行？殊不知，管的越多，管的越乱。欲治反而不治，不如不知而治。

毛泽东与“大一统”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谁能想到四十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成了中国最富争议的人物，拥护毛的人和声讨毛的人俨然是中国意识形态对立最为突出的代表。不过历史的趣味之处正在于此，当年毫无争议的人物可能变得极富争议，活着时候的正人君子死后可能变成小人，曾经的大忠大贤可能被后人翻成奸诈不孝。比如曹操，起先是佞臣，后来是奸雄，后来国内出现曹操热，曹操被“平反”了，变成了真英雄，说不定后人读三国时又搞出个新名堂。估计毛泽东也会像曹操一样，被后人翻过来翻过去。

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历史本就是任人评说，确定一个唯一正确的“历史”那是为了统治目的杜撰的故事，不是真的历史。对历史翻来覆去评说的过程本身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评价，本身就丰富了看历史的侧面。在不断地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历史的真实性方能不断显现。当今对毛泽东正反

两面的评价，也许只是还原了那段历史本应具有争议性。

生在中国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崇拜毛泽东的情结，至少在不谙世事时是如此，就像很多中国人提到无朝广阔的疆土会自豪一样，随着知识的增加，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可笑。前几年我翻过一本精编的《毛选》，看来看去，实在没觉得有多高明。毛毕生读书，大抵以中国古典经史子集为主，尤好研习帝王统治之术。至于西学，他实在知之甚少（这也是时代所限，毛青年时期外国译著数量很少）。好不容易学个马克思，他能理解多少也是个问题。他的哲学水平在我看来不过初窥门径，经济运行原理根本不懂，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如同闭门造车；至于科学、艺术领域，他完全是门外汉了。毛的专长是读史，而且颇具诗人气质。假如毛是个古代帝王，必然是千古明君；但是要发展一个现代中国，他必然不是能手。

我记得以前读过：毛的成功其实跟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没关系，主要在于毛对中国历史的领悟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我深以为然。我亦认为，中国走上今天的道路，跟什么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全然无关。中国之今天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比如中国自古有官是百姓“衣食父母”的传统，自古有统一、统筹的思维，“社会主义”不过是恰好迎合了这种民族心理而已。中国人的国民性使然，中国必不可能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你说，这叫社会主义最适合中国，那也不错。但这种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就像包治百病的“基督”是中国化的基督），跟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已没什么关系了。

毛的文章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什么《矛盾论》，也不是什么《论持久战》，反而是他青年时写的一篇《反对统一》。毛说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天想统一，所以他反对统一。

中国人是有“大一统”情结的，“统一”就是进步，“分裂”就是倒退。国家要是分裂了，就像人脑分瓣了一样，是痛苦到不能忍受的事。统一有统一的好处，但未必没有坏处，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但如果你问统一有什么“弊”，估计没几个中国人答的出来。

我近几年游历的多了，渐渐地有了点自己的看法。一般以为大一统的国家才能发展壮大，但历史和现实却表明恰恰相反，国家一旦牢牢地统一了，基本就死水一坛了。诚然，一般散沙、没有个有力政府的国家是很难发展的。比如非洲，非洲是种族多样性最多的地方，而很多地方至今没有像样的政府，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了。但太过统一的国家，铁板一块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会稳定，但也很难发展，比如明朝之后的中国。发展就要创新，而每种创新都是对某种现有秩序的打破。过于强调稳定统一的国家是容不下这种破坏式创新的，自然也就无法发展。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较快的时期都不是大一统时期，比如战国，比如宋朝。而统一又不失活力的时期，也不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时期，比如汉朝、唐朝。而真到高度统一的铁桶江山时期，比如明、清，不仅无法发展，反而连民族精神都丢了；专制之下，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奴才。

欧洲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那些小国从来没有大一统。因为国家小，没有哪个国家能绝对自己自足，总需与外国贸易，于是形成了开放的传统。国与国之间互相竞争，也相互学习。因为不断处于竞争当中，于是形成危机意识，不允许你怠慢。一旦国家大一统，关起门来自己自足，那么它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持

它的长治久安，如何愚弄民众以求稳定，那么自然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欧洲诸国战争不断，国家版图变来变去，今日欧洲的版图已大不同于二战前，生在 A 国的人，也许长大后就成了 B 国公民。由此形成了重人民轻国家，重个体轻集体的传统，于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方才有空间。

这就很像战国时期，当时的士人很自由，不拘于国家边界。商鞅是卫国人却侍秦，孙武是齐人却出走吴国。只有在那时，各诸侯才会求贤若渴；只有在那时，才会百家争鸣。而一旦秦统一了中国，知识分子立刻就成了不稳定因素，百家学说也立刻成了无用之物，必须付之一炬。

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欧洲印证。工业革命前“大一统”的国家（即王权强大的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曾靠强大的王权取得过不错的发展（开拓海外殖民地）。可是工业革命后，这些国家都跟进得很迟缓；他们不愿接受创新，从而很快变成西欧落后的国家。反倒是王权不那么强大、不那么统一的荷兰和英国后来居上。

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中最为“大一统”的国家（当然宪政和联邦制之下，美国再大一统也远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美国显然也是西方国家中最重“国家主义”者，川普的上台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大一统”，美国正在背离他引以为豪的西方价值观。所以统一也要有限度，当稳定、统一凌驾于一切之上时，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镇压各种异己思想，最终导致全民思想侏儒化，这样的国家岂有发展之理？

前不久看到北京大学教授李玲的一个讲话，她说西方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要走大一统加自主创新之路。我看得笑了，“大

一统”和“自主创新”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像古代王朝一样的铁桶社会搞出什么自由创新。你要创新，就得允许多种多样、稀奇古怪的观点，这样势必就不可能高度“统一”。中国政府似乎鼓励民众在其他领域的创新，但唯独不能质疑政府体制。但这是不可能的：其一，政治体制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对政治的思考是对人本身思考的自然延伸，你不能指望一个好的作家或导演在叙写人民生活时不掺杂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即使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你不能指望他的科技创新被政府封杀后（比如“滴滴打车”一度被封杀），他不对体制产生任何思考。不让人思考政治，几乎等于也封杀了其他领域的思维创新。其二，创新能力越强的民族势必越多元化，多元化的职业，多元化的思想，都决定了大家不可能无异议地支持一种政治体制。一个建筑工人眼中的理想政治，和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理想政治，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这种“人心散乱”的现象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政府必须调整其体制形式来适应这种大趋势。指望中国回到曾经的“大一统”状态，那是把原始农业社会的社会理想强加于现代化工业社会，本质上是思想的倒退。指望中国既保留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传统，又能自主创新，无异于痴人说梦。

要想在保留多元性、创新性的同维持一个一致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即自治基础之上的共识（民主制即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自治式的统治，在解放前的上海有过，在改革开放初的深圳有过，都创造过辉煌的经济成就，但都只是历史的一瞬间，很快就熄灭了。中国人骨子里是不相信自治的，只相信统治，自治就会乱，只有统治，才能保证统一，才能保证铁桶江山。

有时我在想，所谓“国家”到底在中国人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国家主义”在别的国家也许只是一种主义，但在中国那是一种信仰。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人类社会的图腾，你为他生，为他死。就像西方人信仰上帝，伊斯兰人信仰真主一样，中国人信仰的就是“国家”二字。

中国人先是信仰“祖宗”，后来“家国一体”，“祖宗”变成了“祖国”，于是“国家”成了中国人的信仰。毛曾经说过，中国打赢核战争，不过牺牲两亿人的事。为了保住“国家”的名号，两亿人都不算事儿，而且不少人都为毛的豪言壮语叫好。我听说古代的玛雅文明，祭祀时要用两万多个活人的头颅。在信仰面前，再惨无人道的行为都可以用信仰为自己辨白。如此说来，中国的“国家”大概等于玛雅的“神”，为了“国家神”的统一完固，当然什么都可以牺牲。可以这样以来，中国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

论有限与无限政府

不受限的公共权力是政治文明堕落的根源。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命题。

在开始任何讨论之前，首先我想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所有的讨论都是阶级或阶层，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商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等。当我说“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阶层；当我说“皇帝”的时候，不是指某个个体，依然是一个阶层，即皇权阶层。如果说某个特定的个人，任何人的权力都是受限的，即使是皇帝，比如秦始皇的权力就大一点，光绪帝的权力就比较受限。但是讨论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只有阶级才有资格进入历史。我们讨论的，不是某个特定个体对历史的作用，而是阶级、阶级斗争如何影响历史发展，如何塑造社会形态。

我们说西方的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中国的政府是无限政府。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西方是民主政体，政府受民意制约，而中国

的政府没有这种制约。但实际上，政府的权力是否受限，和民主与否并没有关系。当然，一个真正的民主制会对政府权力起到制约的作用。但我们看到柬埔寨的洪森，或者俄罗斯的普京，虽然柬埔寨和俄罗斯表面上都是民主体制，但他们的政府其实是不受限的。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政体的，不是他是否有普选，是否有皇帝，是一家之国还是一党之国，而是看他的阶级特性。如果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权力，从而形成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那么不论他是一个人的统治，还是一个党的统治，也不论他是世袭制，还是民主制，他都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相反，受限的政府权力也未必是民主的。中国的历史中，其实相当长时间，皇权、以及政府的权力都是受限的。比如，汉朝并非一个完全的郡县制，刘邦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所以汉朝是郡县与诸侯并存的。各个诸侯国相对自治，富庶的诸侯国可能不亚于中央政府，比如吴王刘濞因为吴国垄断盐铁而富甲一方。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中央政府和诸侯会形成一种互相忌惮、互相制约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汉朝的中央政府是受限的，因为他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当他的某种政策触犯了诸侯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招致诸侯的强烈反击。比如景帝想“削藩”，结果诸侯群起而攻之，酿成“七国之乱”。当然这种受限，并不保证政府能为人民服务，不过他仍然属于我们讨论的“受限政府”范围。

刘邦开创的这种统治模式，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是一种集权，但并不是专制。他没有专制的权力，即使像税收，如果侵犯到诸侯的利益，也会招到反击。诸侯有这个实力，中央政府因为忌惮，所以不能胡作非为。所以中央政府和诸侯之间存在一种张力，那么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无非有两种出路：一条路是中

央出来一位雄才伟略的统治者，比如汉武帝，把诸侯的力量削弱，从而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接近一种无限的权力；或者诸侯里面出来一位雄主，实力足够强大，能推翻中央争取，取而代之。如果谁也没有这种力量，那么可能就会走上第二条路，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

英国君主立宪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英国的贵族势力太强大，英国国王不是汉武帝，推不倒贵族，而贵族又无法取代国王，于是大家坐下来制定一个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使之不能侵犯贵族的利益，这样国王和贵族得以长期共存。如果中国没有汉武帝这样的雄主，如果中央政府和诸侯长时间对立下去而双方都不能占上风，会不会走出一统之外的另一条历史道路？也许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但历史不能假设。中国没有走上英国式的道路。约翰·密尔将人类与权威的斗争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争取对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争取统治者承认其具有某些不容侵犯的权利；第二个阶段，在宪法上层面上建立一些制约，约束统治者的执政必须得到群体成员的授权。还有更高级的阶段。但是中国人在对抗统治者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被统治阶级从来没有争取到任何权利，倒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不断扩大再扩大。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央集权逐渐强化的历史。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像诸侯这种制约中央政府权力的阶层不断被消灭。比如削藩消灭了诸侯这一政治阶层，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消灭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宋朝通过国有专营制度消灭了商人阶层做大的可能性。直到明清二朝，彻底变成了不受限的政府。其表现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层完全被消灭了，

社会阶层两级化，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制约统治者。比如统治者可以征收任何苛捐杂税，可以推行任何政策，而没有来自统治阶级外的制约；被统治者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忍受其盘剥，要么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揭竿而起。

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夹面包”来比喻晚清的社会结构：“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上下两层的“长面包”是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而“面包”中间的“夹心”，独立的“中间阶层”（比如欧洲的骑士阶层，或者日本的武士阶层，乃至商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是缺失的。

社会阶层两极化的影响是深远的。独立阶层的消失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和目的性的单一化。没有了独立的阶层，人也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所有的阶层都成了统治者权力的附庸，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变成了奴隶。春秋的时候，君王虽然尊贵，但国君失礼被大夫轰走的例子也是有的。汉朝的时候，皇帝轰不走了，但士大夫还是有尊严的，“士可杀不可辱”，三拜九叩之类的都是没有的，更不可能自称“奴才”。然而到了明朝，皇帝就算当众打你屁股，你也得忍着，尊严扫地，所有的人真正都成了奴才。唐朝的女人可以袒胸露背，可以骑马打猎，所以武则天能当皇帝不是没有时代背景的。但到了清朝，就只能裹脚缠足，夫唱妇随。明清两朝，社会几乎没有进步，被史学家称为“高水平停滞”，唯一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中华民族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全盘“奴役化”。

鲁迅说“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乾隆朝的纂修《四

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不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不但奴役了人民，还垄断了知识和真理，让人忘记了有骨气的样子，从而不知道自己在做奴隶。

当知识和真理被统治阶级垄断了以后，这个国家就不再有真理。但凡人类的知识都是在辩证的过程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一种认知需要被一再反驳，批判再修正，最终才能接近真相。所以，真理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充分辩论和批判后，形成的某种社会共识。当统治阶级垄断了真理的最终解释权，当这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而不允许其他人反驳，这个社会便不再有任何真理，只有愚昧。

当政府拥有了无限权力的时候，他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维稳”。中国人至今仍然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但历史的经验表明，“稳定”非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遏社会进步。明朝再也没有汉唐的进取和开放精神，烧掉了出海的船只，闭锁了丝绸之路；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如何在闭锁的国境内实现长久稳定的统治。清朝大兴文字狱，于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不在有任何进步，反智主义倾向明显。这时集权就变成了彻底的专制，管制就变成了彻底的统治。

他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最终的裁判者。他制定的规则，不管合理不合理，你只能被动接受。当然他可能要求官员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但是不管他倾听不倾听，都没有任何除他以外的力量来制约他。当他励精图治的时候，社会尚有发展的动力；当他

堕落的时候，没有人能阻止他的堕落。

所以中国注定不可能产生日本似“明治维新”。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统治阶级会不遗余力地“维稳”；由于缺乏独立于统治阶级的社会阶层，变革的力量势必非常弱小。即使被统治阶级革命成功，革命也必然是不彻底的。由于中间阶层的缺失，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依然是两极化的。所以新政权和旧政权没有本质区别，政府仍然是不受限的政府，人民仍然是砧板上的鱼肉。

共产党的“新中国”就是这种面貌，虽然他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统治一切的不受限的政府。共产党的政府是古今中外最庞大官僚体系，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提出“党天下”的褚安平就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不受限的公共权力是政治文明堕落的根源。这个政权的暴戾和黑暗，特别是文革十年，有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而是统治者——不论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他想实行什么主义就什么主义，他想公有制就公有制，他想私有制就私有制。无论他做什么，没有除了党以外的力量可以制约他。他今天觉得私有制是对的，他就实行私有制；明天他觉得公有制对中国更有利，他就能变成公有制。他觉得人多力量大，就让大家多生娃；他觉得人口太多了，说不

让你生你就不能生。你不同意他的政策，你能拿他怎么样？你反抗，他就镇压；你拼命反抗，他就残酷镇压。这种权力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挪威瑞典日本韩国印度泰国香港南非肯尼亚新加坡政府都不具备的，全世界除了朝鲜，恐怕就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本事。不管他披着什么“主义”的外衣，高举什么“旗帜”，说白了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

今日中国之社会结构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变革之中。改革开放以后，历史上由集权到专制、政府权力由有限到无限的“必然”进程似乎正在扭转；“中间阶层”在慢慢崛起，比如商人阶层在逐渐壮大。一旦阶层垄断被打破，必然会造成统治阶层的“统治危机”，因为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左右国家的其他力量。这个时候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交织，利益冲突也变得错综复杂，统治者会感到他的权威日渐受到挑战，上行下效的机制日渐锈蚀。

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一旦他的政策失误，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纠正他。掌握无限权力的领导人，一旦他犯错误，一个人的错误就会变成整个国家的灾难。这是整个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中国近百年来唯一取得的一点政治文明进步，就是强制领导人任期的限制。这相当于给无限扩张的权力，强制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即使他的政策误入歧途，也有个强制阶段性的终止。然而这最后的屏障，现在却也被推倒了！“开倒车”已无悬念，问题只是会倒退到什么地步，是倒回文革，还是倒回清朝？

读史札记：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统一是一种堕落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对统一是有一种执念的，身在中国文化之中的人也许难以察觉，但跳出中国的文化圈回头审视，这种文化特征是如此显而易见。对中国人而言，统一就是进步，分裂就是落后。中国人最痛苦、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分裂，国家分裂就像人的大脑分瓣儿了一样不能接受。对中国而言，统一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统一的目的就是统一本身。

不过我要说，中国的堕落是从秦始皇的统一开始的。如此评价秦始皇，肯定很多人不能同意。首次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始皇，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被誉为“千古一帝”。但我对这位“千古一帝”的评价实在不高。中学历史课本上说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是为多么多么大的贡献。我至今也不明

白，让所有的人都花同样的钱，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这算什么贡献？任何一个幼儿园班主任都能命令她的学生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这有何难？当然，统一货币能促进贸易，是有益处的。但这恐怕不是秦始皇的初衷吧？秦国什么时候想发展贸易了？这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管理上的便利吧？这算什么丰功伟绩么？

秦国的强盛始于商鞅变法。所谓的商鞅变法不过是把全国上下都变成秦国的杀人工具。商鞅废除了世袭的爵位，改为军功爵位制，也就是说秦国从此只奖赏上战场杀敌的人。商鞅建立的连坐制、高法制，就是把全国上下都变成一个特务组织。商鞅将文人、商人、艺人等与战争无关的人统统视为“国害”，加以铲除，全面禁止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杀敌，要么种地。于是整个国家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机器，难怪能统一六国。

有人说商鞅变法是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所以是正确的。我不能苟同这种看法。商鞅变法的确让秦国获得了统一六国的武力，但“统一”就是最终的正义吗？一统天下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要看怎么统一，统一成什么样子。商鞅设计的杀人机器，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在我看来，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看他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哪些贡献。历史红尘滚滚，国家可能消亡，民族可能覆灭，但人类文明的星火世代相传。如果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个国家，能为人类文明的马拉松贡献一份力量，纵然他已灰飞烟灭，但仍会被后人铭记。

历史上不乏文明被野蛮吞噬的例子，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但如今回首，成吉

思汗除了他的大规模屠杀能力令人叹畏，他还给世界留下了什么？蒙古帝国对人类文明留下的，除了杀戮，还有什么？没有。所以我认为成吉思汗的贡献为零，他不过是个野心家罢了。

如今的英国，已不再是上个世纪那个“日不落帝国”。但人类不会忘记这个大西洋上的小小岛国，因为没有英国带来的工业革命，今天的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抹不掉的一笔。这个小小岛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恐怕超过其它国家的总和。

中国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靠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的思想，是礼乐宗法的秩序。商鞅和秦始皇留下的不过是个野蛮部落，幸亏秦国二世而亡，如果秦国统治中国二百年，那么中国所有灿烂的文化可能都不复存在了，可能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中国了。这种统一也值得赞颂吗？

除了灭六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还有很多，北筑长城，南征百越，还给自己修了举世无双的皇陵。但这些“丰功伟绩”哪件不是用草民的白骨堆成的？修长城和修皇陵的苦工，有多少人能生还？就算不累死、病死，最后可能还得陪葬。在秦皇的眼里，人民就像牲畜一样被驱来赶去。这些“丰功伟绩”都是为了谁？即便修筑长城能保卫国家，但这个国家只是他秦始皇的国家，而绝不是天下人的国家。

对于古代的专制帝国，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是一回事。这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更有冲突的地方。国家代表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人民不过是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这种冲突贯穿着中国整部古代史，所以我们看到越是雄才大略的帝王，越是要集中种种资源为己所用，以至于百姓就被盘剥的越苦，秦

皇汉武概莫能外。但讽刺的是，中国老百姓又往往崇拜甚至追捧这样的帝王，因为他们被教导“忠君报国”，被教导“把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这样的子民，不知是可敬，还是可悲？

实用主义害死人

自汉朝以后，儒家知识分子就成了官僚组织的一部分，中国从此丧失了独立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这个影响是深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使知识与政治之间保持一段距离，长远来讲，这对知识和政治都是有好处。西方的知识和政治向来是分离的，这是自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传统。古希腊的哲学、数学、科学都不是以现实的实际用途为目的，而纯系知识分子吃饭了饭没事儿干的自娱自乐。即使是亚氏的《政治学》也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超越视角来分析政治；柏拉图的《理想国》纯是哲学家的构想。于是，理想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之间不停地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会让人们不停地反思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现实是否合理。所以“政权合法性”成为西方政治学中的永恒命题。

但是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学说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纯粹为了知识而存在的知识，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不论哪一家，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虽然主张不同，但主旨都是“治人之术”，都是实用的学说。儒家和官僚融为一体后，更没有独立于政治的学问。所以中国政治中不存那种理想与现实持久的对抗，更不存在“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只有如何维持现有政权稳定之术。

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影响是致命，中国人的全部知识，说穿了

不过“权谋”二字。中国知识分子对非实用、非政治的客观世界探索甚少，天文、地理、植物、动物，这些都是“玩物丧志”的无用之学；而有用之学，无非是混官场、混社会的权谋之学。诸子百家讲的都是“治人之术”，乃是权谋；《资治通鉴》是史为鉴来治国治人，也是权谋；《三国演义》中所谓的“智慧”，说白了还是权谋。把狡诈当智慧，把权谋当知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代价。

政治理想落空定律

钱穆说中国古代政治不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一笔抹杀，古代的制度设计，在当时的条件看来，很多是开明且进步的。比如汉朝将相权和皇权分离，内廷和外朝分离，已是一种避免皇帝一手遮天，权力制衡的机制。即使被后世垢病的察举制，至少在当时看来，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应有一套客观标准，而非全凭个人好恶、血缘亲疏。

的确，任何制度的设计初衷都是好的，但往往执行起来不能达到预想之效果。皇权、相权分离最终没能阻止皇权专制；察举制也没能阻门阀贵族垄断朝政。政治制度有时非但不能促进其设计初衷的政治理想，反而可能与理想背道而驰，这其中原因才是历史和政治学的最重要课题。

这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中国之政治秩序，是以一集权秩序强加于社会之上，当集权秩序与当时社会的自生秩序相抵触时，年久日长，政治秩序便沦为一纸空文，而与自生秩序相符合的潜规则盛行。但古人却不能有这番认识，只以为“人心不古”，所以历史一再重复，王朝周

朝，不能自拔。

为什么政治理想总是事与愿违？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一下为什么“体制内监督”往往沦为无效的工具。这其中的原因往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制度设计者无法了然的。唐朝有很多著名的谏官，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魏征。皇帝对谏官逆耳忠言的容忍，被认为是政治开明的象征。但谏官之所以敢谏，不但是依赖君主的开明，实是政治体制以及权力制衡因素在起作用。

唐代的谏官隶属于门下省，门下省是对中书省的诏书进行覆核和批驳的机构。谏官官阶不高，专向皇帝谏诤过失。宰相和皇帝议事，往往有谏官在身旁，因为谏官“人微言轻”，讲错话也没关系；再加上职责所以，“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时宰相不方便讲给皇帝的话，就由谏官讲出来；所以谏官之所以敢诤谏，敢说皇帝的不是，是因为他背后自宰相。唐代的宰相地位足够高，权力足够大，能够对皇权形成制约。谏官作为官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与宰相领导的百官共同形成对皇权的制约。

但宋朝这一机制被打破了，首先相权被削弱了，财政交给了“三司”，管人事有了“考课院”，政令的决定权由宰相上收到皇帝手中。谏官也不隶于宰相了，而是由皇帝直接拨擢。“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假如反对是出于公心，那也是好事，可谏官往往越拧，声望越高。出于自身的利益，谏官成了官僚机构中的专职绊脚石。再后来，则成了朝中党派互相攻击的排头兵。所以谏官能否发挥作

用，不在于条文怎么规定，关键还得看背后的权力关系、利益格局等诸多因素。如果监察机关背后没有能与被监察对象抗衡的力量（比如宰相之于皇帝），监察只能徒有其表，或者异化为党派攻击的工具。

伦理治国的困境

所以名义上的普世理想，现实中可能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道德治国的理想，在现实中可能完全论为一纸空文。这点在“唐宋变革”之后，尤其是明代，尤为明显。

以德治国在西周的封建社会或汉唐的豪族社会是合适的，那是因为伦理道德的提纲者是贵族或士族。这些人有地位、有传统、有体面，他们不会随便对权势下跪，不会成为皇帝的狗腿子。另一方面，诸侯或豪族为势力范围内的平民提供了一种人格化的管理，所以从帝国层面，对千万平民直接管理的需求就降低了。政府不需要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来处理种种技术问题，它只需要用一套伦理价值系统来让豪族们具有一种普世价值视野和公心来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只图私利。这是古典伦理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但因为豪族割据势力的存在，一旦中枢丧失凝聚力，国家就会解体。

而“唐宋之变”之后，由于技术的进步，社会不可逆地由豪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所谓的平民社会，是指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是独立的社会参与单位，平民不需要再依附于社会豪族。由于宋代之后，社会豪族逐渐被消灭殆尽，皇权要直接负责亿万百姓的治理，需要运转一庞大的官僚系统，于是中国政治的内在矛盾

就出现了。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转依赖于法治的系统，而中国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政治只能是人治；然而良好人治所需的提纲者的风度和教养以及权力的制衡机制，在古代平民社会都不存在。

所以帝国所能做的只有，一方面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官僚系统一心为公；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私心泛滥，在某些关头只能实行一刀切式的规范管理（比如八股文科举）。其结果是，一心为公的人毕竟是少数，徇私舞弊泛滥；过于“规范化”的管理又不免严重脱离实际。这两方面合起来，表面上看就表现出整个官僚系统重形式轻实质。

可以说倘若非以“管制”的思维来运作平民社会的政府，上述问题是无解的。西方社会的解决方式是把社会打散成无数多独立的社会组织，这无数社会独立单元形成互相制衡，形成契约型政府，从而避免了“管制危机”。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决定了这一途径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旦条件允许，社会就会向集权方面倾斜，而最后政府成为一家独大的绝对权力机构管制一切。

中华文明走进了死胡同

都说明朝是中国最黑暗，最腐败的朝代。皇权高度集中，一旦皇帝殆慢，便宦官当政。科举考八股文，戕害人才，束缚思想，也败坏了政治。上层官僚是大而无用的“文书政治”，下层则是黑暗的“胥吏政治”。除此之外，还有另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特务集团。

但这也不能怪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太糟糕，或朱家的后人不争气。朱元璋也曾下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也废止了锦衣卫。所以不能说皇帝不开明，不明事理，但历史的发展却不是先人能

预料的到的。

明朝的问题实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与技术之进不相容的结果，或者说上层建筑不能与其经济基础相匹配的结果。技术的进步（农业效率的提高，造纸术的普及）使社会进入平民社会，然而政治上却没有有效管理平民社会，既能保持其稳定秩序又不使其丧失活力的手段。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上面已经提过，只适用于贵族社会人格化的管理；一旦将之非人格化、制度化地用于官僚系统，伦理政治便会异化地不伦不类，最后既丧失了其普世价值的许诺，又丧失了官僚系统有效地管理。

为了调和这种不适应，让平民社会依然能用伦理政治进行管理，明王朝只能选择一条倒退的办法：让平民社会保持在男耕女织的农业状态，而让官僚系统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农村集团。为方便管理，只能让社会保持散沙的状态，并且推行愚民政策，使人民保持“无知无欲”的状态。这无疑是牺牲质量而保持数量，牺牲社会进步而保障统治稳定。明朝看似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并非当时人才不济，实是中国传统政治进入死胡同，当时的人再也想不出好的办法了。

比如入股文考试，不仅过于僵化，而且也无法考察应考生的政治才能。这在当时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要从平民中选拔人才（平民也能读书是宋朝印刷术普及后才有的便利），考生群体庞大，必然要使用某种规范的考试形式。唐代科举可以比较灵活，是因为知识被士族所垄断，考生少；而且士族之间，谁才华横溢大家心里都有数。但这种形式到明代自然是行不通了，考生规模太大，考试上只标准化甚至僵化。事实上，直到今日，中国之考依然存在类似的弊病，为了在一庞大规模考生中选拔人才，

考试只能标准化。标准化后只能对人才一刀切，有不合理之处也没办法了。要想不扼杀人才，只能把高校招生打散，也就是每个学校自由报考、多元化招生。但如此，国家的“大一统”就难以维持了。

再比如官吏流品的问题，都说明代官场流动性差，小吏永远做不了官；而做官的除非出身翰林，又绝做不了大官。于是上层高官只会高谈阔论，没有治理基层的经验；下层官吏也失去了升迁的指望，只能靠手中权力谋点私利，于是整个官场的风气就败坏了。但这也是平民社会的官吏体制的必然结果，即使朱棣不禁止胥吏考进士，这种官吏流品分化也会自然出现。汉唐之所以官员流动性大，小吏也能做到宰相，是因为汉唐官吏本身就出身世家。世家出身之人从小就接触政治经验，即使是小吏，其见识和政治才学也非平民能比，所以他们能升到宰相也不稀奇。然而从平民中拔擢的官吏则天然会形成流品。在底层官僚混际的小吏，所依赖的都是游走于各种关系的能力。古代社会的治理，使这种实用主义的能力和儒家高高在上的治国理想天然分离。混际官场底层的小吏，锻炼的都是跑动关系的能力，终究无法获得治理全国的政治视野。出身翰林的人虽然有政治理想，却难免脱离实际。于是形成“文书政治”，上面一道道文书下来，全是至善至美的大道理；而下层指行的胥吏，却有着自己的算计。这种现象在今天也依然存在，有能力有理想的官员集中在中央，他们不缺乏能力和政治理想，也不缺乏公心；但指令下到基层，基层官员执行起来却难免走样儿。所以无论顶层设计再怎么尽善尽美，官僚体系末段腐败依旧，而且这种断层会越来越大。也许未来中国再也出不了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出身的领袖了。这都是大一统式

集中管理国家绕不过的弊病。

累死皇帝也治理不好国家

雍正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雍正勤政，人尽皆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劳模皇帝。他在位十三年，批过的奏折有一千多万字。他毫无土木声色之娱，每年只生日休息一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据说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他推行的改革，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秘密立储，全是大手笔的改革。他执政十年来年推行的改革比他父皇康熙六十年推行的还要多。他事无巨细，明察秋毫，地方官吏的私生活都瞒不过他。

雍正在位时间短，可以说他是兢兢业业把自己累死的。但他累死也是活该。雍正能干是真，专制也是真。事必躬亲，不把自己累死才怪。雍正一朝，内外大小事皆操之于皇帝。朱元璋虽废了宰相，大权独揽，但还有内阁；内阁有票拟权，所以内阁处理政事还是有份量的。到雍正创立军机处，则把内阁也架空了，一切政令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发出。由皇帝直接寄信给受令的人，这叫“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皇帝过问地方财政，就直接寄信给地方巡抚，户部不知道；要调动地方军事，就直接寄信给总督，兵部也不知道。如此一来，连六部也被架空了！军机处本是设立用来处理紧急军情，这种制度倒也无可厚非。但军机处常态化，用来处理所有政事，等于是破坏了整个政府机构的运转秩序。政府制度已不复存在，一切皆听命于皇帝了。凡一个国家的治理，越是复杂的治理，越应依赖制度，而不是个人。明朝再黑暗、再腐败，毕竟还是有个官僚机构在制度化运转；而清朝则完全变成

了依皇帝个人好恶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算皇帝再精明能干，再大公无私，也无法处理妥当诺大一个帝国那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雍正虽然勤政，但他所创下的制度，却是大大的倒退。他就算把自己累死，还是治理不好这个国家。等到他的儿子乾隆执政，没有他那么能干，又有一个极坏的制度，国家治理水平便急转直下。

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副实。说那是盛世，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国家统一，江山稳固。可以盛世之下的平民百姓过得是怎样的生活？乾隆时期访问中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劳役，但是毫无成效，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

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如果说明朝的专制只是让中国社会丧失了活力的话，清朝的专制则把中国人全变成了奴隶。清朝的文字狱比历史上任何对知识分子的残害都更阴毒。雍正只因一句“清风不识字”，就将作者诛灭三族。乾隆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对传统文化大加删改，其对文明的毁坏比秦始皇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其目的就是要删掉任何对满清统治构成威胁的思想，把全部中国人都变成奴隶。龚自珍笔下“朝无才相，野无才盗，卷无才偷”，就是说连盗贼和小偷都没了创意。全民被管得如此服贴，心智被侏儒化到这般地步，再稳固的铁桶江山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清末的种种耻辱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文明在清朝的统制下已濒于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的到来，不是迫害了中国，反而是拯救了中国。

王朝周期的两种解释

关于中国的王朝周期论，经典的解释是土地兼并，即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四起。古代帝国治理结构，为了维持一君万民式的治理结构，人民必须被老老实实固定在土地上，世代相传，各守其职。如此才能保证：第一朝廷有广泛而稳定的税基；第二便于低成本地治理。无论是唐初的“租庸调”，还是明初的“鱼鳞册”都是起到这个目的，这也是户籍制度长盛不衰的原因。帝国的统治者无不希望他的臣民老老实实，各居其所，世代不变。只有这样，集权帝国的治理成本才是最低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变化，土地的兼并，使这种治理模式日渐被腐蚀。土地兼

并、流民四起会导致朝廷的税基流失，也使朝廷丧失了对广大民众的直接控制，最终只能以亡国告终。

所以中国的王朝周期其实就是自耕农经济和庄园经济的交替周期。这种由经济基础引发的变革不以人为意志的转移，任何尝试阻止土地兼并的政策都只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徒劳。只有通过朝代瓦解，战乱，土地重新分配，才能将既有社会经济形态打破重新建立普遍均质的自耕农经济，于是下一轮循环开始。究其根本，土地兼并以及庄园经济是相对于古代低生产力水平更为经济的经济形态，也是社会自生秩序运动的方向。而自耕农经济形态是集权力量外加于原始经济形态之上的结果，相当于用集权之力量扭转了社会自然的形态。于是自生秩序和集权秩序之间形成一种对抗。朝代初期，集权力量比较强大，于是得以维持集权政府和自耕农经济的形态。但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向自生秩序方向移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最终导致集权秩序的崩溃。

王朝终结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吏治的败坏。比如明末崇祯一朝竟用抽签的方式选内阁，可见官僚系统的运作已经败坏到何种程度，这种政权不忘才是怪事。官僚体系的腐败就跟自耕农经济的瓦解一样，是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明代之后，乃是以一庞大的文官体系管理成千上万的底层农民。官僚组织是一权力等级社会，古代中国的治理全仰仗着这种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安防到社会不同阶层的做法。中国所有的伦理以及正统思想也都意在维护这一等级秩序。这种政治组织模式下，位高权重之人在社会阶梯中具有绝对的优越感。

这种严格金字塔形的社会组织下，既不能产生均势的相互制衡利益集团，也缺乏任何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力量。政府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对一切社会活动有最终裁决权。集权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排除了现代法治的可能，由社会各种力量互相制衡最终妥协而成的契约型法治，在中国成为不可能。官僚体系的正当性，只能靠士大夫的个人伦理道德信念和济世情怀来保障。

黄仁宇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使其丧失了解决众多社会繁杂问题的灵活性，而以一笼统的道德是非观念加诸于一切实际事务之上。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无法保障，只能顾全大局，在正统观念下保全整个体制的稳定性。伦理社会中的政策条文总是尽善尽美，而其实际执行与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由于官僚体系内在的权力规则秩序和儒家伦理对权力提纲者的道德要求有天然的矛盾性，儒家伦理勾勒的理想社会纵然看似合理，在现实中却只能付之阙如。自中晚唐以后，社会中的豪族力量已不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朝廷要担负起直接治理千千万万平民的重任。治理的任务越重，上述“伦理-官僚体系”的弊病也就暴露的越明显。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明清的吏治，特别是基层的吏治，远比汉唐要腐败黑暗的多。治理的国家越庞大，人口越多，则官僚的层级越多，行政效率越差。基层官吏没有上流人物的济世情怀，治理变成纯粹的盘剥；上层官僚依赖文牍对各具体事务进行远程遥控，又难免纸上谈兵。加之时日一久，上下睽

违，整个官僚系统便陷于瘫痪。这治理结构上的病根，远非一两个铁腕人物（如张居正）或一两项具体政策的改革（如雍正火耗归公，高薪养廉）所能解决。究其本质，其实是依照西周贵族封建、小国寡民为蓝本所建立起来的儒家政治理想，无力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所致。

所以，总的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王朝的盛衰周期以及治理弊病都是由于集权所致。因为集权，中国的历史无法按其自生秩序进化和发展。而集权又有其内在的顽疾，所以只能治乱循环。

欧洲国家则经历了另一种演变路线，由庄园领主到企业家、资本家，再由社会各利益集团共同参与建立契约型政治。中国由于其集权传统，完全否定了这种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而集权治理在应对庞大的帝国治理上又有着诸多先天不足，即便在政治清明之时，也只能保障人民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上实现稳定统治。待其时日一久，吏政腐化，便只能坐以待毙。而出于集权统治的需要，压抑人民思想，阻止社会进步都不可避免。因此中国的古代史在两千多年后走向停滞和全面落后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两千多年前，集权是一种先进的体制，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早熟，导致了其近代的踟躅。

也许用今人的眼光批评古代中国的集权体制是不恰当的，毕竟中国的地理、经济、文化条件都决定了集权体制的必然性。但历史的规律不可不鉴，如今人仍以为半部论语可治天下，或父慈子孝便可天下太平，那么就太悲哀了。

官僚体系腐败定律

如果我要对中国古代政治做一番总结的话，我毫不留情地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是完全的失败，特别是明清时代。儒家仁义道德、忠君爱民的社会理想只停留在宣传层面，而从未成为现实。但历史是由统治者书写的，再加上中国有道德灌输的传统，我们看到的都是岳飞、文天祥，是包拯、海瑞。底层受苦受难的民众大多不识字，更不会写书，他们的声音被历史的尘埃埋没。所以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对中国古代社会抱有太平盛世天真的幻想，但是却不容易看不到道德宣传背后的虚伪和齷齪。

清朝的康熙皇帝算是“千古一帝”了，但康熙治下的基层生活是怎样的呢？清朝文学家方苞不幸蹲过监狱，于是留下一本《狱中杂记》，让我们有幸目睹康熙五十一年清朝监狱的状况（引自吴思《潜规则》，下同）：

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

这便是“康乾盛世”下的基层官吏！至于说盘剥百姓的手段，更是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康熙十七年，“禁止浮收”（所谓“浮收”就是向百姓征粮时额外多收）的规定就罗列了近百种手段，我摘抄一段：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廩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

康熙皇帝果然是个比较英明的皇帝，居然能把这些陋习都写下来加以禁止，至于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仅仅看这些繁多的花样，就已让人打开眼界。倘若皇帝怠惰又当如何？百姓不知水深火热到何种程度了。那些抱怨如今政府乱收费的人恐怕不知，共产党政府的乱收费和古代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

俗语有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但对于中国古代政治而言，我们发现，即便上梁正，下梁也未必正。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最高领导人身上。倘若是治理一个百千来人的群体，也许依靠领导人的道德表率作用就足够。但治理一个亿万人的群体，再能干的皇帝，也必有诸多力所不能及之处。好皇帝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也不等于好社会。对于明清的社会而言，我们看到无论上层统治者如何申明仁义道德，真正支配底层官僚系统运作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算计和盘剥。

明朝有《大明律法》，清朝有《大清律法》，但谁要是认为明清朝官员都依法执政，那未免就太幼稚了。不妨参考一下被毛主席誉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第四回容我摘抄一段：

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却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雨村听了，大怒道：“那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只见案旁站着一个门子，使眼色不叫他发签……雨村道：“方才何故不令发签？”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赴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这才是官府运行的真实逻辑。别看那些官员一口一个“百姓”，一口一个“天下”，其实老百姓的命在古代是根本不值钱的，特别是当老百姓站在权贵势力的另一端的时候。道德只能拿来当幌子，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权力和金钱。这很像当今的美国，他要打你的时候总是打着道义的旗帜，不是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捍卫人权。至于这些理由，当然有的时候是真的，但更多时候不过是道德的幌子罢了。

如今习主席号召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这让我想到了崇祯皇帝刚刚执政时，意气风发的青年崇祯一心想实现大明王朝的“伟大复兴”，于是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号召广大干部发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优良传统。不过这件事当然没这么容易。当时户部给事中韩一良给皇上上疏：

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崇祯看后大喜：“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不过当崇祯追问韩一良究竟谁人行贿时，韩一良却如何不肯点出人名来。惹得崇祯老大不快，撤了他的官职。

韩一良宁可被撤官职，还冒着惹恼皇上的杀头风险，也不肯揭发行贿之人，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这力量就是帝国官僚体系牢不可破的利益链条。诚如他的上疏所言，贪污腐败是各级官僚的共同利益所在；他若告发，几乎就是与整个官僚系统为敌，这恐怕比皇上的愤怒还要可怕。

细细想来，官吏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乃是人之本性，好比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道德的教化要求他们忠君爱民、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克己复礼”，犹如逆水行舟。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是官僚系统得以运行的顺理成章的规则。腐败不是对规则的破坏，

而廉政才是不守规矩的意外。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中兴之臣张居正，亦或是写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名句的林则徐，也同样都是“贪官”。没有人能否定张居正或林则徐的历史功绩，但在古代的官场生态中，不管你如何有理想、有抱负，首先要在官场中生存下去；想生存下去就要遵守官场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不能破坏了官僚系统的利益链条。

清官的结局会怎样？海瑞就是个例子。海瑞虽然官至二品，但除了清廉的名声外，这位青天大老爷没做成任何有用的事。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朝廷用来当道德的旗帜，但对于那个庞大的腐败官僚体系，他无法撼动一丝一毫。不过海瑞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皇帝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否则等于拆了“以德治国”的招牌。但是更多名气没海瑞那么响亮的清官，恐怕早就被官场淘汰出局了。

“向钱看”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根植于人类趋利的本性之中，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只不过资本主义把追逐利益摆在明面上，不以为耻；而古代社会非要打着道德的旗帜，这些逐利行为只能在暗地里流通，成为不上台面，但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中国的古代政治就这样在“以德治国”的幌子下运行了几千年。

我个人认为，官僚腐败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框架下是无解的。任你怎么整肃，怎么监督，腐败总能找到生存空间，而且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结成无可撼动的利益链条，直到王朝终结。

明太祖朱元璋感叹：“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

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但结果怎么样呢？留下了一个整部中国历史中最腐败的王朝。朱元璋不会明白，自己亲手制造一个恶性循环：打击贪腐需要更大的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带来更大的腐败，更大的腐败又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打击。

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毛主席早已给出了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主席对民主不乏精彩的论述（见毛泽东 1944 年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的讲话）：

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

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然而真正的民主国家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立的。毛最终统一中国，也没能实现“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的新中国。

“新中国”其实不新

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新。“新中国”不过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中国之所以接受共产党，也不是因为什么“社会主义最适合中国”，而是因为共产党的某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规律。

历史上能成功统治中国的政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必须能从广大农户直接抽税，如此一来才能形成强大的财政能力足以镇压任何反对它的力量；二、必须能实现对最广大人民的动员和直接控制，由此一个一君万民的政权才能建立和维持。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得以深入农村基层，获得从农户直接抽税的财政支持，以及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动员。这等力量，远非靠关税和贷款支持财政、靠盘踞大城市实现统治的国民党可比。有

了这等基本盘，共产党胜过国民党已无悬念。

毛泽东的确比蒋介石更懂中国，更懂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政权力量的源泉须来自农村，而非城市。这是共产党能成功问鼎中国的根本原因。其余的理由，诸如“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不过是把成败道德化的政治包装。

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也不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官僚体系”的延续。儒家正统被替换成了马列主义，对皇帝的忠诚被替换成了对党的拥护，宣传天子的恩德变成了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其统治的手法也与传统的伦理-官僚社会别无二致：一是靠自上而下的灌输教育；二是靠一庞大的官僚体系对亿万自耕农进行管制。虽然在管制的技术上有所进步（比如由于先进记账法的引入，不至于像古代帝国一样财政账本上的数目都对不上），但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而非法治。

所以说新中国的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没有起到推动新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作用。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共产党之过错。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如此，当然不是靠一两部宪法就能扭转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瓶”装中国集权专制的“旧酒”而已。况且，彼时的中国也没有支撑现代政治的经济基础。

一个国家真正的制度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支撑起来的。真正的民主绝非选票；真正的法治也绝非一部宪法。当时的中国，虽然在近代经历了些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仍未脱离一个二元社会的格局——即顶层是一个官僚集团，底层是亿万平铺的自耕农。

社会的中间阶层力量是阙如的。对这样的社会进行统治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现代的民主政权，而只能是类似明朝或清朝的专制政权。即便表面上采取民主议会制，这种制度也只能流于表面形式。

为了让这样的国家快速进行工业化改造，亦必须依靠强大政府领导的计划经济的力量。自由市场下经济虽然也能发展，但只能局限于上海等少数沿海地区，而无法覆盖整个中国内陆。这些都决定了专制的政体加上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任何一个能够统治当时中国的政权的必然选择。

顺便说一下，“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这种说法除了用作意识形态宣传之外，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国民党从未想在中国发展类似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国民党的经济方针和共产党一样是计划经济式的，只不过国民党不使用“共产主义”等词汇罢了。孙中山自己说：“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经济上，孙中山历来主张土地国有、发展国营经济：“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的国家主义思想不难理解。中国自古就有政府统管一切的传统，加之当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抛弃自由资本主义几乎是当时世界的普遍风气。蒋介石也继承了孙中山的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

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训政时期施政宣言》）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专制国营路线的倡导者。事实上，集权专制、统筹发展、国营经济，从洋务运动以来，一直被中国的统治者一以贯之。这是由中国的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的。

这一集权专制的路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似乎是清朝统治的延续和强化。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把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玩得炉火纯青。毛的统治手段也与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别无二致。古代开国帝王通常都会做三件事：一、大肆屠杀开国功臣；二、大肆屠戮士族（知识分子）；三、大兴土木。这三件事，毛也全部身体力行了。只不过他不在菜市口杀人，而是通过发动一波又一波运动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不能责怪文革的错误。若把新中国当作一个传统的王朝来看待，把毛当作一个传统的帝王来看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情理之中，也符合历史的规律。但对全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也是事实。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

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新时代”下的中国

习近平的政府很多时候是令人十分费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言犹在耳，而 2017 年的“国进民退”却令人不寒而栗。连马云都出来说：“我个人这么觉得，政府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应该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见马云于上海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演讲）

习主席作为一个熟稔的政治老手，非常懂得用文人学者创造的概念来包装自己。早在福建工作时，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就大谈特谈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当上国家主席后，他也频繁引用当下学界呼声较高的法治、宪政等词汇。但他自己究竟理解多少，却十分令人怀疑。为了展示自己的“博学”，习主席甚至不惜以“报菜名”的方式罗列自己的书单。

（访问俄罗斯）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

（访问法国时）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

从未见过哪个领导人讲话时连珠炮似的罗列如此多的作家人名，不知是否让外国友人大开眼界。习近平表示当年去梁家河时“带一箱子书下乡”，而且读这箱子里的书是“在梁家河村劳动之余最大的爱好”。毛主席如果泉下有知，当今中国的总书记在文革时期偷偷在乡下读了这么多反动名著，不知当作何感想？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头发油光可鉴的习近平在慷慨激昂地发表他才华横溢的演讲。不知在座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友人，能否通过翻译感受到中国古诗文的魅力。然而在如此高规格的盛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还是把《国语》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误读成了“通商宽衣”，贻笑大方。但凡识得“通商宽”三个字含义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衣服的“衣”联系在一起吧？当然，演讲结束后几分钟之内，所有的网络视频都删除了这个误读的片段。

或许不可否认，习是一个有理想的领导人。他一上台就把“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与太平洋彼岸特朗普总统“复兴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遥相呼应。他显然意识到中国有许多问题需要改变，但他自身学识和能力的欠缺，却使他的政策不但不于事无补，反而倒行逆施。

他意识到中国官僚系统的腐败，但他不会明白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力政府才是中国政治败坏的根源。他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把中纪委变成自己的锦衣卫，到处“打虎拍蝇”。他把官员的堕落归因为“忘记初心”，于是提倡“不忘初心”，就像古代士大夫动不动就搬出“先王之治”。他要求从严治党，形成上行下效、三呼万岁的党组织。但这些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绝对权力”；他的反腐也必定是治标不治本。

他意识到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强调依法治国。然而他又强调“党领导一切”，强调“中国特色法治是党领导下的法治”。他显然不明白，法治恰恰意味着分权而不是集权，意味着契约而非管制。估计他理解的法治乃是像商鞅一样的“法制”；亦或他有意“挂羊头、卖狗肉”？

他意识到中国文化势衰，他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辉煌中国》《厉害了，我的国》《超级工程》《大国重器》《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轮番轰炸，以提升“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同时让所有的负面言论统统禁绝。他当然不明白，中国文化之所以衰弱，原因就在于长期以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人民的自由表达，从而使文化发展丧失了自然发展的可能性。

习近平治下的言论管制力度空前增强。曾经随着自媒体发展起来的公知阶层全军覆灭。他的政府豢养着史上最庞大的维稳警力，时刻把枪口对着自己的人民。科技的进步也被转化为钳制人民的工具，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让这个政府得以监视臣民的一举一动，精确定位，快速打击——一个奥威尔式的政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了现实！“水能覆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这一切仿佛明清时代为了维稳弄得“万马齐喑”的再现。然而，无论

中国还是外国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民无法自由思想的社会是难以创新和进步的。他的政策对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教水平毫无帮助，只能靠行政力量推动拙劣仿制的大飞机和航母制造，终究是走不远的。

他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圣人出，黄河清”的水平，以为铁腕的领导人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能扭转地球运动的方向，所有的臣民只要乖乖地跟着领袖走就行了。他和古代所有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想获得无限的权力，并想保持足够长的世间，以推进他的政策不至于半途而废。

我承认，他推行的一些政策，诸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都是大手笔的建设，须得长期坚持。我也承认，他有理想、想作为。他的改革充满革命家式的理想色彩，他任用的官员个个务实能干。但中国政治的悖论就在于，越是有为的君王，就需要越大的权力才能伸张他的意志；然而皇权越是扩张，就给后世留下越黑暗的政治。从秦皇汉武到毛泽东都在证明这一规律。

晚清重臣李鸿章说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梦幻，但这只是一场精神危机。随后一系列变革图强的努力，也不过是帝国精英阶层的反思和尝试。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面貌。真正的社会形态变革、阶级更迭的“千年未有之变”，却是发生在当下。改革开放挑战了中国千年以来的治理思路，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也改变了传统中国“二元阶级”的社会结构。前文中说新中国无法建立起法治民主的国家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之匹配。但是在当下，这个基础正在日渐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在毛泽东

时代未取得的治理突破——从伦理-官僚治理向现代法权政治的转型——在当下却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在这个转折点上，习近平非但没有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反而以传统的统治思维硬生生地扭转了这一过程。他用过去王朝“大一统”的思维来治理现代的中国，不啻为一种倒退——这就是我反对习近平的原因。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规律作为参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习近平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他的改革充其量是张居正式的，在短期内有整肃朝野之功效，但对于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长期弊病无益。他的学识和视野也不足以支撑他做出更为根本性的改革。他所谓的“四梁八柱”的改革，不过拆分合并一下政府机构，重新划分一下军区之类的。表面上看文章做的很大，其实治理之根本思维——人治还是法治，统治还是自治，集权还是分权——完全没有变化，甚至还有退步。

如果可以假设中国的王朝衰败规律在当下依然适用，那么对于中国未来之走向，我们不难勾勒出大致如下的框架：其一，习近平的反腐和改革不会解决中国官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他之后，中国的政治可能会愈加腐化。但中国可能不会重复历史上王朝倾覆的结局。历史上的中国，由于朝廷几乎就等于中国，朝廷的堕落就是国家的堕落，朝廷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但如今之中国，政府之外还有庞大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形成，即便政权更迭，这一事实也不会改变。即使共产党政权再腐败，社会上众多经济组织依其自生秩序也仍然会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自发地呼唤法权秩序的形成，这会与中国官僚政府的管制方式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可能要通过一

段坎坷的革命来完成。

其二，当今中国与历史上王朝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上皇权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引导者，所以政权的进化会越来越向集权的方向倾斜，直至社会活力全部丧失。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秩序只有部分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更大程度上是市场自由发展所形成的自生秩序。这种发展模式，不会越发向集权秩序靠拢，而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即越来越自由、分权、民主。但中国由于其半海洋、半大陆的帝国属性，很可能也不会形成像英美那样“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参见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最终可能是某种类型的“中型政府”，即政府保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多种力量来抗衡和监督政府的行为，使政府不再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力存在。

金钱与资本主义

中国人提到“金钱”总觉得多少有点不道德的意味。“唯利是图”乃是小人的标志，“仗义疏财”才是君子。金钱被视为品德堕落的根源，至今仍有人把社会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归因于“向钱看”的不良影响。于是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发展“腐蚀”了人的品德，只有退回到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才能回到理想社会。

此种想法无非是“厚古薄今”、“今不如昔”之愚见。事实上，我认为“金钱”乃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其伟大之处，超过任何伟大政治家的改革，也超过任何伟大科学家、艺术家的发明创造。正是“金钱”这种发明，使人类摆脱了互相屠戮的丛林法则，使人类在自私和利他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也使人类得以摆脱剥削和压迫，第一次自由平等地生存。金钱的发明和运用，非但不是道德堕落的根源，反而使人类前所未有地接近理想中的道德；非但不是阶级剥削的根源，反而使人类社会前所未

有地接近大同理想。

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以商业运作之法则加诸于全社会之上，取代权力而以货币管理一切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种社会里，人的所有需要与诉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可以用货币的形式价值化，并进行广泛的分工与交换。人不必依附于集体才能发掘自身的意义，人的价值观、是非观也不再被某一特定的宗教或传统所框定。于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工、以及多元的价值观——成为可能。社会也不再需要维持一种权力结构，不再依靠某个领导人的主观判断来进行管理。亦无须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而是靠货币的自由流动，以及辅助这些交易的规则、明确权责的律法来维持社会运行。从而利益的计算取代了道德的判断，平等、包容和契约精神取代了整齐划一的信仰和习俗，自由和法治取代了忠诚和专制。

资本主义之发展，意味着用货币管理社会事务之一切。价值交换不仅发生在物质商品领域，一切人们有需求、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贴上价格标签，以货币来计量和交换。人们不再过问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只要双方自愿，遵守约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于是资本开始主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资本拥有者不仅可以享受更优厚的物质生活；资本的优势随着越发广泛的货币化被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这当然有其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剥削和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特定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人意愿的尊重，对不同人种、不同肤色的包容，对契约精神的崇尚。这些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者说商业价值观，如加之于政治领域，就形成了所谓的“契约型政府”——强调政府必须由人民授权，强调权力制衡，防止权力垄

断。

于是政府亦成为社会分工中的一部分，政府不再高高在上，从而摆脱了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权力的分工与制衡，确保政府行使其服务职能，而非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暴力统治机器。人类由过于宗教或信仰驱使的集体动物，蜕变成理性驱使的个体；社会从权力和道德习俗统辖一切事务，进化为权责分工和数目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道德习俗的论辩转变为法律技术问题；从此人类社会管理模式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化的转变。

历史上，欧洲最早完成这种转变。十三到十四世纪，意大利南部的一些隶农开始脱离封建庄园而进入城市，成为自由的市民。从此，“自由”一词登上了历史舞台：自由的城市，自由的市民，自由的贸易。在城市里，自由的商业秩序取代了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业秩序，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大公司，商法即民法。从威尼斯开始，继而荷兰民国，再到后来的英国，先后进入这种商业秩序取代农业秩序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从社会的组织结构到社会习俗，都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其一，在经济上，货币的自由流通、自由贸易的展开，大大加速了社会的分工与合作，社会组成日趋多元化。权威体制不再统筹一切，即使是教堂也由信徒自发出资修建，艺术家们要互相竞争以赢得赞助者。商品和物质日益丰富，社会阶层日渐复杂化，工商业阶层崛起，从而摆脱了“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二元社会形态。

其二，政治上的变革随之而来。权威体制解体，人民大众不再受政府官僚方方面面的管制，经济取代政治成为社会的主导。政府从家长制管理型政府转变为契约型服务政府，从社会价值的引

导者转变为产权和规则的维护者，领袖的终极仲裁作用被法治取代。

其三，社会的习俗和价值观也随之改变。社会不再需要统一的信仰和价值观以维系其稳定存续，平等、自由、民主、尊重、包容成为新的价值观和主旋律。

由此可见，将社会之进化概括为一句“从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是多么敷衍草率；将社会之变革简化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更迭是多么有误导性；以及妄图通过摆弄社会阶级就使国家迈入共产主义是多么幼稚。

对比中国的社会结构，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农业社会的结构却异常简单，不过是上层的文官组织管理下层数以亿计的农民，堪称“农村大集团”。这样的二元阶级社会，缺少如欧洲国家文艺复兴以来那样丰盈的社会结构。稳定统治需要其下层均一一一致，也不允许多元化发展。儒家的伦理道德更没有任何公民社会的味道。所以无论是洋务派的百日维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都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我们如何改造上层的官僚组织，作为社会主体结构的“农民集团”都无法立刻改变；社会分工不会因为这种“顶层设计”而突然间丰富；底层社会之生产方式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变革”而快速转变。这些转变都需要时间，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不是一蹴而就。然而社会结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不管如何组织顶层架构，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民主，都不过是种形式或伪装。因此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必定曲折而坎坷。这既不是因为慈禧太后的昏庸无能，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主义”，而是长期的帝国集权统治所形成的社

会结构形态所决定的。日本能通过明治维新完成社会的变革，也并非因为明治天皇的英明，或幕府和天皇的分立已铺垫了君主立宪的政体。从社会阶层结构上来看，日本其实已经具备了和欧洲国家相似的便利，“他们私人资本的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了大名藩主的力量”（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这种以货币管理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不会因“唯利是图”而道德败坏，反而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更加文明，更加接近人类心目中理想的道德标准。中国的古代帝国以一个全国统一的官僚组织管理方圆广大土地上的亿万农民，因为缺乏有效精细的管理技术，只能诉诸道德习俗作为形式化的管理，依靠人的自我克制和互相谦让的美德来润滑实际的利益冲突。在这种制度下，人必定“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就是中国人虚伪的根源。而维系这样一个系统，必须仰仗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和等级制度。皇帝作为终极的权威，实际上是以皇帝的个人好恶来作为全社会的仲裁。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破坏，更别提实现社会大同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以资本多少而定。而在古代的权力社会中，一切皆以权力大小而定。在权力社会中，根本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王子犯法，永远不可能与庶民同罪。宰相的儿子杀人，县官如何敢判？权贵可以逍遥法外，平民只能苟且偷生。正因为公正如此稀缺，所以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才会名传千古；所以主持正义的青天大老爷几乎成了千年的“中国梦”；所以明哲保身成了普通人的生存哲学。权力社会必然是一个人压人、人吃人的等级社会，人只有往上爬，才能有尊严，才能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爬上去的人，又通过压迫他下面的人，来享受锦衣玉食的

生活。以权力规则组织的政府，永远不可能是服务型政府，它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和统制的暴力工具。这样的社会无法发扬任何高尚的价值观。所谓的“忠孝”不过是强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服从，除此之外，只有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和虚情假意。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冲突能以货币和法律的技术手段解决；权威的解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成为可能；相互竞争的社会团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无疑能更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正。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体制的公正才能引导个体的善行，而腐败堕落的体制只能纵容“坏人当道，好人挨刀”。所有商品和服务都被价值化并参与市场交换的制度，能最大化地利用人性的自私以促进公共事业。因此在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会少很多伪善而有更多真诚。人与人之间不必克制谦让以成全表面上的和谐，而能在法治的框架下更坦诚地合作。公民能避免暴政的迫害，不必人人自危、明哲保身，而能在人身被保障的前提下自由地参与公众事务。政府更像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非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资本主义都使我们更接近理想中的道德标准。问题只是，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使一些人少了共同价值观和习俗的舒适感。但这些人没有看到，过去的社会在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下掩盖的种种伪善和龌龊。

所谓的“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调配，不过是以政府权力取代货币作为调配资源之机制。实际上，是倒退回权力社会。名义上的“公有制”，实际上不可避免会变成权贵经济。除了倒退回权力社会，我看不到这种制度相比于资本主义有任何进步之处。

任何权威主义统治，都是让所有人变成执行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意志的工具；把所有人的价值观和事业都统一在一起，来实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价值观和事业。于是社会的多元性丧失，社会有机体僵化，个人的自觉和意志丧失，能动性亏空。个人成为依附于集体的傀儡，只有从集体中才能汲取自己的生存意义。社会单一化的后果，就是整个国家的有机体坍缩成一种类似于个人爱恨情仇的东西（比如认为全中国人都应该抵制日货）。个体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依附于统治者的价值判断（皇帝的脸面就是整个中国的脸面），从而形成可怕的羊群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分工的形成，社会形态的丰盈，社会阶层的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必然随之多元化。这个时候，还想用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来指导整个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徒劳无功。权威主义是对个人价值观的侵犯。在多元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交织的体系里，所谓普适性的“正确”和“错误”是不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再适用于整体，整体也不再表现得像单个个体。这都决定了权威主义、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之必然。

当前之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变革之中。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尝试，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他们的“顶层设计”都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之结构，而这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工商业取代农业已成定局，自由市场空前壮大，社会分工和阶层关系日渐丰盈。道德是非的管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货币计量的数目管理。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单一的价值信仰不复存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这个过程难免使一些人感到不安，认为中国传统之文化遭到

了侵蚀，毕竟中国的传统儒家理念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有着天壤之别。但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发生过。如果看到这历史的大规律，就不难发现，中国之告别传统价值观和治理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洪流，社会的进步，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如果看到这历史的大趋势所在，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人在开倒车了。

第四编 人生

致父亲信：我的精神危机

之所以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我最近的状态以及想法。为什么在留学的事情上一再踌躇，为什么不愿意和别人沟通。你问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牵涉到很多细节，以及我的成长经历，这些东西跟本不可能在电话中三言两语讲得清楚。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因为文字在表达复杂思想上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会尽量把我的想法讲清楚，虽然仍不一定能讲得清楚。

你想必认为，我的问题不过是失去了人生目标，不过是青年时期正常的彷徨，或者到了年纪而没有女朋友而造成的寂寞。这些因素都不无道理，但完全不是问题的核心。

老实说，我现在状态非常不好，我已经陷入了精神危机。我之前一直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确定有“精神危机”，直到我自己也陷进了这种状态。我每日情绪低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两个月前，我妈来深圳的时候，这种状态就已经开始了。我每日没有心思工作，像饥渴难耐之人盼水一样盼忘有个假期，让我可以抛下无聊的工作，静静地反思一下。但当假期真的到来之时，我却变得更加焦虑。

我感到命运就像一个庞大的压路机一样，隆隆作响，所过之处瓦石俱碎。这压路机就跟在我身后，以时间一样均匀而冷峻的步伐前进，一刻也不停息。我被这不可抗拒的机逼着向前走，尽管气喘吁吁，连滚带爬，也不能停下来，否则就会被碾过去。我想停下来喘口气，不行；想回头和那机器抗争，也不行。

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就是这样被推着走过来的。我被送进学校，学习、考试、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我全然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我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莫名地做着这些事，而且不能落下；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不能落下。但人生毕竟是自己的，当这些外来施以的“人生目标”逐渐褪色，当我必须重掌自己的人生，当我必须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时，我猛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空虚，自己又是如此软弱，以至于根本无法独自撑起生命的重量。所以我整个人迅速地崩塌了，我的知识、学历、高薪的工作，所有“优秀”的光鲜，都一并崩塌了，像被爆破拆除的大楼，随着一声巨响，瞬间塌倒在一片白烟之中。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从未严肃地反思自己（虽然也偶尔反思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什么才是对自己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的少年时光充斥着习题、分数、名次、老师和家长的期望，而如今，当我认真地思考这一切——当然，如果你从未这样反思过，你就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可是只要你认真地反思，你就会发现——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地剥

去那些外在的东西，结果却发现中心是空的。我的人生是彻底的空虚，彻底的失败。

枉活十余载——我这么说毫不夸张，因为我并不知道我是谁，我只是一堆外在的约束——父母的期望、时间的潮流、社会的流俗——所塑造的结果。时至今日，当我思考为什么要留学，为什么要学计算机或者金融时，我完全无法回答，我内心里真的想回学校上课吗？我真的喜欢这门科学吗？这些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留学？因为大家都在学计算机或金融？因为这是大家眼中看起来“正确”的选择？

每当我想停下来，却总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能停下来，你已经快三十岁，应该选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了，否则将一事无成，于是我被他催促着采取行动。而当我开始行动，又有另一个声音跳出来对我说：不，那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只是被逼着这么做，于是我又退了回来。然而这时第一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就这样我被这个两个人扯来扯去，身体都快被撕裂了。就这样，我闹出了一个又一个“笑话”：申请了留学又放弃了，想学金融又退缩了。这些“决定”看似我的决定，其实无一是我的“决定”，只是迟迟未决而演的拉锯戏。

究其根本原因，这些都是因为我内心的空虚，我不晓得我究竟要什么，也不晓得世界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追求它。

我对周围的世界充满怀疑，从怀疑自己到怀疑全人类，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善良？为什么要有礼上往来？为什么要恋爱结婚？我们每天忙来忙去究竟解决了自身的什么问题？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莫名其妙，既然这一切都不明所以，为什么我要遵照这一切生活？每每想到这些，我的精神就像断了脊柱的人一样，再也站不起来了。

上次你读了我的日记后，说我里面写的全是不甘平庸的想法，你说我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然而又找不到一条从现实到理想的路，因而备感困惑。这我同意，而且这种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但不完全正确。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甘平庸吗？并不是因为我要成为多伟大的人，而是因为平庸意味着缺少生命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我在上海租房子时，有次出门，碰到邻居，就顺便聊了几句。她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来帮儿子、儿媳照看孩子，体态微胖，精神抖擞。

“刚毕业？”她问我。

“嗯”。

“准备什么时候买房？”

“还没想呢，不一定留在上海”。

“不想留上海？”她像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事一般加重语气反问道。也许在她看来，毕业后不留在大城市似乎是多么不可理解的一件事。

我不想细说，赶忙岔开话题：

“你们在这儿买的房？”

“没有，这儿是租的”。她顿时压低声音，眯起眼睛，凑近一些，像要泄漏给我国家机密一样，在我耳边说：“我们在崇明那边买了房……”

“那不错啊……”我赶紧应和道。

我注意到她那神态、那语气，就仿佛崇明那个房子是她心中的哈利路亚，所以我赶紧赞美了一番。但我心里明白，对她而言，人活着就为了活一套房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过年的时候，二姨夫妇来我们家拜访，我在客厅陪她喝茶聊天。

“你将来想干啥？”他问。

“不知道”。

“你看！”他立马像押的彩票中大奖了一般叫道，同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像马戏团的小丑一般高高地扬起骄傲的头，因为他要庆祝一下他终于如期抓住我的弱点。

“你准备在哪个城市定居？”

“不知道”。

“你看！”这下他更得意了，那表情就像世界杯上德国对巴西攻入第七个球时德国队教练脸上的表情。

“我也在找……”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然而又不能不说，只好随便应付一下。在他眼睛所有人的人生都应该像他一样，一辈子固定一个城市，固定一份工作，然后专心琢磨怎么挣钱。在他看来，一切都应该为创造生产力服务（在他的字典里，生产力就是钱，这不得不让我想到巴尔扎克小说《欧叶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头），其余一切都是无用的，我多解释也无济于是。我之所以很肯定地说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当他提起他赚了几百万的侄子时，顿时脸上浮现出的那种陶醉的神情，就和朗朗在演奏舒曼的钢琴曲时脸上那作秀般的陶醉神情一模一样。

这两个例子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缺乏想象力、缺乏深度和广度的人生。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了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目的而生活，他们不知道终南山上的隐居者为何仍过着千年前的生活，他们也一定无法理解为何欧洲人都不喜欢买房，为何布达拉宫的朝拜者视黄金如粪土；他们更无法理解克里希那穆提在倡导些什么，或者凯文凯利为何要远足世界。

那些缺乏人生想象力的人，他们的人生封闭在极小的圈子里，然而他们却以为自己悟出的那点可怜巴巴的道理是整个银河系的真理。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也不觉得存在什么真理。人们自己为是的真理，其实是源于人们的无知和偏见。就好比如果你认为万有引力是真理，是因为你只学过初等物理；你如果认为地板是方的，是因为你不知道黎曼几何；你如果认为是非自明，是因为你没研究过伦理学。

爱因斯坦说：人已知的圈子越大，外面未知的也就越大。

越是博学之人越会感到自己无知，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掌握了全人类真理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很无知。我承认我不知道人生目标是什么，但我拒绝接受诸如“你应该找个人生目标”这个批评。因为能提这种建议的人完全不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确定目标就像做选择题一样，从他们脑子里的几何可能选项中选择一个。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备选答案之外，还有无数种可能选项。况且人生并非做选择题。

人生的问题就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你知道的越多，就会越无知；思考的越多，就会发现答案并非那么简单。人生固然要有目标，人凡是做事，无论大小，都会有个目标。但人生绝不仅仅是

完成目标这么简单，问题在于，这些目标和你的个体生命有怎样的关系，你如何获得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目标就好比高速公路上的路标，没有路标无法开车，但开车的目的并非为了通过路标。

我想我已经大致说明了为什么我讨厌“平庸”的人生，也略略提及了我所谓的“有深度和广度”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关于后者，是个庞大的问题，这里恐怕无法详细说明。

我之所以说你的判断不完全正确，是因为在你看来，拒绝平庸，即意味着追求成功；与平庸之人相对的，便是成功之人，比如像习近平一样的人生，或是像马云一样的人。但这并不是我的想法。

我每天观察周围的忙忙碌碌，禁不住思考他们如此奔波究竟是在追求什么？我看到有人勤奋地备考 CFA（注册金融分析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考取了 CFA，于是可以骄傲地在胸前挂上注册金融分析师的大奖章，于是他会被社会上大多数认可为合格的金融分析师。其实所有的学历也好，证书也好，荣誉也好，不过是社会给人贴的标签。很多人在社会上打拼，不过是为了被人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在不断贴标签的过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感。这些认同感不断强化自我，于是他在这种不断强化自我的过程中体会到人生价值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被贴标签的原因，因为他们能在这堆标签中找到某种人生的意义。

我还看到有人整天极有眼神儿和分寸地在领导身边跑来跑去，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得领导的赏识，可以加大升职的机会，可以提高在公司的地位；说不定运气好，可以成为总经理的接班人，可以接受下属的恭维，

可以出差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酒店；如果运气再好一点，说不定被电视台采访，被各学校、单位邀请去演讲，介绍成功职业生涯的经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成功，即被社会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会极大地满足人的虚荣心和自我膨胀的欲望。

人们追求这种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种虚荣心的满足中感受到生命的快慰，进而感到生命的意义，因此他们愿意付出辛苦和悲痛以获致这种快慰。

人们的追求多种多样，花样繁多。但你如果仔细观察和总结，会发现其实拱共就那么几样东西：社会的认同、自我的强化、欲望的满足。

然而我们的生命就仅仅是这样的吗？假如我们沉迷于追求认同和满足的圈圈，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封闭和肤浅？假如我们受着这样那样的限制，我们是否还能体味到完整的生命？

执着于追求认同和欲望的人，让我想到不断希求主人去爱抚的宠物狗。假如一条宠物狗不断摆出各种姿势以博取主人去拍拍他的头，假如这条狗执著于这种主人的认同以及被拍头的满足感，这条狗会幸福吗？我不是狗，所以我不晓得狗的感受。但我认为，狗的快乐在于他可以不顾及昨天和明天，不像人一样背负各种包袱。

因此他可以安心享受当下的时光，享受午后的暖阳和风儿的妩媚。

为了稍稍总结以上的讨论，我想引一段克里希那穆的话：

意识有许多不同层次，首先，最外层是表面意识，在表面意识之下存有记忆，因为若没有记忆的话，就沒有任何行

动；在这之下存在着实现、成为、完成的各种欲望；如果你再深入探索，将发现一种全然否定，不确定及空虚的状态。

克氏的这段话很精练，却完整地表达了一个人不断探索挖掘内心所经历的各种阶段。我从未信学过任何宗教，以上体验完全源于我自己的感受。我也相信，任何一个人如果仔细观察世界，深入挖掘内心，都会到达那么一种空虚的状态。人们普遍追求的东西，成功也好，名誉也好，不过是一种固步自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受限的心灵应对世界的方式，寻找自身意义的方式。我无意否定这种方式，但它远远未触及生命的本质，也无助于我体验一个完整充实的人生。

我之前跟你说，我没有追求任何东西的动力，想必你现在应该多少明白一些我的想法了吧。这并不是有没有目标那么简单，我只是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必要去贴那堆标签？这对我的生命又有何益处？

所谓“看破红尘”，我如今还没到那境界，我也不晓得是否有一天真能到那境界。但我从不认为那是一种消极，你若真能看破，我倒觉得那是一种透彻澄明的智慧。

人们普遍对看破红尘有种误解，以为那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天天傻傻等死的状态。其实并非如此，读到这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一定想说，这都是年轻人还没定性，脑子里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生活安定下来，一切都会变得实在。

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然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会变得“实际”，那么你恐怕完全没理解我之前说的东西。我承认我的想法不切

“实际”，然而我从来就没实际过，而且也不认为未来会变得实际。

我们所说的“实际”是什么？所谓“稳定”的生活又是什么？

从毕业那天起我的不切实际就表露无疑：别人在乎的职位、薪水、前景，全部不是我在意的东西（不是说完全不在意，但我从来没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人们追求的那些“实际”的东西，然而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我们所谓的“实际”，不过是不加反思地接受大家普遍接受的东西，追逐大家普遍追逐的东西罢了；而我们所谓的“稳定”的生活，不过是不加检视地过大家普遍的生活罢了。

想法实际与否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这是否是经过思考和辨析的想法，还是只是懒惰地接受来的大众的东西。生活是否稳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思考过你想要一个怎样的生活，以及你是否在过你想要的生活。生命的重量，不在外表的形式，而在于其实质，一个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所谓开悟之人，想必他的生活也无非是衣食住行等琐事，然而那必定不同于不明所以的安稳度日。

我知道，你一定担心，我已经快到而立之年，这些幻想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事实上，我比你更担心这一问题。每次想到前途、事业、成功，我都感到莫大的压力，就像背上压着五指山的孙猴子。我夜里经常做同一个梦，好多年了。梦里我总是被什么东西追逐（可能是魔鬼，也可能是摩托车，形式不一，但内容相似），我拼命地跑，满头大汗，生怕被后面那个人（或什么东西）抓住。

我知道背后那个追我的东西是什么，它是时间。时间在不停地追逐我，我太害怕被它追上，而我却一事无成。那感觉像极了我要在两个小时内做完一份考卷，否则铃声一响，我就一败涂地，

万念俱碎。因此你每次跟我说什么我今年虚岁二十六月了，什么我要再不留学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什么怎么发展，怎么少走弯路之类——我知道你全然是出于好意，但你每次说这些，都好像我身后追我的那东西在踩油门，而且发动机隆隆作响。

在大多数人看来，人生的整个历程都可以被刻在一张钟表盘上，指针无情地扫过，你必须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上会认满意的答卷，否则你就是个失败者。

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一时间点上应该做的事，都应该像楔子被准确地插到它应在的槽孔一样，被准确无误地完成。

我的家教，学校教育，从小教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观，它如此根深蒂固，即便我有一千个理由否定它，它依然在我的骨髓之中。然而这种人生观彻头彻尾都是错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永远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更不能感到任何幸福，感到的只有压力和惶恐。

我们通常认为人应该有个目标，然后通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再设定下一个目标，人生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目标组成。然而，目标带给我们的，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假如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年要读五十本书，于是平均一周要读一本书。于是我严格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个目标，但这仅仅是完成了目标而已，我真的理解消化了五十本书吗？我真的从阅读中获得了乐趣吗？没有，我只是完成了一个目标而已，而重要的东西（对于阅读，重要的是理解、思考、感悟）全部漏掉了。

我们总是在心中假设一个理想的自我，然后经由各种努力，去实现那个理想的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实——现在的我。理想

的我和现实的我总是存在差距，由于我们不能安然地接受现实，所以永远也无法幸福。我们努力去成为那个理想的我，然而最终发现，我成不了任何人，成不了任何别的样子，我只能是我，所以这种努力无法带来任何成就。

人生就是这么个东西，因为社会的宣传，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们总想给自己贴上各种“优点”，使自己变得优秀。我们想变得勇敢，想变得坚强，想变得美丽。直到有一天，我们会一现，自己只能是自己，那些“优秀”的品质并不属于自己，自己也无法变成别的样子。

所以真正重要的事只有认识自己，而非其他那些无谓的努力。

人这一生接受的最错误的教育莫过于“你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想想看，所有的人都要有所作为，所有的人都想获得高地位，都想成为某个样子。想想这些，你不觉得其中有莫大的悲哀吗？

我们所谓的“有作为”，背后不过是彻头彻尾“功利”的思想。

我们这个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功利的民族。这种功利体现在，做什么事都要问问这东西有没有用，而所谓的有用，其实就是指能否创造地位和财富。你说你要学习金融，他会说有用；学管理，也有用。但假如你说你要研究一个可乐加苏打会把瓶盖喷多高这种无理头的东西，他就会说这有什么用？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从未看见对那种不计功利，纯属好奇有趣的行为的鼓励；从未看见对人们那些无用和无理头想法的宽容。但是，你是否想过，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不是那些有用的东西，恰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想法？

当笛卡尔琢磨着他给公主的信里要写什么公式时，谁能想到解析几何会对后世数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当法拉第玩弄着他的电磁圈时，谁能想到他的发明会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

总有一些人，他们纯粹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日复一日地玩弄那些世人看似无用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人的发明，成了改变世界的动力。这听起来像儿戏，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竟然只是些人无用的好奇心。

我们的教科书里会讲，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定之后，产生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于是催生了一大批科学发明。的确有不少发明是来自人们实际的需求；但突破性的进步，却往往都是源于那些无用的追求。

我们所执著的“有用”的东西其实不值一提。这种功利的想法，限制着个人的发展，约束了人生的可能性，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国家的进步。想想，一个国家所有人都在做“有用”的事，追求着更高的官职，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奖牌，更高的经济排名。这样的国家势必干什么都是大家一窝蜂，哪能赚钱，大家便一窝蜂地去；哪个专业热门，大家便一窝蜂地学。永远只能看老外玩出什么新花样，便一窝蜂地复制，永远也不可能在创新上走到别人前列。

我想是时候我该抛弃那些愚蠢的“有作为”、“有用”的想法，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也许我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显得太晚了，我已经快三十了，但对我而言，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

每个人在年少时都难免会有幻想，他的思绪会游走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心灵会徘徊于入世和出世之间，观念会起浮于虚和无

现实之间。这些矛盾存在于每个年轻的心理，他势必需要经历一番世事，游历一场梦幻，才能做出最终的选择。

然而我年少时在干什么呢？倒退十年，我十五岁那年在干什么呢？我坐在教室里，穿着千篇一律的校服，在演算着毫无意义的习题，为了准备一场可笑的考试。现在想想，简直觉得滑稽可笑，傻的可以。

每当我产生虚幻的想法（想休学或者退学），便被你从“弯路”上扳了回去。你以为我终于回到了正路上，其实那些矛盾，一直被压在我心底，从未消失。

人生真的有“弯路”和“直路”吗？我们能否抛弃人生必须要在特定阶段做特定的事这个古老尘封、搬起来咯咯作响的教条？这就回到了我开始探讨的人生深度和广度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并非线性地铺展在一条时间轴上。时间不过是我们记忆的产物，因为我们记得昨天，所以推想明天。

我们可否换一种对待时间的方式？任它如何流逝，我只存在于当下的这一点？这是所有问题之所在。假如我们能这样看待时间，就不会纠结于时间是否被浪费，不会纠结于道路是直是弯，不会纠结于目标存在于否。

至此，我想说是大概都说完成了。还是有些潦草和笼统，不知你是否已了解我的心境？

你也许不认同我的某些观点，但这没关系，我只希望你了解我的心境，了解事情的因由。至于观点本身，倘若你多认同一点，我就会多一份快慰，倘若不认同，我也完全理解。

我感觉自己活得就像个边缘人，虽然生活在人群之中，却和谁

都很陌生。我从小就是那种不起眼的人，生来就是被别人忽视的类型。假如在个团体里，你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唯一忘掉的就是我；拍一张集体照，唯一漏掉的也是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未产生任何存在感，也从未产生任何认同感。

以上想法，绝非只因我一时之感困。这些东西，已在我心中沉积多年，只不过不同时期，程度不同罢了。

我本能地讨厌竞争，事实上因为我骨子里的软弱，我也争不到任何东西；况且对于大多数人争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终究难觅知音。你说我谦虚，什么中考第一，高考保送，我都没骄傲。这并非因为我谦虚，而是我从未把那些东西看成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我值得骄傲的东西，如果有一点的话，就是我那么点儿偏颇的歪理邪说，然而别人大多不理不睬，或一笑置之。

最后，你可能想知道，我未来是怎么想的。其实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如果让我重申一下的话，那么就是，我可能去读硕士，也可能不去，可能安稳地工作，也可能不会。但这对我都不那么重要，只是谋生手段而已，并无关生命本质。

假如你读完此信，不再觉得我思想错乱，胡言乱语，我将备感欣慰。

自我与记忆

最近一直有些恍惚。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状态，既不是空虚、迷惘，也不是恐惧、彷徨。我时不时感到，精神似乎被抽离身体，这精神在时空的长廊里不知去向。我依然能集中精力上课，但时不时觉得精神似乎不在这个世界，不在此时此刻。

过去很多被遗忘的事又浮现在眼前。我看到自己在小学时候，穿着邋遢的衣服，从家门附近的拱洞下走过。我看到穿着校服的我，想到恒仁县的冬天，冬天时常穿着臃肿难看校服的我。我还记得走进高中校园的第一天，我拖着行李箱，从育才广场满是下水井的路面上轱辘轱辘走过。我记得我和妈住在离学校最近的出租房中，我不记得那空空的房子是什么模样，但在那房子里，时间仿佛凝滞，又仿佛转瞬即逝。我度过了高中最关键的一年，我妈也度过了她最病重的一年。我记得大学里，晚上的柳树下飘着的氤氲的空气。后来我去深圳，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低谷的两

年。我还记得妈找了间小宾馆，我和她住在那个不隔音的小房间。想到这些点滴，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自己，簌簌落下眼泪。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大喜大悲，但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回忆足以让我情不自禁。我不晓得这些回忆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总想起，为什么我会落泪。

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中，往回看，两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我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只是回头看，什么也看不见。往前看是隧道口射进来的阳光，但却迈不动脚步。我出不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出去，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向前还是后？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变轻，变透明，变得像空气一样。我生活其中，但它不实在，我抓不住它。

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堪培拉，可是堪培拉是真实存在的吗？不，它只是个名字。我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生活在自己心里，自己的回忆里。

我在一个地方住过，生活过，周围有人，我和他们交谈过，然后离开了，失去，忘记，变成空气，好像没有一样。

很少有人像我活得这么纯粹，只有我自己，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假如我此刻立即从这个世界消失，没有人会察觉，我真的存在吗？我曾经存在过吗？

现在做什么？我走到大街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又散了。我不知道人群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寻找心灵的慰藉，我要给自己的存在找个借口。但借口只是说给自己听的，没与别人在听。没有别人在听，找什么样的借口真的重要吗？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的自己，那时的“自我”也许还不存在，所以没有畏惧。也许他存在，只不过那时的我不知道。现在自我形成了，从此我与外界隔绝的。可是与外界没有交流的自我，又真的存在吗？

自我意识，也许，但你有意识的时候，心其实不存在；你无意识的时候，他反而存在，亦或反之？

幸福、读书与人生的意义

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木心

关于幸福

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我始终不理解此话的真谛。要我说，专注单一才是幸福的本源。因为选择太多，人才会迷茫和痛苦；因为太过自由，人才会迷失生活的意义。

虽然没有人能为全人类规定生活的意义，但人总要为自己规定这样一个意义，并依此笃定地生活。我渴望单一、专注的生活，无论从事任何职业，任何工作。我渴望成为一名极客，终日以编程为乐，享受技术带来的激情，和不断实践新技术带来的成就感；渴望成为一名音乐人，整日醉心于旋律和音符，三月不知肉味；渴望成为一名思想家，苦思冥想，上下求索；渴望成为一位商人，利润不是贪婪，而是生活的乐趣……我渴望苦思冥想，也渴望专

注实践。当生活变得单一，当事业变得专注，生活就会因专注而变得充实，因充实而变得幸福。

人生像一场游戏，你必须全身心投入，专心致志，大汗淋漓，才能感受到游戏所带来的乐趣；倘若三心二意，游戏便只成了休闲。倘若有一件事，使你的生活全部围着它转，你的生活就有了一个定点。时间的水流就不会无头无尾地流逝，而像被吸进了一个漩涡。涓涓细流因汇聚而成就了漩涡的力道。有了这个定点，你才能以此为中心，去评价生活、评价世界。

幸福的感受来源于对生活的肯定态度。所以幸福虽然是一种感受，却内在包含了一种评价的理性。只有对生活评价为积极的时候，幸福之感才会油然而生。当一个人的生活单一而笃定，他对生活的评价也会变得单一，因为他只有一件事、一种生活、一种成就就可以去评价。当他在这一件事上取得些许进步，他便会得到积极的评价，而这就是幸福的源泉。

因此，能够专注于一事物、一种生活的人是幸福的。单一和专注才是幸福的本源。

关于读书

读书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以为读书会使人更接近真理，但我现在发现，所有的书、所有的言论不过都是一家之言。你自己以为发现了真理，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儿戏。真理和价值观只能是相对的。因此读书与真理无关。也许仅仅知道一家之言也是好的，毕竟多知道一种“一家之言”，也就对世界多了一份了解。但问题是，就算多了这份理解又怎样？

我曾觉得读书能让人活得明白。通过读书和思考，人会对世界、人生有更丰富的洞察，会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他人，会获得澄明的思想，以及思考的乐趣。可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当你置身于广袤的大自然，天高地远，沧海一粟，你会发现人生的本质如此简单：人生活于这个世间，真就和其它生物没什么分别，吃饭、睡觉、呼吸而已。人生走到尽头，往往都会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是的，人生的本质不是别的，只是平凡。那些对人生多么深刻的理解，不过是徒然。所以，读书与人生无关。

读书与功名亦无关。我也曾经以为，读书可以帮助人获致成功，更确切地说，是获致功名。事实上，事业上的成功，取决于实践的能力，而实践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太多事业有成之人并不读多少书，这点我不必赘述。

我想读书人无外乎有两种出路：对于不爱书之人，早晚会放弃。对于爱书之人，读书纯属休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实际，不再有幻想，他便会发现读书除了消磨时间，实在无特别之用。既然是为了消磨时间，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消磨，比如看电视、搓麻将等等。所以对于不爱书之人，早晚会放弃读书，选择其他方式消磨时间。对于爱书之人，迟早会进入一种纯娱乐的状态，即读书无关乎事业、名利、真理或者别的什么，读书的目的仅仅是因为阅读的乐趣。

人生的意义

胡适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若按照这个标准，人世间大多数东

西都是不可信的了。不仅上帝不可信，佛陀不可信，而且正义也不可信，人生也不可信。没有人能证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也没有人能证明人生必是有意义的。

“意义”是最鬼魅的两个字。人生在世，又有什么事是确信无疑有意义的呢？像我这样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有意义吗？大街上那些为了生计而忙碌奔波的人有意义吗？还是那些文人、艺人、商人、军人，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吗？都有意义，也都没意义。有意义是因为所有的职业者都在这个社会上发挥了一份功用，否则也就不会有该种职业了。无意义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找到永恒的意义。我们今天风起云涌的任何事，二十年前或二十年后，又有谁热衷于这些玩意儿？所有的事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有阶段性、暂时性的意义，无法找到永恒的意义。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罢了。人们所追求的“有意义”的东西，不过是给生活一点指望、一点动力罢了。你可以相信你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是造福千万人的。尽管这不是事实，但人的生活必须有这点指望，有这点盲目的相信。否则便会遁入怀疑、空虚和消极，进而否定整个生活，进而便要自杀身亡了。人要有这点“指望”，就难免盲从。不过，要做一个快乐的人，也许“盲从”要比“严谨”更管用。

我的精神家园

都说人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究竟什么是精神生活？我这样定义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当他剥离了一切物质上的欲望，割离了一切社会化的交往时，他若仍能从自己的精神中获得快乐，并怡然地享受这种生活，那么他就算有了不错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上自足的生活，不依赖于物质上的富庶，也不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完全出于自我的内在。如果一个人能从内在的自我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体味到生活的乐趣，那么他就算有精神生活了。

能体会这种精神生活的人往往都有些隐士情结，渴望独居于世外桃源，手执爱书一卷，任由时间流逝，日月更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一个生活在精神生活中的人，仿佛远离宽阔陆地的独居物种；又仿佛大洋中的鱼，在思维的海洋中游来游去，玩味思维的乐趣。是的，思维的乐趣，思维本身就有其乐趣所在，而不依赖于思维

的结果——现实世界中的结果。于是他体会到思维与物质的分离，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他体会到思想可以不依赖于物质，可以不以物质为目的；自我也可以不依赖于世界，不以现实世界为目的。

我从阅读中渐渐感受到这种思维的乐趣，阅读并非为了某个现实目的，而有其自在的乐趣。这其中我感受到比现实世界更完美的世界，更优雅的快乐。从中我思考，谓叹，感动，悲伤，这里面有一切人的思想与情感，一切人的智慧与趣味，而且比现实世界中的更完美。仿佛一件件艺术品，陈列在那里，令人叹为观止。

我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探索世界，也发现自我，构筑我的价值观，和我生存的意义。我不愿接受现实世界中教给我的价值观，也不愿接受现实世界中安排给我的角色。因为他们怎么看都觉得可疑，我要独自寻找她们，以我的视角去发掘她们。就像科学家一样，发现世界的奥秘；像考古学家一样，发掘太古的记忆。

我喜欢我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与现实世界日渐疏离。只要有食物和空气，我愿意一辈子与我的精神家园厮守在一起。我试图用我构筑的价值体系去理解现实，却发现现实如此的不可思议，我无法理解社会的秩序，无法理解道德的定义，无法理解人类的追求，无法理解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该远离，还是该回去。

我珍视我的精神家园，即使在别人看来他偏激或不切实际。因为他就如同心脏一样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就是我本身。我的精神家园是唯一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我从不会因现实中的标签（比如奖章、头衔或权力）而骄傲，因为那不过是别人眼中的我；而精神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纯粹的我。

我会一直守候我的精神家园，就像鱼儿守候大海，鸟儿守候森

林一般。只有在精神的家园里，才有我的真实、自由、信仰，才有我自己。

与时间相处的方式

生活过于平静，泛不起任何波澜，日复一日，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时间是什么？她可以是你的敌人，一个你永远也战胜不了的敌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你需要时，她总在那里。时间似流水，你找不到源头，也追不到尽头。时间似花香，忽而扑面而来，忽而飘散而去。

这一年来，我的变化很大，清淡的日子，内心泛不起任何欲望和野心。但我逐渐学会了和时间相处，成为朋友，而非敌人。以前的我，似乎总想追求某种永恒的东西，然而如今我明白，没有什么永恒。在时间里没有永恒，通过时间，不可能超越时间；永恒是无法企及的，存在的只有当下。未来不过是过去记忆的延续，而真正存在的只有当下。

时间的流逝只不过是幻觉，就像手表上的数字，只不过是符号。与手表上的数字类似的，年龄、岁月，也都不过是符号。它

们并不构成我的存在，也与我的存在状态无关。我曾担心岁月蹉跎，碌碌无为，如今看来，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说到无为有为，出世入世，这在我看来是个永恒的问题。在我身上，这对矛盾永远存在，也许永远无法调和。对我而言，对个体而言，最真实的永远是当下，当下的感受，喜与悲，爱与恨。然而这个时代是如此忽视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真实，这个时代热衷于虚幻的话题，经济，效率，繁荣，意识形态。我们以为这些才是真实，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然而并不是这样的，真实和非真实被混淆了，这是迷失。

所谓意义，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必然在存在之后；先有存在，再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有鉴宝家，也有品酒家，也有品汽水家。假如你说成为哪一个“家”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也一定是在存在之后。通俗点说，无论人生有无意义，你首先要成为你自己。人们喜欢谈论“贡献”，然而在我看来，所谓贡献，那是一种外在。人不见得要是社会的一员参与者，人可以只当一名观察者，甚至连观察者都不是。人之为他自己，这是他的内在，用外在来要求内在并不合理。

人与人不一样，正是因为如此，正因为这种多元化，这个世界才成为世界，我们的社会才成为社会。倘若失去了这点多元性，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致的，一致的目标，一致的行为，那么世界一定变得非常可怕，不敢想象。

所谓的人类文明，是由那么几个突出的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叙事体。就好像从太空看地球，你只能看到海洋、陆地上的几处斑

点，而太多的细节，那些组成我们真实生活的细节，全被忽略了。所谓人类文明，是忽略了大多数人类的东西，只选取少数作为代表；然而我不晓得，这些代表在“代表”什么。

如果说不能反映人类真实存在的所谓文明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人类文明就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无意义的大背景下，很难说个体还有什么意义。这似乎又回到了意义不意义的讨论，然而意义本就是脱离真实的存在。人们只是把外在的认同当作意义罢了。

我曾想要证明我存在。人类文明是由极少数明星构成的叙事，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在这个叙事中的。文明在于传承，不能传承也就等于不存在。于是对于那些大多数人，平凡的人，不构成人类文明的人，存在的意义几何，便非常值得商榷了。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也许永远也不能成为人类文明天空中的一颗星，但是我的时间还在继续，我还有我的生活。我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意义，不如说是臆想，更确切地说，是我凭记忆产生的臆想。那是虚幻的，因为那并不是我，并不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只有当下的时光，傍晚洒下的阳光，窗外穿流的车声，是真实的。我追求虚幻，却忽视了真实。

我想说的是，我渐渐学会了和时间相处的方式，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对当下的我而言，梦想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节奏，做自己的事。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提出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自己提出个“人生三追求”，即追求不朽、追求乐趣、追求无为。这也概括了我对人生感悟的三个阶段。

古人讲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追求这种不朽功名的人生，就是我说的对不朽的追求，大致相当于冯友兰的道德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过于肤浅，被我直接跳过了）。人生短暂，倘若能在死后不朽，生命的意义就得到了极大地延伸。能不朽的人，其实都是伟人了。

但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追求不朽并不是人生的真谛。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朽的，想不朽的人是很愚蠢的。那些真正“不朽”的人，也许他们本人并没想不朽，只是后人给他们贴上了标签。比如，孔子活着的时候可没想当圣人，只是教书讲学而已。

这个世界太大，宇宙太浩瀚，以致于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很渺

小。古人觉得只有不朽才能赋予渺小的生命以意义。但是既然无法不朽，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重大意义了。既然我们每个人注定渺小，注定平凡；既然我们的生命注定不能永恒，注定没有特别意义；那么人生在世，唯一的任务就是寻找乐趣。这便进入了我所说的第二追求。

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难以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那么多人想环游世界，不过是图个新奇感或者说图点乐趣罢了。于是你饱览天下奇观，看惯秋月春风。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花花绿绿的是世界，其实只是人类本能欲望的产物。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弗洛伊德也说：人的所有行为都源自本能欲望。既然如此，世界上又还有什么新奇之物？于是再无乐趣可寻，于是万物都归于沉寂了。这就进入了我所谓“追求无为”的第三重境界。

这时，人不会再追求什么不朽，也不会寻欢作乐，只会“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于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看破红尘”并不是一种消极，而是一种澄明的智慧。

更多文章: aikow.com

